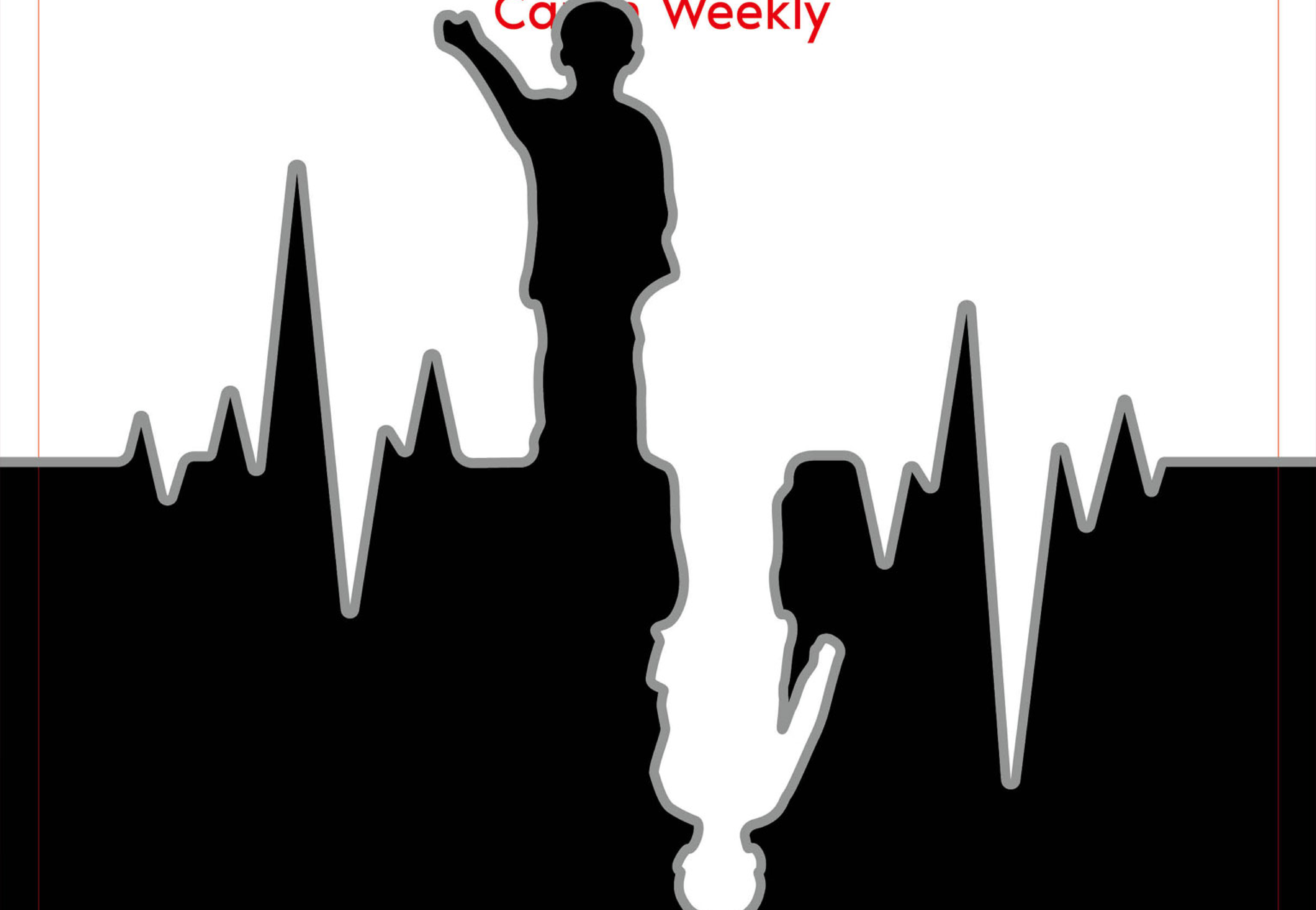
特别报道：绿电提速 52
电竞闯亚运 45
显影：野猪凶猛 62
治理地面沉降 74

财新周刊

Caixin Weekly



灰色生命线

从募捐到套捐到暗箱最后到诈骗，多起儿童大病筹款
被从生命线导入死路。出路何在？

P.28

2023年 第38期 9月25日出版
总第1074期
邮发代号：32－235
ISSN 2096-1251
9 772096 125233 38>

定价：人民币40元 港币60元 www.caixin.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最新封面报道｜灰色生命线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从募捐到套捐到暗箱最后到诈骗，多起儿童大病筹款被从生命线导入死路。出路何在？



河北燕郊，从白血病患者家庭聚集的公寓眺望燕达陆道培医院住院部，两者之间直线距离不过两公里。这所医院是中国最专业的血液病医院之一，聚集了大量来此“最后一搏”的白血病患儿家庭。图：丁刚

文丨财新周刊 黄蕙昭 蒋模婷 汤涵钰 林珂莹,谭晨（实习）

一起事关千万“救命钱”的诈骗风波，再次引发公益领域震荡。舆论中心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称“儿慈会”），是曾多次在“99公益日”中筹款量摘冠的“慈善明星”。

9月12日下午，一则“儿慈会工作人员”卷走千万善款的爆料消息不胫而走。爆料称，儿慈会9958河北项目负责人柯善孝以“配捐”为名，诈骗几十名患儿家属资金超千万元。

儿慈会2010年1月在北京成立，是具有民间色彩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现已累计募集资金超过57亿元，有项目总数150余个。其中，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下称“9958”）是儿慈会筹款量最大的自主品牌项目，过去一年共筹款2.2亿元，救助困境患儿超1万人。

事件曝光次日晚，儿慈会发布声明，称柯善孝不是基金会工作人员，曾在9958河北廊坊地区合作机构中当过“短暂的志愿者”。

此番“撇清”未能服众。受骗患儿家长指认，柯善孝曾以“9958廊坊团队主任”的身份，出现在儿慈会2023年2月底的公众号推文中。今年7月—8月间，柯善孝以儿慈会9958河北廊坊团队主任的名义，通过中间人在病友群内发布配捐信息，让家长向其私人账户打款，并承诺一定期限后以更高金额返还。另据央广网报道，前一轮未“爆雷”的配捐里，患者家属向柯善孝个人账户打款后，按约收到了来自中华儿慈会的汇款单。

事件另一方当事人，是公益领域最特殊的救助对象：大病患者。柯善孝诈骗案的受害者，主要集中在河北省燕达陆道培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等。其中，陆道培医院是专治血液病的民营医院，多收治难治性白血病患儿。受访白血病病友告诉财新，从化疗、移植到抗排异，患儿治疗费动辄百万元起步，漫长的抗癌过程足以耗尽一个普通家庭的积蓄和人脉。

柯善孝本人，也曾是大病患儿的家属。他因长期和救助机构联系，又深知病友痛点、掌握病友人脉，在部分患儿家长中成为“中间人”“志愿者”，帮助病友对接公益项目资源。而在儿慈会9958项目“加盟”模式下，志愿者筹款能力够强，就可以很容易地申请设置地方救助站点，挂牌筹资。

事发至今，舆论将矛头指向走形的“配捐”：9958项目各地方团队以参与“99公益日”等大型公益活动、套取慈善组织和爱心企业相关项目配捐的名义，涉嫌诱导患儿家长自筹款项，违反了《慈善法》“不得指定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规定。而患者家属筹钱心切，不仅往慈善组织项目链接里捐款，还将大笔资金打入“中间人”“志愿者”的私人账户，从而陷入诈骗漩涡。

当事人柯善孝现已被河北警方刑拘，案情至今不明朗。9月13日，事件引发热议后，儿慈会声明强调，“我会的账号从未收到过这些资金”，此系“当事人将资金打给柯善孝个人账户”。据央广网报道，9月14日下午，儿慈会平台传播部主任孙丹丹还在媒体会上称，“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配捐’活动，还要把钱打进他的个人账户”。

这仅仅是不法分子利用配捐规则漏洞集资诈骗的偶发事件吗？随着财新调查从受害者一端继续深入，一条在公众意料之外的隐秘链条浮出水面：不少以“配捐”名义被层层上收的患者家属资金，实际进入了商业化广告投流渠道中，成为微博、百度、抖音、微信朋友圈里“救救白血病孩子”“助力大病患者重生”等募捐广告，以病毒式传播吸引公众注意力。在这一链条上，患者家属款项从志愿者私人账户中“进”，公众爱心捐赠则从公募机构对公账户中“出”。机构对此的失察甚至默许，已埋下系统性风险的种子。

广告引流、商业化模式，这些元素在慈善筹资当中的运用并非禁忌。相反，近年来，善用商业模式和新技术来助力慈善革新，已是主流声音。在腾讯等商业平台的参与下，“99公益日”“520公益日”活动不断造势，以企业高额配捐以及平台和公益组织联手对接大批小规模公益项目筹款而广受关注，也带来筹款额大规模上升、公众参与面迅速拓展等变化，为公益慈善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不少业内人士担忧，公益伦理能否在这些新尝试中贯彻始终？

无论是“明面”还是“暗面”的“配捐”，公募机构都能游离于法律法规要求的责任之外，各路柯善孝式“中间人”充当操盘手，患者家庭却是为套捐注资、广告投流“埋单”的主体。截至发稿，财新尝试多方联络儿慈会，未获正面回应。

近两年来，为了遏制“套捐”，营造更健康的慈善环境，“99公益日”大病救助项目的配捐规则和审核机制多次调整。同时，抖音、腾讯等平台已完全禁止大病医疗救助广告的投放。

柯善孝事件更揭开了又一轮行业自查和整顿序幕：腾讯公益、微博公益发布声明，暂停“9958”募捐项目，字节跳动公益暂停儿慈会项目，支付宝公益则暂停了所有大病救助项目的上线审核。

大病家庭的求助之路更加坎坷。近几年来，国家医保制度不断完善，但保障范畴有限，许多发生灾难性支出的家庭仍难觅稳定的救助渠道。

“来的机构越来越多，家属能筹的钱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乱！”白血病病友组织的李翔（化名）喟叹。

近年来，随着官方定调“众筹不属于公益”，加上乱象不断爆出，平台对参与大病救助日益谨慎，不少直接叫停个案救助。公开筹款渠道日益萎缩，患者家庭不得不冒更大的风险，博取更有限的收益。

受访的公益人们，常以“凶猛”“惨烈”“赤裸”等词汇形容大病救助：在离死神最近的地方，捐款多一元，就是希望多一分，而救助迟一天，就可能错失生死缠斗一线转机。



2023年9月17日上午，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门诊部二楼，患者和家属在护士站前排起长队。图：蒋模婷

如此绝境一搏的处境，为这场看似偶发的公益诈骗埋下了伏笔。

救命稻草

如果不是无路可走，鲜有家长会选择来路不明的“配捐”。

位于河北廊坊三河市的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是中国最专业的血液病医院之一。这里聚集了大量白血病患者，其中不少是在外地辗转求医无果后，来此接受骨髓移植等治疗，做“最后一搏”。

午饭时间，住院楼外逐渐形成一道窄窄的人流，从停车场穿过医院的安检口和花园。他们是来送饭的患者家属。他们的孩子，许多正躺在无菌仓里，接受移植后的生死考验。

冯雪（化名）曾是其中一员。2021年5月，她9岁的儿子确诊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到2022年2月第一轮治疗结束，大半年的房租、路费和报销后的医药费累计近20万元。但四个月后，儿子又开始持续发烧，不断升高的白细胞宣告白血病复发。

在放疗过程中，儿子的眼睛失明了。医生说可能是因为白细胞浸润了眼部，不建议做骨髓移植，否则做完也有很大概率复发。医生劝冯雪放弃：“孩子应该就两三个月了，不要浪费钱还让他遭罪了，他会很痛苦的。如果坚持做，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十几个孩子都没活下来。”

冯雪不愿放手。2022年9月底，在病友介绍下，她带着儿子前往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寻找最后的希望。她在日记中写道：“低沉的吊顶、暗沉的装修风格，一进去就让我心情有点压抑，只是走到这一步只能继续走下去，前路会怎样，谁都不知道，希望明天会更好！”

有限的希望却要靠不断投入的金钱来维系。在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移植及其后续的治疗花费，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元，有些患儿还需要二次移植。这里不缺少卖房卖车、四处举债、中产变赤贫的故事。病房里、开水间、走廊过道，到处都有家属在交流“找钱”经验。

也是在如此绝境下，很多家属第一次接触到“筹款顾问”。

“你是不是筹款顾问？”财新走访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时，家长杨娟（化名）主动上前打听。得到否定回答后，她有些失望：“这半年来，筹款顾问一个月才能见着一个。”

有些筹款顾问来自水滴筹、轻松筹等个人捐助平台。他们会教家长们写文案、上项目链接、推筹款。但这种“慈善众筹”项目不属于公益项目，更不能向社会公开募捐。“能给这种捐的，大多也只是亲戚朋友，说得不好听，它是人脉的变现。”李翔说。

有些“筹款顾问”则给家长们“科普”他们闻所未闻的“找钱”方式——“配捐”。家长们先报名参与向社会募捐的公益项目，同时按“中间人”指示，将钱打到私人或医院开设的账户中。一段时间后，就能拿到本金和额外的“配捐额”。回款由慈善组织的账户打回家长的个人账户或医院的账户中。

杨娟曾参加过浙江某基金会的两次“配捐”，都拿到了回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家属发起一个‘一起捐’的链接，另一种就是直接打到‘中间人’的个人账户上。”杨娟说。

“配捐”项目的回报有多有少，但在大部分病友看来，它至少“稳赚不赔”。但37岁的方小龙（化名）第一次参与，就成了诈骗受害人，损失了48500元。8月4日，他在病友微信群内得知消息，参加了一次由“儿慈会项目主任”柯善孝负责的公益项目“配捐”，原定“99公益日”之前可以回款1500元。直到9月4日，“配捐”迟迟不到，本金也杳无音讯，柯善孝东窗事发。

和许多受骗家长一样，方小龙并不认识柯善孝，是看到柯善孝的“中间人”发布的通知后得知有“配捐”项目的。所谓“中间人”，也就是病友群内认识柯善孝，帮他传递消息、组织一部分“配捐”参与者的病友。患儿家属的线上互助病友群很多，基于同乡、同医院，甚至仅仅是病友关系彼此信任，互相传递消息的情况很常见。

这笔损失几乎压垮了这个同时拥有两个大病患儿的家庭。9月初刚得知无法回款时，方小龙“很崩溃”。他的妻子与病友们共同前往儿慈会大楼“要钱”，回来就新冠“三阳”了。

“我女儿刚做完手术，现在被她妈妈传染了新冠在发烧，还不小心把胳膊摔骨折了。”对现在的处境，方小龙说，“孩子以前没有生病的时候感觉自己确实还挺幸福的，也不欠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2022年10月，冯雪的儿子坐在陆道培医院的病床上。冯雪回忆，当时医院床位紧缺，她和孩子挤在一张60厘米宽的小床上。后来，孩子因指标异常失去手术机会，出院后不幸离世。图：受访者供图

原本这种“配捐”的机会供不应求。8月4日那天，方小龙是在一个名为“抗白助力新病友2群”的微信群聊里得到筹款信息的。有病友发布了一条通知：“儿慈核销18以下，48500配1500，一个月，5个名额。”

他“幸运”地抢到了一个名额，十分钟内组织者就宣布人够了。一名没抢到的病友惋惜地留言：“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8月7日下午，“48500配1500第二批”的微信群聊中，协助柯善孝指导病友的“中间人”说：“指定账户自筹好，我晚点核对。”病友们陆续晒出转账截图，方小龙也将48548.5元汇入一个个人账户，开户人名为李旭，开户网点为中国银行长沙特立路支行。方小龙称，“中间人”曾许诺这笔钱在“99公益日”之前就能回款，到时候需要家长提供汇款截图和至少48500元的医院缴费发票。

今年3月，方小龙两岁的女儿确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他11岁的大儿子在为妹妹做配型体检的过程中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不算异地就医的生活成本，两个孩子的化疗、移植手术、心脏手术、药费等看病花销，目前已近80万元。

“六口人，只有我一个人赚钱，现在也失业了。”方小龙是一个卡车司机，月均收入七八千元。今年8月，请假陪女儿治病的方小龙收到老板通知：“厂里效益不好，车卖了，不用回来上班了。”孩子生病前，方小龙家里有几万元存款，生病后曾通过“水滴筹”筹到9万余元，可“进了医院，钱就不是钱了”。

“我心想能解决一点就解决一点。没钱，医院说停药就会停药的。”方小龙告诉财新，也有病友劝过他别做“配捐”，可能会有人从中抽成，“都是拿着我们的信息发到网上，大头肯定被别人拿了”。不过，更多的病友在分享自己多次成功回款的经验，柯善孝在正规公益组织里的“职位”更为方小龙打了一针强心剂。

冯雪不是柯善孝事件的受害人，但她能理解受骗家长们当初的选择。治疗刚开始时，她认为自己虽然是单亲妈妈，但工作收入不错，靠着24万元年薪，加上同事朋友们自发组织的十几万元捐款，不需要“公开卖惨”。

但随着儿子病情恶化，她能拿出来的钱越来越少。决定来北京做移植那一刻，冯雪把房子挂了出去。到陆道培医院不久，她就跟着病友加了几个“配捐群”。“如果不是实在没钱了，我也不会想做‘配捐’的。”

只是冯雪还没抢到“配捐”名额，孩子就先“闯关”失败了。离原定手术的时间只有三天时，孩子体内的白细胞疯涨，血红和血小板却跌到底，移植失去了最后的可能性。她看着儿子慢慢出现气喘、呕吐、肝脾肿大甚至心力衰竭。

冯雪只能带着孩子回家。路上孩子不停喊着“妈妈我疼，妈妈我疼”。孩子看不见，她用头贴着他的头，让他能够闻到自己的味道。回到家后，他坚持要妈妈陪在身边。冯雪强撑着拉着他的手，感受着他的呼吸渐渐衰弱，直至消失。“他最后突然非常用力地抓了一下我的手，我知道，他舍不得我。”

更多受骗家长的孩子们还在生死一线间挣扎。今年是郭茜（化名）的孩子确诊实体瘤的第三年，治疗已经花去上百万元。3月，孩子的肿瘤复发，但存款支撑新一轮治疗已是勉强。她听说，有一种新的免疫治疗，一个月要20多万元。她也想做，但是，“有多少家庭能自己出得起钱？”

“你明明知道会有那个结果，大概率都是那个结果，但你还得治。你不可能不管孩子。”郭茜说。她无法忘记，孩子邻床一个7岁的小病友，有一天曾说，“妈妈，我们不治疗了吧”。“你说（那时）家长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她一边讲，一边抹眼泪。

正是为了给孩子“再试一次”的希望，郭茜参加了柯善孝组织的“配捐”，但14万元就此“打了水漂”。“你说倒霉不倒霉？”9月13日，她坐在儿慈会大楼门口，试图追回款项。

家长们的损失，明面上看是柯善孝的个人行为所致。但柯善孝赖以获取家长信任的，是“儿慈会”这一正规公募基金会的名头。据李翔回忆，线上病友群内形形色色的“配捐”项目，至少在四五年前就有了，以正规公益组织志愿者或工作人员身份组织病友参加这种项目的，也远非柯善孝一人。“经常拿45000元，能配回5000元。”杨娟说，柯善孝事件之前，家属间就常猜测，这里面“抽得厉害”，但“没的选，有配捐机会，都是要抢的”。

从结果看，这更像一场“庞氏骗局”：受骗家长们凭借过往经验，深信由柯善孝负责、其他病友担保的“配捐”是行之有效的。但自己的钱究竟通过什么链条，过了几道手，经历过怎样的“明盘”和“暗箱”才回到自己手中，他们无暇深究。

诈骗风波后，救命钱至今没有追回，许多“配捐”群已经解散。

柯善孝的角色

直接卷走千万元“救命款”的柯善孝，虽然已被抓捕归案，但他的具体身份，以及他是否直接涉足更隐蔽的“黑灰产业链”，官方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目前，仅有儿慈会9月13日在官网发布声明，否认柯善孝为其工作人员，称其只是在廊坊地区“当过短暂的志愿者”。儿慈会一名内部人士亦在第一时间向财新澄清，称柯善孝和儿慈会“没有关系”，“是利用我们的名目去非法集资诈骗”。

多位受骗家长向财新表示，儿慈会事后与家长沟通过程中，出示过一张“解约书”，其上盖有儿慈会公章，写着儿慈会已经在2023年3月与“9958”救助项目廊坊救助站的执行机构，即天津市北辰区天眷公益服务中心解约。另外，孙丹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柯善孝只在这个服务中心做过志愿者。

对儿慈会的说法，认识柯善孝多年的白血病患儿家长吴冰（化名）难以接受。他和柯善孝是湖北老乡，孩子在一家医院住院时，因为“同病相怜”熟悉起来。“我在微信文章上看到他成了儿慈会项目主任，还打了个电话给他，开玩笑说你现在了不起啊，该叫你柯主任了。他说‘没有、没有’，但也没有做更多否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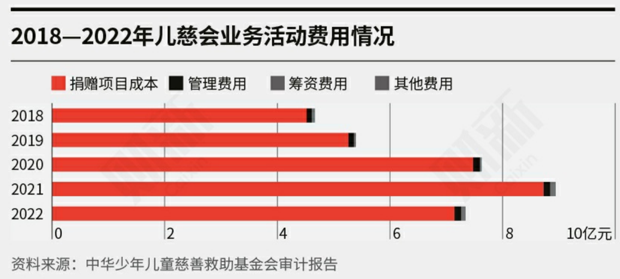
吴冰提到的“微信文章”，是指“9958儿童紧急救助”微信公众号在2023年2月24日的文章《中华儿慈会项目四部全国网络平台培训活动暨2023年发展共创会顺利举办》。文章中提及，“中华儿慈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柯善孝”。目前这一句话已从文章中删除，文章修改于2023年9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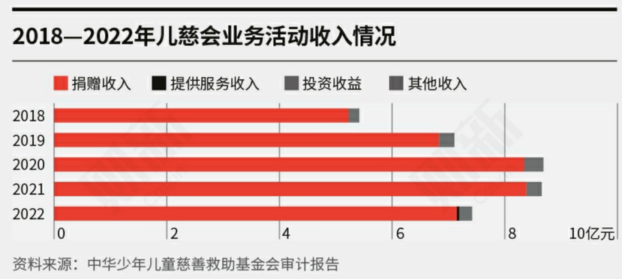
东窗事发后，天津市北辰区天眷公益服务中心曾对此事进行说明，表示柯善孝参加上述儿慈会活动时冒用了9958廊坊团队项目主任的名号，当时真正的主任是来自服务中心的陈双飞。对冒名顶替事件，服务中心称自己不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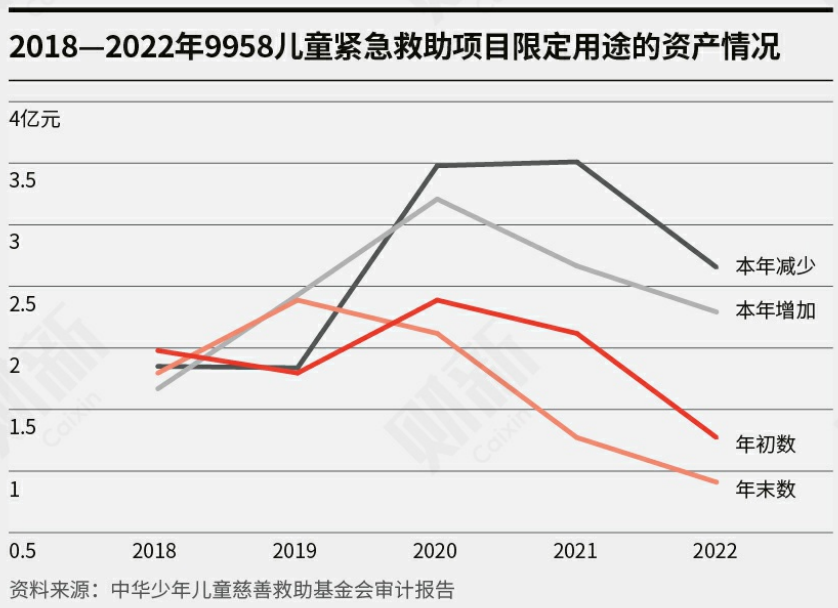
让吴冰的良心无法承受的是，正是他根据文章认定柯善孝能够代表儿慈会，于是将他介绍给病友，扮演了“中间人”角色。吴冰的孩子已经做完骨髓移植，目前只需每年复查两次，但他仍和许多患难时期结识的病友保持着联系。今年8月，有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的患儿家长问他，有没有“配捐”项目，吴冰于是联系柯善孝，拿到并分发了5个名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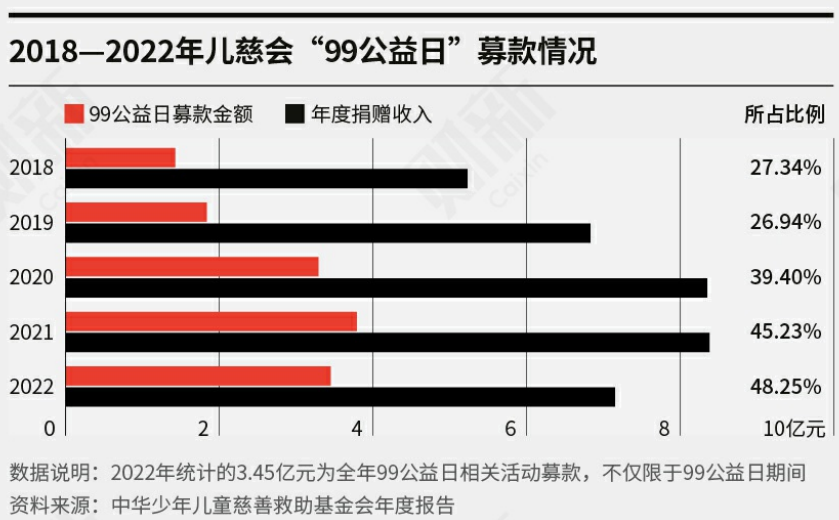
方小龙也是通过吴冰这样与柯善孝有私人关系的病友“中间人”，参与到柯善孝“配捐”项目。他向财新出示的聊天截图显示，他的“中间人”称自己8月30日就已报过警，“如果不是出于想让病友大家的钱都回来的情况下，早就立案了”。当时柯善孝还曾向该“中间人”承诺，“明天后天会回来一笔”。

方小龙说，自己的“中间人”和其他病友还曾在9月初自发组织“跨省追款”，试图跟着柯善孝回到湖北老家，监视他“解冻银行卡”。但在火车站转车时，柯善孝伺机逃脱。直到柯善孝案发落网，无论是“中间人”还是普通病友，都再也没有见过他。









追款失败后，病友的压力开始转向吴冰。“病友们天天来找我要钱，我受不了这个。我现在真的想自杀。”他沮丧地说，“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也要负法律责任？是不是出了这事，我也只有一死了之？”

吴冰说，自己已经借了13万元分给病友作为“补偿”，但这远不能弥补诈骗的损失。事后回想，对柯善孝平时所谓在忙的“儿慈会的事情”，吴冰所知甚少。

吴冰说，自己虽然被家长视为柯善孝“配捐”项目里的“中间人”，甚至被怀疑拿了钱，但只是在通过病友群传递

消息，“都是病友，你认识我，我认识你而已”。柯善孝不一样，他不在特定的病友群活跃，而是和多个吴冰这样的热心病友保持联系，再通过他们介绍更多的病友。

吴冰说，类似柯善孝这样，有渠道知道正规公募基金会正在搞“配捐”项目的人为数不少。在他的认知中，他们大多是“老病友”，帮病友们找筹款渠道找多了，逐渐成了公益机构的“老志愿者”，有些像柯善孝一样，还成了“工作人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掌握着相当多的大病救助项目信息，一年到头，吴冰每个月都能接触到数个他们发起的“配捐”项目。

根据“配捐”参与者们的说法，虽然家长汇钱的户头类型形形色色，不乏背景不明的私人账户，但成功的“配捐”项目，确实能收到正规公募基金会的执行账户汇出的回款。能“配捐”的不止“9958”项目，也有儿慈会的“爱心家园救助”等其他项目；甚至也不止儿慈会。杨娟参加过两次成功的“配捐”，是浙江一家基金会组织的。

还有一重因素是，在“99公益日”和其他类似的线上公益日活动中，家长经常能收到公益组织“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们的邀请，向募捐项目里捐几笔款项。按照公开规则，“99公益日”活动中，大批无公募资质公益组织，可以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机构达成合作。一般须由公募基金会先进行项目资质审核，再提交至平台进行上线申请。平台审核通过者可以获得在平台筹款机会，向公众介绍项目、筹集善款。公众每捐一笔，都有机会获得基金会提供的“配捐”，如果一笔捐10元，配了10元，就成了20元。这一模式也激励更多个体捐赠者参与。方小龙原本的计划，就是拿到柯善孝的回款后参加今年的“99公益日”，争取新的“配捐”。至于此“配捐”和彼“配捐”有什么差别，他没有太多概念。

吴冰回忆说，关于“回款”究竟是怎么来的，自己也曾听说过只言片语，没有深究。“有时去一些公益组织的地方项目，听项目里的‘老师’们提起怎么筹款，有人说可以‘配捐’，有人说可以‘打广告’，但具体的我不清楚，也没做过。”

柯善孝们的筹款“暗箱”里究竟是什么？柯善孝事件发生后，外界多在分析时将矛头对准“套捐”，也就是私人账户收到家长的钱后，分拆成数笔“个人捐款”，以换取慈善组织和爱心企业的“配捐”。曾长期协助病友对接“配捐”项目的李翔，也认为这是主流模式。

但如果家长们的讲述属实，“配捐”项目的频率、普遍性已经如此之高，社会上是否真有如此多的慈善组织和企业在频繁提供“配捐款”？在“套捐”事件已遭多次曝光的情况下，平台和公募机构是否真的对“套捐”一无所知，并毫无防范？

“配捐”的明面与暗箱

患者家属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争抢的所谓“配捐”，不是都会流入诸如“99公益日”这样的“配捐”项目中。

从原意上，“配捐”意为“匹配捐赠”。多位受访公益行业人士表示，这本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筹款形式。

“在大病项目中，它起初叫作补足患者家庭未能筹集完全的治病费用。”一家知名公益机构筹款负责人赵鑫（化名）告诉财新，“比如治疗白血病可能需要40万，但是我自己只筹到了35万，差5万块钱，然后企业发现了你，帮你把这5万块钱补上来。”

随着筹款需求的增长和捐赠市场的活跃度提升，引领性捐赠和配捐等激励方法出现，以激发公众参与捐赠。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副理事长叶盈向财新解释称，这种方式长期以来在国际筹款领域“再正常不过”。

她介绍说，国际上通常有两类做法：一种配捐由公益平台提供，当有捐赠人给予平台一笔大额配捐款后，由平台告诉上线的公益机构、在某个时间段内准备动员支持者们参与活动；另一种由公益机构直接发起，在自己筹来配捐的资金或一笔配捐承诺后，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等方式，动员更多的小额捐赠人参与。

“最早还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大型的基金会就在做配捐，而且还有很多。”一名企业基金会人士也表示，“只不过因为互联网平台太多钱了，导致这个本来很常规的辅助式的手段，一下被放大成了整个公益行业互联网筹款的基本逻辑。”

在中国，虽然配捐规则与国际相似，但实践中可能“走偏”。“这不是配捐本身的问题，而是行业治理和个案筹款模式的问题。”叶盈说。

财新调查发现，同样是以“配捐”为名的集资，资金流向却有“明”有“暗”。

其中，作为“明面”的“套捐”更为人熟知：机构自筹或动员救助对象自筹，通过“一起捐”等形式向公益项目注资，以套取对应的“配捐”。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99公益日”期间，腾讯基金会提供3亿元配捐，以及1亿元全年行业非限定资助资金。9月7日—9日三天外，腾讯公益还与地方慈善总会合作，先后举办了“河南专场”“重庆专场”“陕西专场”等。此外，如腾讯“520公益日”等，同样提供了千万元级配捐资金。



柯善孝诈骗案曝光后，中华儿慈会官网上贴出了一份告示，提醒捐赠人谨慎捐款。

“大病患者家庭对筹款和配捐的需求是非常猛烈的。所以不管是在他们的号召上，还是能够付出的金额上，都是非常及时并且巨大的。”赵鑫告诉财新。

财新获得的多个“配捐群”截图显示，组织人会在群内放出配比较高的项目链接和可获得配捐的“额度”，动员患者家属在群内接龙报名。如有项目要求，家长报名额度最高不超过20万元，应提供2023年未在儿慈会核销过的发票原件，且需完成报名额度的80%以上才拨付配捐。“本来还有个十二万的，只有三个名额，当时手机没在我手上，就没抢到！”方小龙当时很懊悔，“现在想想幸亏没有抢到。”

多名9958前工作人员，或接触过配捐项目的公益人告诉财新，当前的“套捐”模式下，患者家庭通常直接向网络平台筹款链接打款，其资金流入作为收款方的公募机构，再由公募机构转款至救助对象的医院账户或个人账户。

与之相对则另有一类暗箱操作手法，即直接向私人账户打款，向伪装成“配捐”的商业化公益广告投流。这一模式因其链条隐秘，并不广为人知，也与配捐初衷相去甚远。

“这笔钱严格来说不是（为了）配捐的钱，就是各方为了好理解，把它形容成了配捐。”有近15年公益从业经历的公益人杨和南（化名）说，“大头都是买广告的”。

杨和南告诉财新，他曾收到大病项目的求助，并于2022年底前往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调研，向当地志愿者了解大病筹款现状，惊讶地发现了这一套“暗箱玩法”：类似柯善孝这样的“资深志愿者”以配捐名义，经中间人介绍，层层吸收患者家庭资金，向朋友圈、微博、抖音、百度等商业平台投放公益广告，吸收公众捐款。

另一位公益人刘萌（化名）同样证实了上述模式：当前，商业化公益广告的投资回报率（ROI）在1∶1.15到1∶1.3之间。这意味着，每付出1000万元投流费用，可吸收约1150万—1300万元社会捐赠。这之中，为“配捐”筹资的患者家庭实则是“投流费”的主要埋单人。

据财新了解，投流主要由广告代理商操盘，会依据实时ROI高低，不断更换公益广告文案、配图、编排方式，以达到最大程度“破圈”效果。这些公益广告的出演人，有可能是真实的大病救助当事人，也可能是经过安排与设计的“剧本角色”。

“投流是完全市场经济导向的，当下投得不好，（广告商）就马上停止，基本上能在一定范围内保证投资回报比。”杨和南介绍说。当然，投流也可能出现亏损，“这也是需要‘柯善孝’们的原因，他们的能力足够强，能筹钱，亏损了也能靠东挪西借（补上）”。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叶盈开始明显感觉到公益广告“泛滥”。爱心人士凌可（化名）也发现，近半年来，或眼眶黢黑、嚎啕大哭，或身穿病服、虚弱无力的孩子频繁出现在各类社交平台的推流中。视频上，醒目的黄色或红色文字讲述着孩子的病情，发出“救救我”“请好心人帮帮我们”等呼声，并配以曲调悲苦的背景音乐。出于不忍，她曾点开捐款链接希望略尽薄力，但一次捐款后，这类广告便完全占满了她的信息流，且大多来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等。

财新咨询了多家广告投流商。一家代理商表示，只要提供公募机构法人登记证书、营业执照以及法人身份证正

反面，即可代为投放广告并进行推流。一名朋友圈广告投流商介绍称，自己此前做过大病类公益广告投放，价格与商业广告一致，均为3000元曝光20万次、1万元曝光80万次、2万元曝光200万次。根据他提供的数据，此前经手投流的公益类广告点击率达到42.39%。

值得注意的是，公益广告通常以公募机构的名义推流，捐款链接也会跳转到对应公募机构网页/小程序，但多名公益人告诉财新，这类商业化投流费用“可以完全不走基金会的账”“没法从基金会账目上追溯”。

被卷入柯善孝事件的一名“中间人”反映，“配捐”活动“一年到头都有”“一个月能有好几次”。参投的患者家属之所以信任柯善孝，是因为此前向其私人账户打款后，确实收到了包含配捐的“回款”。财新了解到，此轮“爆雷”的“配捐”发起于今年7月底8月初，柯善孝承诺在8月份内回款，并非“99公益日”配捐时段。

事实上，早在柯善孝“诈骗”风波之前，已有多起大病救助“配捐”跑路的消息曝出，且均为私人账户集资。2017年，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上百名血液病患者及其家属，被同梦基金会秘书长刘建以“慈善配捐”名义骗走近千万元；2021年，数十个白血病重症患儿家庭遭遇同样骗局，交至“爱心人士”王亚男手中用于“筹款配捐”的上百万元款项不知所终。

与此同时，“广告模式”正越来越“卷”。“2020年时，抖音的ROI可以达到1∶1.7，现在1∶1.3都困难。”事件爆料人、公益博主陈鹰（化名）告诉财新。

“流量越来越贵，尤其是在大家都学会了这个投流模式以后。甚至可以说是病人之间的竞争，拉高了广告成本。”杨和南说。

患者家庭的感受，则是“配捐”越来越少。“一开始投入和‘配捐’比例是1∶1，后来两三万能拿回几千块，现在投进去十万，拿不回一万。”李翔说。但即使“收益”如此贫瘠，“90%的病友还是会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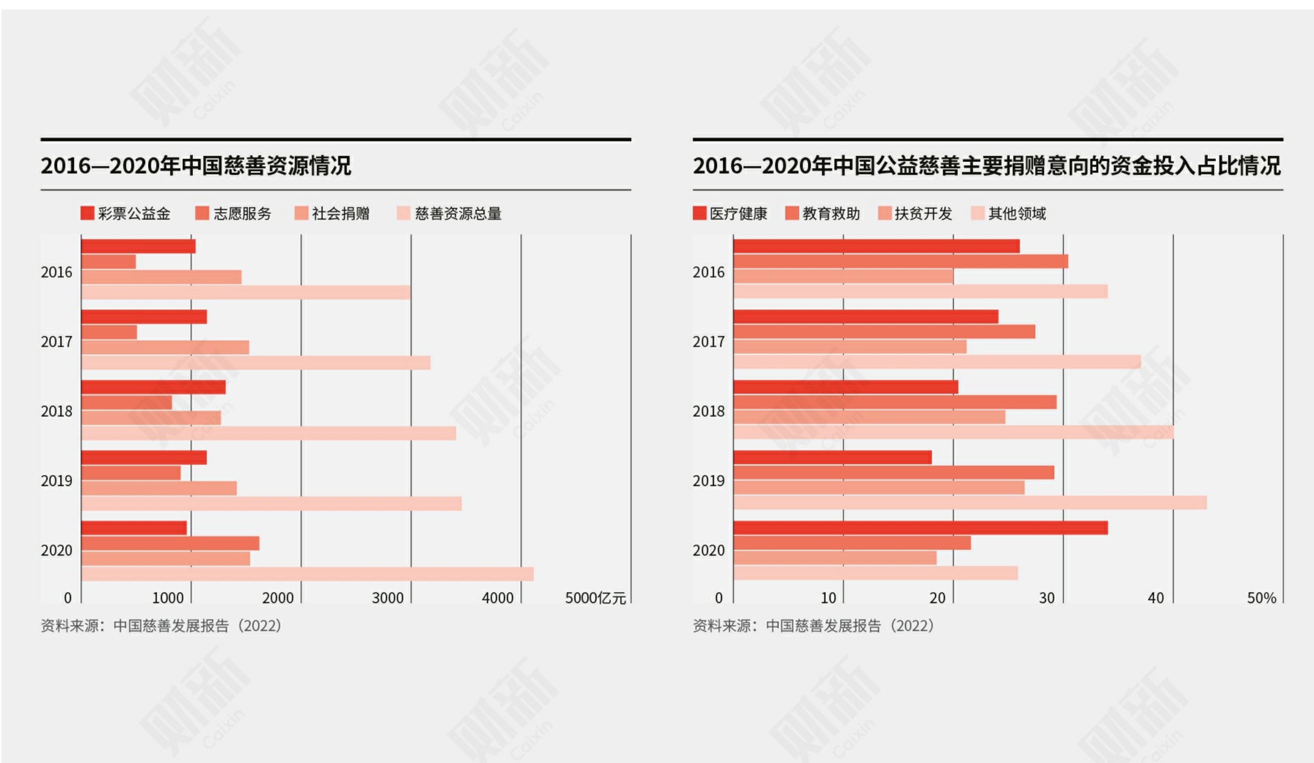
而在刘萌看来，最残酷的是，公众为爱心广告捐助的实打实的善款，却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反哺”高昂的投流费用。数十万、数百万元公众捐助，真正能到达大病家庭手中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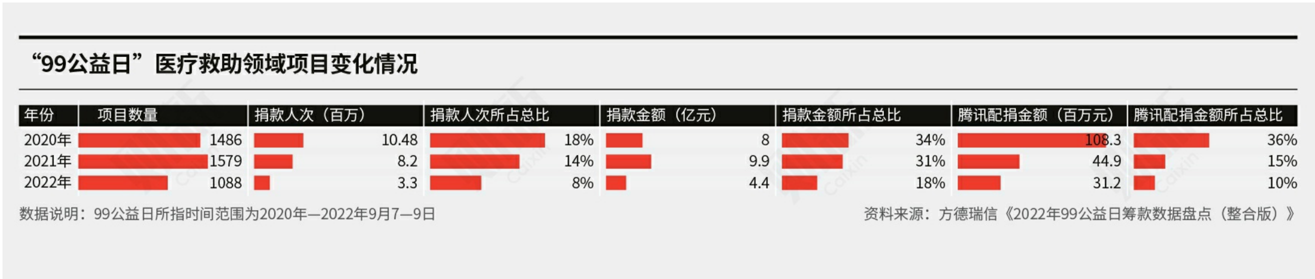
“家长们不知道，或者没猜到里面有猫腻吗？”杨和南感慨，“但他们愿意。没有这套‘暗箱操作’，他们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多名受骗家长也向财新表达担忧：一方面，他们希望公开求助，追回救命钱；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曝光会彻底斩断这条路。

“公益行业的骄傲”

相比患者家庭容忍“黑箱”、拿救命钱换善款，拥有募款资质的机构或是更大获益者。“儿慈会是我们行业的骄傲，它的9958，每一年在‘99公益日’都是大赢家。”一位资深慈善学者说。

纵观“99公益日”筹款TOP名单，在河南省慈善总会、重庆市慈善总会等一众“省”字头慈善会中，儿慈会是为数不多能跻身其中的“民间势力”。“直到现在，儿慈会的公众募款比例都保持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民间公益组织负责人陈阳（化名）不无褒扬地感叹。他提及儿慈会的特点：“他们待人接物还是比较有草根思维的，不像其他基金会那么官样气派。”





业内常把儿慈会成功的原因归结以下三点：首批入局互联网筹款、大量资助民间公益机构、专攻儿童救助赛道。最能凸显上述特质的，正是儿慈会9958儿童大病紧急救助项目——截至今年2月，9958的总筹款已超过16亿元。中华儿慈会理事长王林自豪地以“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来形容9958在公益领域内“慈善标杆”的地位。

官方信息显示，9958项目为“联合劝募”机制。儿慈会并非项目主要的执行机构，而是依靠9958遍布全国的“网络分中心”找寻救助对象、筹集善款。这些“分中心”多为地方NPO组织（非营利组织），与9958为“合作伙伴”关系。官方信息显示，9958有上述分中心团队超20个，包括石家庄团队、上海团队、兰州团队、沈阳团队、菏泽团队，以及柯善孝曾参与过的廊坊团队等。

一名9958项目前志愿者李瑜（化名）告诉财新，现实中儿慈会和地方站点的关系极为松散：“救助站没有你想的那么正规，如果一个志愿者愿意做这个事，那么9958就可以给他所在的地方成立一个站点，可以理解为一个试运行点。做得好就可以继续，做得不好，那么就撤销，往往先有志愿者，才有站点。”

“儿慈会这些年在全国扶持起了大量草根机构。”陈阳说，“我们亲眼见证一个团队，从当初一个志愿者——什么也没有，连办公室也没有，变成了现在十多个人的团队，项目体量、服务对象的数量都非常可观。”

当然，不是只有儿慈会乐于发展盟友。一名公益行业从业者透露，很多公募基金会十分乐于接受非公募伙伴的挂靠申请，“按照慈善法规定，公募基金会可以从中合法提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大病类项目提取比例一般较其他项目更低，但由于大病项目筹款额高，积少成多也十分可观。”一般来说，吸纳非公募伙伴更加重要的意义是，“提高公募基金会整体筹款体量”。

“儿慈会对9958的管理逻辑可以说完全是商业管理的逻辑，核心是谁筹得多，就越能获得基金激励金、人员方面的资源倾斜。”接触过9958团队的前公益人士季风（化名）介绍说。另一9958地方站志愿者则提及，儿慈会和地方团队约定了项目执行费分成比例，“通常是五比五，地方团队做得好的，儿慈会可以让点”。

公开资料显示，2016—2020年五年时间里，9958项目的年度收入金额从0.86亿激增至3.21亿元。当慈善圈因疫情和经济双重冲击普遍筹款难时，9958在2021年、2022年收入金额依然分别达到2.62亿、2.27亿元。

主体为各地草根团队的募款力量，怎么筹来这么多钱？

李瑜记得，在腾讯首次推出“99公益日”配捐的2015年，整个团队都为1∶1的超高配捐比激动。“那年真是想把所有资源都往上堆。我今年一年能捐1万，我就把这1万的配额全都放在那一天，就等着那一天配捐。”他回忆说，“我们那时候每年筹款都是主要靠这个来抓的，‘99公益日’能占到（总筹款额）一半以上，这是不夸张的。”

同一时期，“内容经济”热潮兴起，今日头条启动头条号计划、抖音初露锋芒、腾讯加快企鹅号等“大内容”布局，也让大病项目求助者和救助人看到新的筹款机会。“那时候，在（今日）头条、天天快报上投一个大病求助，靠文案、靠故事，一天筹到100万都是可能的。”李翔回忆说。前述9958地方站志愿者也提及，团队曾与企鹅号公益报道团、微博“蓝色生命线”、字节“感光计划”等广泛合作，以大病患者报道、公益图片等形式募集爱心捐赠。

近两年来，上述渠道的募资能力显著下降：腾讯公益调整“99公益日”配捐规则，各类大病救助项目“套捐”空间大幅收窄；“个案+新媒体曝光”的模式，则逐渐丧失公众注意力上的竞争优势。“后来发抖音、发快手，都筹不到钱了，除非自己买流量。”刘萌发现。

随之悄然蔓延的，正是更具“破圈”优势的商业投流。财新在一张“9958—渭南分中心”微博推流截图上看到，该视频有一位衣着破旧、充满脏污的小女孩出镜，配有“父亲工地打工意外身亡，9岁女孩辍学照顾精神病母亲，靠放牛拾荒为生的她撑起半个家”“我与爷爷一起捡树皮”等抓眼球的文案。而9月13日，陈鹰已在微博公开举报，称儿慈会9958渭南负责人曾指挥患儿家属将资金打给个人账户进行“操作”。

另据网友反映，微信朋友圈也曾出现以“中华儿慈会”名义推流的广告，文案包括“50元，买不到一件衣服，却是大病孩子生命延续的希望”“轻轻地碰着你的脸，让妈妈为你把眼泪擦干”等。

参考各大平台现有的商业广告ROI，公益广告投流的筹款成本极高。“慈善法规定，慈善机构可以用非限定性资产打（商业化）广告。但假设基金会自己花了1000万非限给公益项目推流，获得1300万公众筹款，而基金会只能提取10%，也就是130万的执行费。你觉得基金会有动力去做这件事吗？”刘萌直言。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动员家长“套捐”，还是向家长集资“投流”，除筹款时亮出公募机构品牌，在此后许多关键环节中，公募机构都在某种程度上隐身了。一名曾参与投流的知情人向财新举例说，吸收了家属资金的“中间人”可依托一家商贸公司，以“爱心企业”身份和儿慈会签订委托协议，再用对公账户向腾讯微盟打款；这一流程中，公募机构、平台、企业都“走了正规程序”，相关投流费用也不会计入儿慈会账目中。

2022年下半年，西安善行公益慈善基金会被曝以霸屏式催泪广告诱捐，巨额善款流向成谜；今年6月，该基金会因以投资名义向企业借款、擅自改变慈善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等“五宗罪”，被西安市民政局吊销牌照，折射公益广告投流背后的“黑产”一角。

前述9958地方站志愿者告诉财新，从项目执行上看，儿慈会相关的大病救助项目基本能落到实处。“要是走儿慈会的流程，一个申请救助的小孩，需要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要有最近3个月内的住院病历首页、诊断证明，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父母手拿申请表的照片。儿慈会拨款前，还会电话给家长核实，是不是地方团队申请了这笔钱？有没有这回事？这笔钱怎么走？如果没打通，儿慈会也不会转款。”该志愿者强调，“儿慈会确实帮助到了很多人，这也是许多患儿家长对儿慈会心存感激的原因。”

但慈善界亦不乏声音质疑儿慈会有失“公益”。“公益必须是资助非特定人群，那才是公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解释说，“商业交换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出的钱东西就是我的，不能给你。但这个逻辑如果换到公益上，它就不再是公益了。”理想状态下，捐赠端与受益端中间的信息应该被屏蔽，但在上述两种模式中，无论是捐赠人还是广告“出资人”，都与受益人相同。

“这对儿慈会甚至整个公益行业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事件。”前述公益行业学者指出，“能拖就拖，能躲避就躲避的‘鸵鸟心态’是不对的。需要作出正面回应，否则慈善事业的上升势头就会中止，甚至像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的影响一样，造成元气大伤的后果。那会是各方损失的最大化。”

平台规则博弈

对于公益行业筹款乱象，互联网平台是严防死守还是推波助澜？

“近两年，大病类项目在评估模型中整体得分不高，‘99公益日’期间得到的配捐都比较有限。”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刘琴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但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儿慈会有一些其他项目，结合我们实地调研的结果，评估得分是较高的。”她透露，2022年“99公益日”给9958项目的配捐额不超过300万元。

刘琴认为，将“柯善孝们”口中所说的“配捐”与腾讯公益的配捐规则关联起来，进而指责配捐是一个天然存在漏洞的机制，并不客观、也不公平。随着近两年腾讯公益相关机制的完善，对种种乱象“一直都是零容忍的态度”。如今，“柯善孝们”已经很难用传统、粗暴的“刷单”等手段，从腾讯公益平台上轻易套取流量和“配捐”。

通常认为，在公益行业乱象中，互联网募捐平台更多是规则被钻了漏洞的受害方。无论是“套捐模式”还是“广告模式”，都极大地背离了平台运营的本意。

事实上，腾讯公益联合各方所打造的“99公益日”长期被公益研究者们视为“平台向善”“公益创新”，带动中国社会募捐高速成长的标杆。“99公益日”2015年诞生以来，截至2022年底，共有超过2.8亿人次在“99公益日”期间进行了爱心捐赠，公众捐赠总额超过130.53亿元。腾讯基金会所支持的配捐，给慈善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99公益日”提供了直观的现金激励，是“99公益日”最显著的创新，也被视作成功的诀窍。

但也有一些公益人士认为，互联网募捐平台的既有规则，加上其掌握的巨大资源，给一线公益人士带来了压力，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做大项目的筹款规模和人数。“在平台上，很容易‘赢家通吃’。”一名小型公益机构负责人说，“项目筹款少，分数就低，拿到的‘配捐’就少，草根组织很难有机会。参加过两次‘99公益日’，我都是自己贴钱，还会把钱转给别的病友，多给项目里捐几笔换‘配捐’。最后筹的没有贴的多。”

刘琴告诉财新，从2021年“99公益日”开始，腾讯公益使用了一套评估项目“健康度”的算法模型，“到目前为止迭代了七八个版本”。模型包括六个一级指标，即项目透明度、项目质量、对捐赠人服务、项目自筹能力、项目影响能力及第三方公信力评估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各有16和43个。

“这些指标基于腾讯公益十几年来沉淀的数据，能够在我们自己的体系里进行量化，最终转化为公益项目一个满分100分的分数。分数值与项目的配捐有对应关系。此外，项目背后有公募机构和执行机构，对于机构我们也会以相似的维度产生一个分数。”刘琴介绍说。

对大机构、大项目有利的规则，在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上一度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如何分配流量的问题上，平台普遍将推广和曝光机会与公益项目的筹款人数、金额等指标挂钩。以支付宝公益为例，其规定只要自筹满筹款金额20%，以及捐赠人数达到1%（总筹款额的1%），就有机会获得流量位。例如，筹款目标金额为20万元，自筹金额需4万元，且需2000个不同的捐赠人。

叶盈解释说，平台也有苦衷。“‘首页’是一个稀缺资源，上谁、不上谁，必须要有一个标准。但平台又无法做到按项目质量好坏来判断。最终设置的流量分配规则，很多时候是‘权宜之计’。”

刘萌觉得，“自筹”类规则的本意或许是让公益项目“求救先自救”，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快就被人钻了漏洞，“一些家长为了让自己的项目上首页，就是往里充钱。结果，他们把很多没钱的、没有能力自筹20%的家长，全部赶下了平台。”

叶盈介绍说，现在许多互联网募捐平台也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开发并应用了“千人千面”算法。“这种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画像，给每个人推送不同的首页内容。这就是为了防止机构去研究规则、钻漏洞。”叶盈还说，这种算法是近两三年逐步成熟起来的，“尤其今年公益机构对这一变化有明显体感，它们发现自己搞不清楚首页的算法了。”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平台的问题在于重点对接公益机构，疏于审核具体项目，将评估、跟踪、监督的责任丢给了机构。一方面，平台需要公益项目的内容和动员能力，帮助其做大品牌、吸引流量；另一方面，平台也惧怕公益项目“爆雷”，损害平台公信力，进而连累企业品牌。

不过，刘琴表示，腾讯公益已经对每一个捐赠人、每一笔捐款都有所留意，投入了相当多的风险控制资源。比如，算法每次产生随机配捐金额时，会评估用户身份。算法将参与社会募捐的用户分为三类，一类是公益的“倡导者”，他们更倾向于积极发起“一起捐”和“助力配捐”；一类是“长期参与者”，如月捐超过12个月、连续99天“捐步数”；最后一类是“响应者”，相对偶发地参加公益。算法会向“长期参与者”倾斜配捐额度。

同时，腾讯公益建立了线上风控体系。“2019年开始，我们发现‘99公益日’中一些捐赠是不太合理的，比如一个人在同一IP下，一分钟内捐赠几百笔，这是非常典型的刷单模式。”刘琴说。为此，腾讯公益和腾讯的风控团队联合搭建和迭代了一个AI风控模型，对“套捐”“刷单”等可疑行为，及可疑账户进行分辨，“对于在平台上的每一笔公益捐赠的交易，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进行风险评估”。

在“99公益日”期间，腾讯公益会实时拦截涉嫌“黑灰产”的捐赠。“涉嫌‘黑灰产’捐赠，我们是不予配捐的，实施拦截之后会告知公募机构，希望公募机构自查并向主管部门汇报。”此外，每次“99公益日”结束后，腾讯公益会开展数据对账，对所有公益项目的数据进行风控分析。

这其中，乱象频发、需求凶猛的大病救助项目，已经在包括腾讯公益在内的多个平台成为重点风控对象。

刘琴提到，大病救助项目很容易出现“个案打包”成群体性项目的现象。按照相关法规，个案救助不能参与公募，不符合公益的题中之义，一经发现，腾讯公益对这类项目会“零配捐”处理。

然而，无论募捐平台算法如何完善，大病救助的筹款需求始终凶猛。当大病救助项目发现公益性平台的流量不再能通过“老办法”获得，其本能的反应是流向本不为其而设的商业平台，去新的“池子”里攫取流量。

“以前的‘套捐’模式，不再有那么高的投入产出比后，‘广告模式’就是一片新天地。不仅筹款效果不错，还有提升品牌、扩大知名度、增加曝光的优势。”叶盈说。

民政部共指定过三批3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随着今年7月百度公益低调“下线”，目前共29家。无论规模大小，它们遵守着一个基本原则：与商业化的互联网平台相独立，不按商业项目的标准收取推广费用。

而在“广告”模式下，“防火墙”被打破了。本不该出现在“游戏”里的“玩家”——商业平台的广告部门，能够获得不小的利益，亦不会单独披露。多家广告投流代理商表示，在商业平台上，公益项目和商业项目的收费标准完全一样，只要“中间人”通过了资质审核，就会被平台视为公益机构合法合规的广告投放，按商业逻辑运行。

据财新了解，每家商业化互联网平台都有不同程度的审核机制，防止来路不明的人员给公益项目投放商业化广告。接到此类需求时，平台基本都会要求提供《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等文件，一些平台还在内部设置了“白名单”，只对一部分大型公益机构开放商业化广告。

对广告费的来源和流经途径，各家要求不一。有些平台严格要求“公对公”，即钱款必须由机构账户流出，注入平台账户；有些平台要求广告费必须汇往其指定的广告商专门为公益机构开设的账户；也有些平台相对松散，私人可以以“执行方”为名，直接在投流商处开设专属账户，向其中汇款。

但据刘萌、杨和南、陈鹰等人，这其中绝大多数要求是可以“绕开”的。如要求“公对公”，“中间人”可以自己成立一家企业，与公募基金会签订委托书，再向平台汇款。如果需要向公募基金会的专属账户汇款，可以向基金会索要相关账户信息。至于公募基金会的资质证书等文件，只要与基金会总部保持合作，更是比较容易获得。



2020年10月30日，北京，一家人陪患白血病的孩子等待干细胞移植手术前的体检。自7月确诊以来，基因鉴定与化疗费用已经耗尽了这个家庭的全部积蓄。

“有时不仅是‘打广告’，我还会主动告诉家长，机构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发了你们的项目，可以花1000元买点热度试试，效果好再加。”刘萌说，“不买热度，就没人注意，就募不到款。可是我一边劝他们一边想，凭什么这些钱进了平台的口袋？”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也开始留意到一些迹象。但要杜绝“广告模式”，需要拉通公益性平台和商业化平台的信息，堵住审核漏洞，这又将是一轮新的博弈。

刘琴说，在西安善行事件发生后，腾讯公益拉通了商业广告部门和公益部门，重新梳理了公益广告投放的准入要求。目前，在腾讯商业平台上投放的广告，公益机构的社会组织评估等级需达到4A级，同时机构成立年份应在五年以上。另外，点击广告后的落地页面必须是腾讯公益上线两年以上的公益项目，不能跳转其他募捐平台。“尤其是大病类的筹款项目，现在是坚决不给投了。”

不过，经财新咨询，目前市面上仍有广告投流商表示，在提供公募基金会的相关资质证书后，可以在微信朋友圈、抖音、新浪微博等平台投放公益项目广告。

灰色生命线

此次柯善孝事件曝光后，多家公益平台作出反应。9月13日下午，腾讯公益平台、新浪微公益平台发布声明称，决定暂停9958在平台上的所有项目筹款，等待儿慈会针对此事的情况说明及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并根据最终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一些响应范围更波及至9958之外。字节跳动公益下线了儿慈会的全部项目，目前其平台上的62个儿慈会相关项目均显示“暂不接受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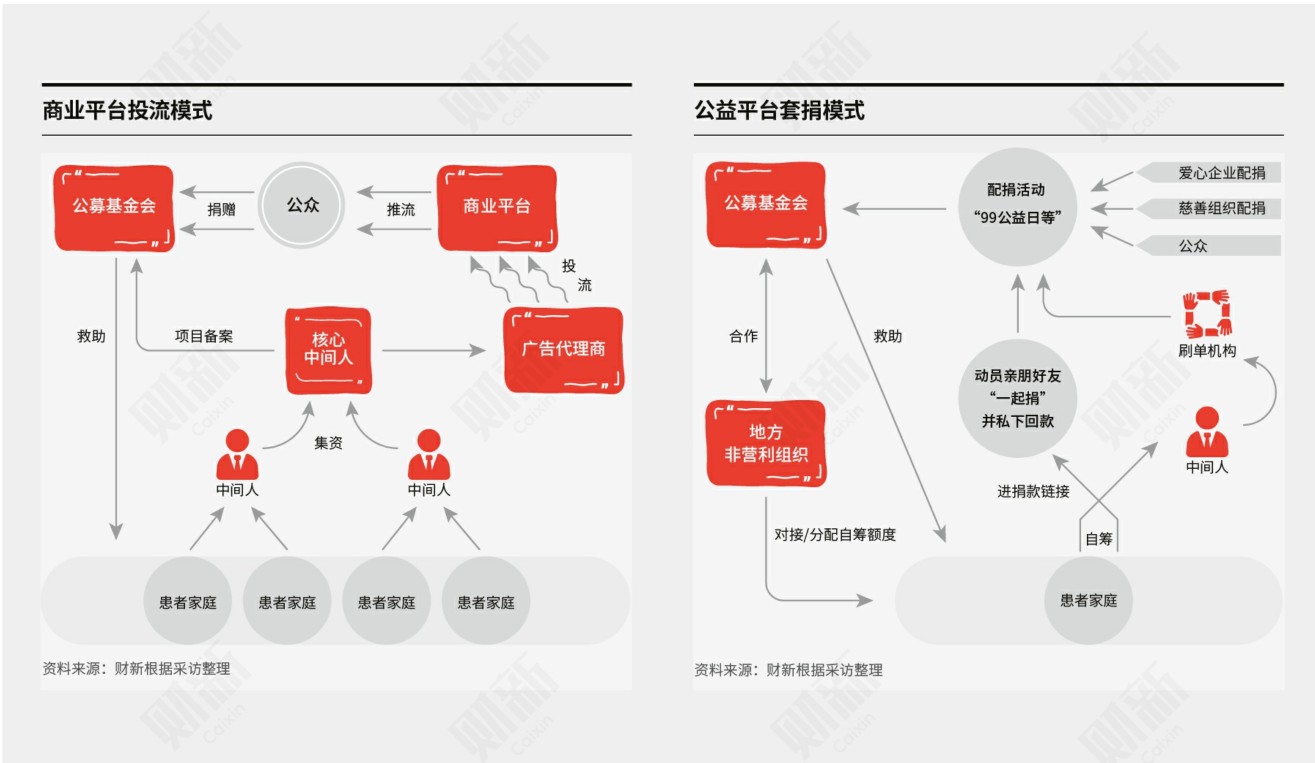
支付宝公益亦向财新表示，关注到行业内个别大病救助项目存在风险，第一时间下线了涉事项目筹款，同时关闭了相关公募机构其他项目推荐；此外，平台已在近期要求机构自查大病类项目，并暂停同类项目上线审核，待排查完成后再做进一步处置。

但问题并未就此终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高华俊担忧，柯善孝事件导致配捐模式甚至“99公益

日”的污名化，会挫伤好不容易动员起来的社会参与慈善的热情。“对各方来说，这个事件最大的损失就是慈善事业的停滞。”

而失去了公益平台筹款的最后稻草，大量大病家庭仍在等待救助，后续筹款更成问号。

“刚开始家长曝光这个事的时候，甚至有家长说，这个曝光对他们的影响是糟糕的。我们去讲这些，我们不知道是在帮助这些家长，还是真的就像有个家长说的，在害他们。”杨和南说，“一禁了之是整个行业的惯例，而我恰恰想研讨的就是，我们不能一禁了之。”



叶盈也直言，业内对这些“畸形生态”早已知晓，但破局颇为复杂，还存在伦理难题——如果大病救助个案筹款的渠道就此一刀切断，公益行业或许可以保住，现实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你把这些家庭又一条路断了，但是你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另外一条补充资金的来源。可是那是救命钱，那都是真实发生在病房里的每时每分，每天需要那么几百上千块钱的事儿。”

她担心，这可能将大病家庭推向更为隐蔽和更加边缘的方向，比如地下钱庄和高利贷机构。

这条灰色生命线，导向一道“电车难题”般的伦理两难：铁轨的一边，是大病家庭切实的困境和需求；另一边，是公益行业迫切需要重建和维护的公信力。

对公益行业而言，这不是第一次经历风暴，更不是第一次接近亟待抉择的关口。2020年初，贵州大学生吴花燕因病抢救无效死亡，作为主要捐助组织的9958因“百万善款仅支出两万”遭公众质疑。

公开资料显示，当时的百余万元善款系9958在微公益和水滴公益两家平台筹集。儿慈会调查后称，9958项目募捐方案的受益人为0—18岁的困境大病儿童，吴花燕的年龄超出了救助范围，因此将百余万元善款全部原路退回给捐助人。

在这一标志性事件后，“电车”似已偏向了一方：互联网公益平台的个案筹款渠道逐渐萎缩。大病救助领域因案例多、需求大，受到影响尤为严重。

据财新梳理，平台限制措施包括多种。例如腾讯公益，通过AI风控模型和拦截“黑灰产”捐赠，约束健康度较低的大病救助类项目筹款。

方德瑞信对2022年腾讯“99公益日”的筹款数据分析显示，与2021年度“99公益日”相比，2022年度，包括大病救助类的医疗救助领域筹款额从9.9亿直降至4.4亿元，捐赠人次从820万降至330万，腾讯相应的配捐总额亦从4490万跌至3120万元。

其他多家公益平台的限制措施，则包括暂停项目上线，抑或大幅延长审核周期。

赵鑫告诉财新，以前互联网公益平台可以发大病求助类个案筹款项目，但是近来审核极其严格，“现在上独立项目越来越难了”。

今日头条于2018年推出的“感光计划”，通过发布困境家庭的图片故事助力募款，曾为大病救助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在2021年11月后，其官方头条账号未再发布文章，官方抖音账号也显示“已被封禁”。

在新浪微博，聚焦大病救助个案的“蓝色生命线”项目过去每月都会在微博公益简报中被提及。2023年4月的公

益简报称，项目当月共召集爱心网友助力70066人次，共募集善款125.69万元。但从5月开始，“蓝色生命线”项目也不再出现在微博公益简报中。

8月，支付宝公益平台因“一帮一”项目出现舆情，亦将其下线整改。

基于公益平台的大病个案筹款空间被挤压，一部分患者家庭走向更加直接的“个人求助”，典型如通过水滴筹、轻松筹，或是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内容。

在李翔看来，现在剩下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做抖音、快手，吸引关注，“等你的粉丝量上去了，流量上去了，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水滴的链接带在上面，那是效果最好的。有的人能筹到20万、30万”。

但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同样在下滑。为了给12岁的女儿筹钱治疗，余亮（化名）尝试过这个方法。他的女儿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天津治疗时已花费20万元，来到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的三个月内，又投入50万元。

余亮和妻子两个人分别开始做短视频，一个在抖音筹了30多万元，一个在快手筹了十几万元，加上其他“好心人”捐赠，拼拼凑凑到现在。“花了70多万，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滚开的。”余亮说。

不过，从2023年5月开始，余亮的抖音账号几次被封禁，合计“关”了90天。系统提示他“作品违规”，但未解释细则。他还发现，抖音也挂不了水滴或者轻松的链接了；现在只能使用妻子的快手账号，每个月能筹到一两千元。

在水滴筹、轻松筹上募捐，也面临另一重困局。李翔表示：“这实际上就是筹你的人脉，你平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你值多少钱。”一个陪妻子从广东到河北治疗急性白血病的家属告诉财新，妻子刚病不久，他用轻松筹筹了4万多元，“其实都是亲朋好友，也不好意思再筹”。

叶盈认为，水滴筹、轻松筹这类筹款工具的出现，在一个时间段内确实提升了救助效率和救助量，但“随着它跃出了普通人自救的朋友圈范围，变成一个触达熟人圈之外的公共性的平台，就会出现脱离熟人社会后的信息不对称、验真漏洞和关系制约，于是各种‘妖魔鬼怪’就出来了”。

高额诈骗等乱象影响平台公信力，导致个人求助的筹款效率下滑，最终又回归到了熟人社会。“实际上是公益机构逃避了它们的责任，把筹款的很多工作甩给了受益人——这些最需要资金的、处于困境中的个体。就是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些标准化的服务和通道，你能不能筹到钱，要看你自己的动员能力。”叶盈说。

面对这些变化，刘萌不解地悲叹：“‘蓝色生命线’挂了之后，那天我眼泪出来了，我说‘蓝色生命线’是孩子们最后一条生命线，没了。现在全国没有给大病家长发起个案的平台了，除了轻松筹和水滴筹。腾讯不让发了，支付宝不让发了，抖音不让发了。”

“你看看哪个平台给个案家庭一个求助的机会？难道个案救助真的不该救吗？”刘萌疑问。

悖论在于，“个案救助”或许符合人们朴素的捐赠心理，但多位公益行业人士无奈地表示，在理论上，这种模式实际有违公益“非特定资助”的初衷。现行《慈善法》第36条和第54条也分别规定，捐赠人及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均不得指定其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

叶盈更强调，大病救助类项目的筹款问题，根源即在于过度依赖个案筹款。“个案筹款注定会带来各种逐利行为，是它本身这种模式会放大人性弱点。配捐只是诱因，不是根源。”

她解释说，首先，个案筹款与个人求助类似，筹款效果依赖于受益人的“素材”或社会资源，本质上也蕴含着不平等。其次，当筹款主体以个案筹款作为运营经费的主要收入来源时，难免会滑向追逐流量和筹款额的陷阱。再者，大规模采用个案筹款造成行业刻板印象，很容易让公众误以为公益慈善组织“当中间商赚差价”。

“这种玩法特别容易把公益机构变成一个金融工具，而不是一个能够去第三次分配资源、有专业属性的角色。”叶盈说，“我认为这个是公益机构首先需要澄清自己的目标与定位、必须要转变、回归使命的事情。”

在贾西津看来，当前的个案救助有点像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在短期是有价值的，“因为你现在的公益那么弱，生态就是那么小，解决不了他的急需”。但她也表示，“长远而言，它还是需要走向一个更健康的公益生态”。

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电车难题”的路口：谁将拉下操纵杆？还有没有其他出路？

一条此前就较为明确的路径，是推广群体性救助项目，只是转轨异常困难。

在2018年的公益筹款人大会上，方德瑞信曾召集大病救助的各种基金会和平台开闭门会，专题讨论重度依赖个案筹款模式的风险，以及如何改变。“但是很可惜，没有办法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叶盈说。

“我们作为一个民间的行业组织，其实没有什么话语权与执法权，只能尽可能做筹款伦理理念上的倡导，基于数据与一线观察，努力说服有共同理念的上游调整规则，同时鼓励同行遵守筹款伦理。但是，这种畸形生态与利益链一旦形成，就很难转向。”她表示，曾有过基金会做过尝试，“但是很明显，患者家庭一旦知道筹的钱并不是给到自己的，就完全没有动力去做筹款了。”

公益平台和基金会之间，虽然就个案筹款模式的风险有共识，但对于转向的态度亦存在分别。

叶盈观察到，平台的人基本同意，反而是一些基金会不愿意。“当这些做大病救助的机构已经习惯让患者家庭自己筹自己的、激发极大的动力之后，是非常难有勇气和决心去做白手起家的群体性筹款的。”

“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竞争的问题。比如说如果9958瘫痪了，会不会冒出来另一个机构，就把它原来这个盘子上患者家属们习惯的玩法做大了？”叶盈解释说，“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可能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局中人是不会主动踏出第一步的。”

她提出，想要改变这个局面，需要民政部门牵头，设定一个变化的议程；需要给公益机构一定时间，逐步降低个案筹款的比重，投放更多的精力在设计、研发大病领域的群体性项目筹款；在此过程中，完成对捐赠人的教育；以及由平台方给予群体性救助项目更多的政策倾斜——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需要一套过渡方案，不能就此对过往的个案筹款模式“一刀切”。

“这必须是一个多方都认同不得不做的事，才有可能。”叶盈说。

2018年，方德瑞信与七悦公益在南都基金会与敦和基金会资助下，联合研发推出了《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并分别于2019年、2022年修订更新，明确指出公益慈善筹款不应以受益人筹款资源与能力进行资源匹配。

从平台的角度，刘琴也表示：“虽然个别机构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这些需要救助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多的，如果腾讯都把这条路径给他们关掉了，肯定不符合腾讯公益平台本身在运营的逻辑或者方向。”

她亦认同群体类救助项目的价值，并提出，针对现有的个案救助，平台应该为公益机构提供更多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和方法，让资金管理更加透明、增加信任度。

刘琴举例说，今年上半年，腾讯公益和微信支付、资金的团队已在研究，能否在受捐人的微信支付账户上开设一个专户，只能指定用于相关救助机构、医院等，“而现在平台上的这些资金的流向，可能更多是由公益机构和救助人自己去管理”。

还有业内人士提问：从根本上说，大病求助究竟是否应该被放入公益慈善的范围？“是不是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更合适，而不应该通过慈善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一名企业基金会人士表示。

高华俊解释称，目前中国的多层次医疗体系，包括国家普惠性三重保障制度、普惠型商业性保险，以及慈善医疗救助等，在这之中，“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与慈善医疗救助体系之间缺乏有机对接，合力不够，因而还发挥不出更大的整体功效，出现了重大疾病救助的一定缺口”。

贾西津也认为，因病致困、因病致穷的现象，与医保制度也相关，“不能期望公益就能解决，毕竟公益就保险而言，应该是一个辅助性的保险体系。”

“公益、互益、私益，还有通过税收全国统一的，都是多层次的。”贾西津指出，“每一个人其实是由多层次来保障不同的维度，这样出现事情的时候，才不至于到走投无路的境地。”

从定义上，群体性救助可归为“公益”，个案筹款和个人求助属于“私益”。

“互益”层面也有过尝试，不过从2020年11月，关于网络互助平台等监管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自2021年1月起，包括美团互助、轻松互助、水滴互助等多家网络互助平台相继关停；涉及人数规模最大的支付宝大病互助平台“相互宝”，也在2022年1月28日关停。

中国公益行业的前路仍长。2017年至2019年，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y Aid Foundation）有关慈善行为的调研称，就各国慈善水平而言，中国连续三年排在全球第140、第138和第142位。

另据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估计，美国每年的慈善捐赠总额基本保持在GDP的2%左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披露，2020年，全国捐赠总额仅占GDP的0.2%。

“它是个巨大的差异，表明这两个捐赠市场的成熟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规模是不可横向比较的。”叶盈说。

“我看有一些责难的文章，把责任扣在‘慈善市场化’上，我认为这个观点就比较偏了。”高华俊说，“‘配捐’以及任何一种募捐形式的创新，都是值得鼓励的。因为公益组织必须要创新，必须要有筹款能力，有资本增长能力，没有这些就没有发展。”

“公益组织应该注意的是，不管怎么筹款，要守牢基本的规则底线，例如钱绝对不能走个人账户；以及当你发展得很快，事业的版图扩张得很大时，管理的手段，包括督查、评估、监管的手段要跟上，跟不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高华俊补充。

“大病救助是不会凋亡的。但如果‘暗箱’不可行，‘明盘’怎么做？我也没有答案。”杨和南说，“不愿看到‘一禁了

之’，是我想把‘暗箱’公开的根本原因——希望全社会一起讨论，找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

屈运栩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邱祺璞

社论｜侵犯律师权益事件不应频发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法律共同体是公、检、法、律师共同解决法律问题的集体，目的是经过共同努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23年4月14日，江苏镇江，律师向小学生普及法律知识。律师的生存现状就是中国法治大气候的温度计。呵护律师行业健康发展，就是维护法治建设。图：视觉中国

近期，律师权益受侵事件频频发生。8月，广西来宾中院上演“律师未到庭，庭审已结束”闹剧。9月，在湖北随县法院，两名律师查阅、复制案件相关材料时，被带至羁押室训诫。上述两法院事后承认行为“不当”。近日，又有律师称在庭审时被检察人员咆哮辱骂为“讼棍”。律师执业权利频遭侵犯，侵害者俨然享受着轻佻的快意，令法律人士乃至公众十分忧虑。

律师是中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队伍。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超过65万人。他们奔走在中华大地上，在谋生的同时，为法治中国建设添砖加瓦。不过，律师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可以说，律师的生存现状就是中国法治大气候的温度计。呵护律师行业健康发展，就是维护法治建设；反之，律师执业权利频频受侵，就是刨掘法治根基。

有关部门曾为保障律师权利付出过努力。201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今年3月，最高检、司法部、全国律协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这些文件的条文均切中要害，然而，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旧三难”问题，还是法庭上发问难、质证难和辩论难的“新三难”问题，都严重困扰着广大律师。

律师权益保护不力，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因素。在帝制中国，讼师向来遭受轻视乃至蔑视。西风东渐后，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诞生，后又被打上“旧法”烙印。1950年，《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发布，律师制度随后被长期废止，直到1979年重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律师制度不断健全，然而，现有法律机制尚未给律师权益提供足够扎实的保障，机制和程序设计存在诸多不足与缺陷。司法机关依然占据绝对强势地位。律师背后虽有律协等组织，但是，总体而言，律协对律师管多于扶，在一些有关律师权利的争议中，律协甚至站到了律师的对立面。律师权益常常需要借助舆论才能得以维护。律师权利保障不到位的背后，则是某些司法机构的滥权，二者构成一体两面，显示法治中国建设任重道远。

越是在艰难时期，越要保持对律师行业的清醒认知，尤其要防范对其污名化。以刑事诉讼为例，在控辩审三方关系中，分工很容易被视为对立，甚至产生对抗情绪。公众对于律师也存在接受和理解的过程，直到本世纪初，“为坏人辩护”依旧是许多人心头难解的结。当然，一些律师充当掮客，两头吃，知法弄法，知法犯法，也容易让人们对律师产生反感。因此，必须准确理解律师的角色。他们通过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来实现法律的公平适用，却绝不意味着每一名律师都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替当事人辩护，实际上就是站在私权一边，防止公权滥用，客观上维护了公权的公信力。律师是自利的，不能以“青天老爷”思维苛求他们，但是，律师的价值也恰恰在此：通过控辩审三方的分立与制衡，尽可能将法律的公平正义送到每一个当事人身边。

格外令人忧虑的是，虽然严重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事件层出不穷，但是，侵害者却并没有受到严肃惩处。往往

是在舆论沸腾之后，司法机关以轻飘飘的道歉敷衍了之。这实际上是在纵容和鼓励对律师权利的进一步侵害。千万不要低估此类事件的恶劣影响。某些司法人员以种种手段阻挠律师行使职责，甚至公然侮辱律师，打击的是法庭内外亿万人对法律的信心。倘若侵犯律师执业权利却不必承担责任，用权者必会群起仿效，愈发肆无忌惮。律师若在侵害者面前低眉顺目，但那不是由于敬畏法律，而是惧怕权力。这将是中国法治的莫大悲哀。

改变律师权益保障薄弱的现状，根本出路还是不断深化司法改革，重塑法律共同体意识。多年前，法律共同体理念的引入，得到司法部门和学界的广泛认可，令广大律师倍感温暖和振奋。法律共同体是公、检、法、律师共同解决法律问题的集体，目的是经过共同努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19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提出，“办案中要真正把律师当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真诚尊重、真心支持。”然而，这一提法近来有式微之势。律师与法官的双向流动，一度被视为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之举，尤其是律师向法官的流动。遗憾的是，这一被寄予厚望的司法改革举措推进并不顺畅。在律师权益频遭侵害的当下，重申法律共同体理念，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对于律师行业所面临的局面，不必过度悲观。这一行业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终究会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道理极为浅显：欲把中国建成法治国家，把市场经济建成法治经济，就绝对离不开律师。对律师的态度，检验着建设法治国家愿望是否真诚。中国走向法治乃大势所趋，不会因为个别人对律师的粗暴行为而中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就取决于和谐健康的法律共同体能否形成。律师也需要宽厚、宽容和宽松。

（本文为即将于2023年09月25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38期社评）

版面编辑：肖子何

最新财新周刊丨缓解险企资本压力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监管部门一方面放松"偿二代"二期部分规则，一方面放行险企发行永续债补充核心资本，紧绷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正在缓解



"偿二代"二期开始实施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普遍下降。在业内的呼吁下，监管部门近日终于放松了"偿二代"二期的部分规则。

文丨财新周刊 吴雨俭

自2022年一季度以来，采用更加严格标准的"偿二代"二期开始实施，大、中、小型保险公司都普遍面临着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的压力（参见本刊2023年第32期《保险"偿二代"紧箍咒》）。

近日，在业内的呼吁下，监管部门终于放松了"偿二代"二期的部分规则，包括将计入核心资本的关键参数——10年期以上的保单未来盈余上限从35%提升至40%；同时降低了保险公司投资上市股票的风险因子，通过降低其资本占用，鼓励险资入市。

随后，泰康人寿获批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200亿元的永续债。这是保险行业第一单获批发行的永续债，也意味着保险公司尤其是大型险企在境内补充核心资本的渠道终于打通。

前述两大变化表明，无论是内源还是外源，保险行业在资本方面的压力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不过，缓解的程度有多大，仍值得继续关注。

除了资本层面的变动，近期在业务层面，银保渠道也迎来巨变：监管部门提出，将从8月31日开始"报行合一"。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保险公司压降银保渠道的手续费。

这是继2023年上半年下调3.5%预定利率产品后，寿险行业降低负债端成本以应对不断下降的投资端收益的又一重要手段。近几年，银保渠道的手续费佣金节节攀升，在2023年上半年增速尤为迅猛，这不仅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压力，也导致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合作难以持续。

不过，降费问题历来复杂。从行业历史经验看，不乏保险公司为争夺渠道而大打费率价格战。此外，2024年是保险行业的兑付高峰期，保费收入对部分可能存在大量现金流出的保险公司来说尤为珍贵。同时，由于银行息差不断收窄，包括银保手续费在内的中间业务收入，成了很多银行的增收新动能。在此背景下，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博弈，又将出现哪些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目前的规定，一家银行最多只能代理销售三家保险公司的产品，这也是银保渠道手续费高企的原因之一。财新从接近监管人士处获悉，相关办法或将迎来修订，征求意见稿已在路上。

松绑"偿二代"二期

2023年9月10日晚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监总局"）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下称《通知》），核心内容包括差异化资本监管、提升保单未来盈余、调低险资入市的风险因子等。目

的是通过松绑"偿二代"二期部分规则，在缓解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引导险资入市。

从一期到二期，"偿二代"最核心与显著的变化在于，保险公司将采用更加严格的资本认定标准和风险计量因子，由此导致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整体出现行业性下滑。据业内人士统计，2022年一季度末（即"偿二代"二期规则切换后），73家人身险公司核心资本合计较上一季度末下降近1.52万亿元。

也是因此，行业机构对于放松"偿二代"二期规则的呼声一直不断。总体来说，《通知》对"偿二代"二期几项规则的优化，主要通过抬升实际资本（分子）、降低最低资本（分母）的方式，提升保险资金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实际资本/最低资本），同时也让保险公司在投资上市权益类资产时减少后顾之忧。

一方面，在分母端，根据保险公司规模大小，给予差异化调节最低资本：其中，中型公司（指总资产在100亿元至2000亿元的财产险和再保险公司、500亿元至5000亿元的人身险公司）最低资本按照95%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小型公司（指总资产100亿元以下的财产险和再保险公司、总资产500亿元以下的人身险公司）最低资本按照90%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

给最低资本打折，即缩小分母端，有利于提升险企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据安华保险财务负责人、首席投资官张青松计算，该政策推出后，预计中小财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将提高13—18个百分点。

他指出，中小财险公司长期以来受资本的制约，偿付能力压力大，发展受到约束。此次新规对不同规模的财险公司进行差异化管理，将有力提升中小财险公司偿付能力，推动中小公司积极发展。

从人身险行业看，当前中型保险公司共33家，平均核心偿付能力约为116%；小型保险公司191家，平均核心偿付能力约为218%；偿付能力压力多集中在中型险企。根据天风证券的计算，前述优化方案将分别提升中、小险企偿付能力约5、1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分子端，《通知》将剩余期限10年期以上保单未来盈余计入核心资本的上限比例从35%提升至40%。这在鼓励保险公司发展长期保障型产品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保险公司实际资本，缓解其在偿付能力方面的压力。

据行业测算，提升保单未来盈余占比，主要利好保障及长期业务储备较为充足的龙头险企，如平安、太保、泰康、太平等，预计行业整体偿付能力充足率抬升幅度约在10%—20%。

另据东吴非银分析师葛玉翔测算，按照行业寿险2万亿元的净资产规模，将保单未来盈余上限提升5个百分点后，可释放实际资本约2564亿元；按照2023年一季度寿险公司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09.70%测算，对应考虑风险分散效应前动态释放最低资本约为2337亿元。

不过，前述计算方式仍基于较多模糊的假设。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偿二代"二期的松绑力度仍有上升空间，前述优化方案对于保险公司的影响远未形成根本性的改善，政策力度有待加大。

在不久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曾向业内征求"偿二代"二期规则的执行难点及对策建议；其核心内容便是希望监管部门能放宽对资本补充的丈量尺度，包括将保单未来盈余35%的上限提升至不少于50%。

一名精算人士向财新表示，目前很多公司尤其是大型险企采用的依然是过渡期政策，保单未来盈余计入核心资本的上限暂时处在45%—55%之间，比如前边提到的平安、太保、泰康和太平。虽然这类公司在政策影响下受到更多的利好，但至2025年过渡期结束后，这些险企仍需继续将这一数值下调至40%，补充资本的需求仍在。

促进险资入市

在缓解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下行压力的同时，《通知》还通过调低权益投资风险因子的方式，减少权益资产对最低资本的占用，释放险资权益投资空间，以进一步引导险资入市。这也是近期监管层鼓励包括险资在内的中长期资金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的"组合拳"之一。

具体来看，《通知》规定，对于保险公司投资沪深300指数成分股，风险因子从0.35下调为0.3；投资科创板上市普通股票，风险因子从0.45下调为0.4；投资REITs未穿透的风险因子从0.6调整为0.5。同时要求保险公司加强投资收益长期考核，在偿付能力季度报告摘要中公开披露近三年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和综合投资收益率。

非上市股权方面，《通知》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未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因子赋值为0.4；同时将保险公司经营的科技保险适用财产险风险因子计量最低资本，按照90%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主要是为引导保险公司支持科技创新。

葛玉翔表示，降低权益投资风险因子，有助于提升险资权益配置意愿。2023年7月末，险资投资股票和证券期末余额为3.55万亿元。据其测算，若保险公司释放最低资本全部增配沪深300股票，所对应的资金规模为1953亿元。

从目前来看，保险资金以安全、稳健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多元化配置为辅。2012年—2022年，险资投向股票和基金的占比基本维持在11%—13%，波动不大，但已成为A股市场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

多名保险资管人士指出，在利率中枢下行阶段，保险资金可通过适当增配权益类资产，增加高股息股票的分配以及长期股权投资的比例来提高收益率。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降低上市权益风险因子，在推动险资入市方面影响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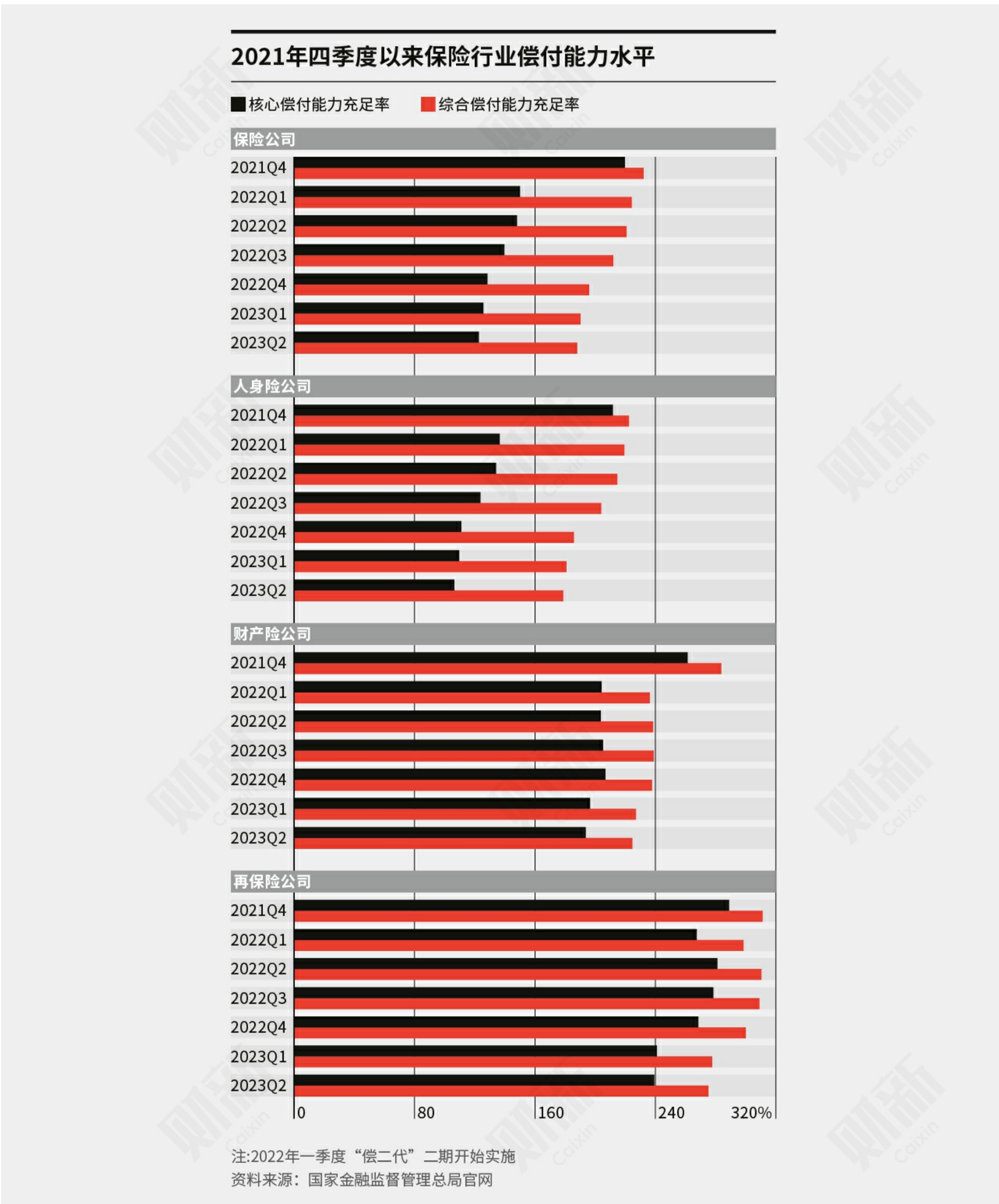
惠誉评级的报告预计，新规对保险公司信用状况产生的影响或为中性，受评保机构应不会大幅加码对新规所涉投资类别的投资。此外，惠誉采用专属模型评估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认为保险公司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潜在提升所带来的影响甚微。

惠誉评级亚太区保险机构评级高级董事王长泰向财新表示，在2023年上半年末，国内寿险和产险投向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大概在13.5%，但如果再加上长期股权投资以及非标类中的股权配置，这一比例应已超过23%，而海外保险公司的平均水平大概在12%—18%；这也意味着，在我国的保险资金运用中，高风险资产的占比并不算低。

前述惠誉报告也指出，许多寿险公司已持有较高的上市和未上市权益敞口，因此尽管风险资本计算调低，但是其投资此资产类别的增量资金或有限。另外，寿险公司还将重新评估其负债结构和期限，以确保潜在调仓匹配其风险偏好。

同时，非寿险公司因其业务固有的“短尾”特征，须抑制其持有的非流动性资产，以确保有充足的现金流可供赔付。而新规松绑的投资类别多属长期限投资。

财新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金监总局此前已同证监会等其他部委就如何促进险资入市提出建议，在优化险资权益投资会计处理方面有三条：一是保险资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超过2%、持有超过36个月可计入长期股权投资；二是保险资金持有ETF基金可计入OCI账户；三是保险资金由每年计提减值改为三年一次。



这三条建议均是通过变更会计准则从而起到平滑报表数据的作用。但前述建议能否获批，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参见本刊2023年第36期《A股艰难选择》）。

也有资管人士表示，欢迎险资入市，应正确看待财务性、友好性的举牌行为，同时支持合法合规的敌意收购，此前监管部门的表态，使得市场容易将举牌和"野蛮人"联系在一起；同时应明确会计政策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触发时间。

永续债落地

松绑"偿二代"二期规则，有助于释放保险公司的内生资本；而保险公司申请发行永续债终获放行，则打开了险企通过外源补充资本的渠道。

就在金监总局下发《通知》不久后，泰康人寿于9月13日获批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200亿元。这是在人民银行和原银保监会针对保险公司发行永续债"开闸"时隔一年后，首家获批的险企。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即永续债。在"偿二代"二期规则下，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的核心偿付能力普遍下降，补充资本的需求和迫切性随之增加。

2022年8月，人民银行和原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险企发行永续债由此"开闸"，为险企新增了一道重要的"补血"渠道。根据规定，保险公司可通过发行永续债补充核心二级资本，但永续债余额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30%。

前边提到的如泰康、平安、友邦等业务品质不错的保险公司，此前的保单未来盈余占比都很高，因此其偿付能力受到"偿二代"二期规则影响的程度会更大。

数据显示，泰康人寿2022年一季度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33.23%，比"偿二代"二期实施前下跌了124.74个百分点。截至2023年二季度，泰康人寿的核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03.29%、204.83%。这一数据虽然仍然高于监管要求的最低水平，但相较于"偿二代"二期规则实施前下降不少。

有市场人士向财新表示，在《通知》下发后，多家保险公司向人民银行递交了申请，但一直未获批复，据称原因之一系申请规模太大，合计达到了数千亿元。也有业内人士称是因为需要先考虑到金监总局对"偿二代"二期的松绑力度，尤其是对保单未来盈余占比上限的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开闸"永续债之前，已有大型保险公司在境外发行永续债。比如，中国太平在2023年3月发行了一笔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7.76亿元）的永续次级资本证券，票息率6.40%。

不过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在境外发行美元债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也有市场人士称，中国太平彼时在境外发行永续债，实因偿付能力压力太大急需补充资本。数据显示，中国太平在2022年末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已从2021年的194%大幅降至101%。

银保渠道降成本

在资本层面稍获喘息后，保险行业尤其是寿险公司在经营层面，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挑战之一，来自银行渠道的保险产品销售。

进入2023年下半年，各家寿险公司纷纷下架了预定利率3.5%的产品；在上半年保费规模已达预期的背景下，监管部门与寿险行业开始抓住目前的窗口期，计划继续通过降低银保渠道的手续费压低成本，应对投资端不断下滑的收益率。

多名业内人士向财新透露，监管部门于日前召集了约10家大型保险公司，就压降银保渠道手续费、严格落实"报行合一"进行窗口指导，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产品变更手续费后，应与银行按照重新报备的手续费签署合作协议。

据财新了解，目前各家公司在新的产品报备后，已陆续拿到监管回执；与此同时，已有多家寿险公司开始在银行渠道全面停售或是计划停售费率超标的产品，并准备上线符合新佣金费率的产品。

"新产品新协议，不满足就不做。之前保险公司在银行面前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定价权。现在为了压降手续费搞'报行合一'，也是为了向银行传递明确的信息，扭转银行的预期，共同降低银保业务成本，实现良性发展。"一名保险机构人士表示。

有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向财新指出，近几年来，保险公司在银保渠道的手续费佣金节节攀升。尤其是2023年年初以来，行业预计预定利率为 3.5%的产品即将下架，这一变化原本是为了推动保险公司降低在负债端的利差成本，

但个别银行反而认为在费差方面给予了空间。2023年上半年，部分银行的保险新单佣金手续费增长幅度甚至高达60%以上，部分保险公司与银行签订的佣金协议，也远远超过了其可以承受的范围，并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财新此前报道，监管部门早在2023年上半年就已关注到寿险业费用率过高的问题，并提出保险公司应当加强产品的费用管理，做到"报行合一"，如果发现费用假设与经营实际存在明显偏差的，将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上海、广东等地也相继发布了针对银保渠道手续费的行业自律公约，承诺不通过其他渠道及方式变相增加银保业务手续费、杜绝银保"小账"等（参见本刊2023年第22期《寿险业寻求降费压成本》）。

所谓"报行合一"，是指保险公司报给监管部门的费用率数据假设要和实际操作的数据保持一定的一致性。在实际操作中，寿险公司实际的销售费用通常远超费用率假设数据。

据财新了解，监管要求"报行合一"从8月31日开始执行，且大公司要带头执行；同时明确，产品附加费用的口径包含所有销售费用及固定费用分摊，将以滚动12个月的数据监测保险公司的实际执行情况；并鼓励各公司与银行进行手续费佣金支付方式的差异化，如手续费分期给予。

在新的佣金费率水平下，寿险行业在银保渠道的手续费佣金预计将呈现多大幅度的下调？

以2023年上半年银保渠道热销的五年期缴增额终身寿险产品为例，此前市场上大部分公司的总销售费用约为期缴首年保费的40%—60%，其中流向银行的渠道费用占首年保费的20%—40%，其余为保险公司的业务管理成本。假设首年保费为1万元，即4000—6000元的总销售费用中，2000—4000元流向银行。如国寿、平安等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在银保渠道的佣金费率则相对较低。

前述接近监管部门人士表示，基于新产品新费率的报备数据，若严格执行"报行合一"，大型保险公司因原本的基数较低，因此费用下降的幅度预计不超过10%；而对中小型保险公司来说，特别是一些在费用方面比较激进的机构，下降幅度预计会更大。"即便佣金下降后，相对于银行代卖理财、基金只能拿到千分之几的费用，保险公司支付的佣金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事实上，手续费佣金能否降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博弈。

近几年，代理人作为此前保险公司的优势渠道，业务规模下滑明显，各家公司更依赖于银邮渠道，而渠道的定价权则掌握在银行手上，保险公司处于弱势；与此同时，在银行息差收窄的大背景下，包括银保手续费在内的中间业务收入，成了很多银行的增收新动能，这也是手续费不断上涨的原因。

一个新鲜而典型的案例，是农银人寿在8月的银保新单规模变化。

财新获得的银保渠道业内交流数据显示，由于各保险公司在上半年下架了预定利率为3.5%的产品，今年7月的行业银保渠道保费规模就呈现较明显的下滑；进入8月后，银保保费更是暴跌，环比下降65%。但农银人寿逆势而上，在银保渠道实现了33.5亿元的新单保费，在当月排名行业第一，同比暴增951%。

有接近农银人寿的人士向财新表示，这33.5亿元的保费中，绝大多数是5年期的趸交产品，背后的原因是农银人寿的股东农业银行希望获得更多的手续费。

在"报行合一"、行业合力压降渠道费用的背景下，保险公司是否能够借此扳回一城，值得持续关注。

据业内人士透露，监管部门提出，寿险公司不分大小都应执行"报行合一"政策。尤其如国寿、平安等下辖银行的寿险公司，应率先执行政策；此外，监管部门还将在9月30日之后加大检查力度，抓早抓小抓典型，坚持机构和银行"双罚"，坚持罚底层、问责高管。

目前大家人寿（原安邦人寿）和瑞众人寿（原华夏人寿）两家特殊的问题公司，由于流动性问题，将按照"一司一策"的原则给予考虑，但同样要遵循行业降成本的共识。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瑞众人寿和大家人寿在银保渠道的累计保费规模分别为650亿元、626.8亿元，在行业排名第一、第二位。

不过，降费问题历来复杂。无论是行业自律还是监管窗口指导，对于费用问题通常治标不治本。从行业历史经验看，也不乏保险公司为争夺渠道而大打费率价格战、屡次突破自律机制的情况。

"寿险降费的本质是保险公司的治理问题。在商言商，如果险企明明知道每卖一张保单未来就要亏钱，肯定不会去疯狂销售；只有险企觉得当期规模与资金流动性的重要性大于持续经营压力，才可能出现这一系列问题。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才是解决整个保险行业各种问题的根本。"一位保险公司高管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原银监会在2010年11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一家银行网点只能代理三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

前述接近监管人士表示，这一规定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促进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深度合作，实现差异化经营和综合服务。但从目前的发展看，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大多浮于表面，仍旧仅看重手续费的高低而已；前述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保渠道手续费高企的现象。他同时透露，相关办法或将迎来修订，征求意见稿已经在路上。□

徐小庆：股债商的宏观背离能否持续？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当前A股和商品的背离不会持续，未来股票大概率以补涨的方式完成修复



浙江金华，股民在交易大厅内关注股市行情。股债的表现常领先商品，但不意味着股债对经济的判断一定比商品更准确。图：视觉中国

文丨徐小庆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宏观策略总监

2023年春节至今，10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最大下行幅度近40个基点（BP），直到8月下旬才开始调整；而股市在这段时期呈下跌趋势。股跌债涨的走势似乎显示市场对国内经济增长的预期依然向下。但让人困惑的是，商品走势与股债表现背离，6月以来南华工业品指数累计上涨近20%，创2022年7月以来新高。是股债对经济太悲观，还是商品对经济太乐观？

通常，股债易受预期影响，商品则反映现实。股债的表现常领先商品，但不意味着股债对经济的判断一定比商品更准确。按照基本面驱动的逻辑，债券与商品应呈反向变动，但两者在历史上也多次同步上涨。如果商品上涨主要是需求拉动，那么利率不上升将利于商品持续上涨，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经济见底回升初期，通常以利率跟随商品价格上行而终结，典型如2016年下半年债券与商品同步上涨。若商品上涨更多是因供给收缩带来的成本推升，那么利率不升反降或是市场预期终端需求无法承受上游成本的上涨，商品上涨也难以持续，最终以商品价格和利率的共同下行而终结。2007年至2008年就属于这种情形。

在2023年国内房地产新开工和施工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6月以来商品强势的驱动似乎更多来自供给收缩，但数据让人信服：前七个月，粗钢产量同比增速2.5%，较2022年全年-1.7%显著回升，也高于2016年经济复苏初期的0.6%。

笔者认为，商品上涨的驱动来自两方面。一是海外需求较国内需求的作用更大。比如与外需相关度高的原油涨幅达到27%，而与内需相关度高的螺纹钢涨幅不到10%。海外需求偏强，主要因为美国持续财政扩张导致经济韧性强于预期。此外，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需求，对商品定价的话语权有大幅提升。

二是人民币贬值带来的物流变化加速国内商品去库存。表面看，人民币贬值使得人民币定价的商品内盘表现强于美元定价的外盘表现，但即使剔除汇率因素后，国内商品也表现出很强的抗跌性。这是因为中美利差形成“倒挂”后，国内贸易商倾向于将商品存放至海外，通过收取美元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改变了过去国内利率高、库存累积在国内的局面。

既然商品上涨更多来自外需驱动和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去库存，那么近期债券调整是否被错杀了？还是2016年盛极而衰的翻版？2016年三年“债牛”的结束，发生在8月至9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开始“锁短放长”，重启14天、28天逆回购部分替代7天逆回购，变相提高回购利率水平。可以看出，当时央行货币政策有主动收紧的意图，其背景是经济已进入强复苏阶段，通胀压力开始显现。

对比当下，经济仍处于弱复苏阶段，在没有更多强复苏的信号前，货币市场利率难有趋势性回升。因此，债券

近期出现调整，与商品的背离开始收敛，符合基本面的驱动逻辑，但调整幅度难与2016年相比。笔者认为，8月下旬以来资金面的趋紧并非货币政策边际转向的结果，而是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对股票的风险偏好提升、债券基金和理财被集中赎回造成的。

若商品能保持强势，那么股票会补涨吗？商品持续上涨已带动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环比在8月转正，同比从7月开始回升。历史上，PPI同比由降转升，A股几乎没有下跌。若PPI同比升幅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A股会持续跟涨；若PPI同比升幅较小，A股以震荡为主。

笔者倾向于当前A股和商品的背离不会持续，未来股票大概率以补涨的方式完成修复，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23年四季度，主要来自地产销售回升带来的流动性改善。地产销售恢复能够有效带动货币流通的周转速度，缩小M1与M2增速之间的负向剪刀差，而后者又是A股是否有增量资金的重要观察指标。

第二阶段是2024年上半年，主要驱动在于地产新开工回升带来的盈利改善。如果每年住宅销售面积稳定在10亿至11亿平方米，那么新开工面积已连续两年大幅低于销售面积，开发商库存处于历史低位。一旦需求启动，房企有补库存的需要，2024年新开工大幅改善将成为企业盈利内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版面编辑：肖子何

显影｜野猪凶猛

撰稿｜财新周刊 康佳
摄影｜财新周刊 丁刚

猪害渐烈，在野猪被调出“三有”保护名录后，猎杀与保护之间的边界如何把握？

52岁的木工朱张勤看向停在院子角落的摩托车，它已经在那儿停了五年，蒙着塑料布，成了一个放杂物的架子。摩托车曾是朱张勤去县城干活的交通工具，由于一场变故，如今他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干些像做鸟笼这类的轻巧活计。

8月中旬的甘肃陇南，清晨已有一丝凉意。妻子去世多年，朱张勤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总会在工作台旁放一副护腰。出事也是在一个早晨，2018年5月，他在老屋门口修理一台切割机，正要把插头插入电源，突然被重重撞倒，他的门牙磕到了水泥台阶上，后背传来剧痛。回头一看，一只黑乎乎的野猪眼睛发红，獠牙伸出嘴外，背上的鬃毛直直竖着。朱张勤想拿旁边的铁锹自卫，但转眼野猪就跑出了院子。

朱张勤拄着铁锹，一点点向前边的新砖房挪去。十几步的距离，他感觉自己“走了有半个小时”。村里人用门板把他抬上车送到县城医院，检查发现他两节脊椎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朱张勤得知自己并非当天惟一一个受到野猪攻击的人，同村另外两人也被同一只野猪撞伤。



野猪的攻击导致朱张勤的两节脊椎粉碎性骨折，手术后留下长长的疤痕。这场变故让身为木工的他只能做一些轻巧的活。

据甘肃省陇南市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数据，近六年该市野猪致伤亡人数为22人。2016年至2020年五年间，该市共有12人因被野猪攻击而死亡。

野猪的适应能力极强，在中国境内广泛分布。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金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28个省份有野猪分布，其中26个省份857个县（市、区）存在野猪致害，且这一趋势日益严重。

野猪在感受到威胁时易发起攻击行为，因其体型庞大、力量极强，往往导致人畜伤亡。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恢复中心主任胡慧建认为，若不加以控制，“这样的情况还会加剧”。

今年6月，新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下称“三有”名录）新增了700多个物种，野猪则被逆流除名。这意味着开展野猪猎捕活动可以不再需要申请、核发狩猎证。之后多地跃跃欲试，想要控制野猪数量。

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野猪要怎么打？打了之后能不能吃？种群扩张冲在最前的野猪，能否为其他野生动物的管理提供镜鉴？在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青年研究员赵序茅看来，“调出‘三有’名录只是给这件事情画上了一个逗号，后边要做的还有很多”。顶级捕食者缺失带来的生态失衡，将是需要直面的更大挑战。

人员伤亡事件频发

朱张勤生活的谷峪村，地处气候温润的陇南礼县山区。一条南北向的公路沿着河沟将村子分为两半，东西两侧都是大山。山坡的低矮处被开垦，多是靠天吃饭的望天田，小麦收割后留下一片片空地，有长势好的玉米已经结出红穗。

如今老屋后墙坍圮、屋瓦散落，院子里杂草丛生。“出事以后我不愿意过来，心里毛毛的，总觉得背后有东西。”朱张勤说。

对谷峪村人来说，野猪并不算罕见——尤其在缺乏食物的冬季，它们往往成群结队出没，一头大猪带着最多十来只“猪娃子”在山间觅食，一听见动静会一溜烟跑远。但冲进村庄里撞人，还是多年来头一次。

根据几名被撞者的遭遇，村里人后来复盘出那头野猪的攻击路线。出事当天，它最先出现在村西头，撞倒了刚出门的李爱琴。李爱琴胆子小，回忆起来仍觉得很害怕，“知道有什么东西咬我，但太吓人了，我不敢睁眼睛”。



李爱琴的胳膊被野猪攻击后留下的疤痕，“知道有什么东西咬我，但太吓人了，我不敢睁眼睛”。

野猪咬住了她的肩膀，将她拖到了院门口。丈夫闻声出来，抄起门背后的一根棍子挥去，没能打中，但吓走了野猪。李爱琴衣服被撕破，胳膊鲜血直流。

野猪跑过河沟到了东边的半山腰，遇上了77岁的潘瓜得，他正赶着毛驴往田里驮粪。驴先看见野猪受了惊，潘瓜得正使劲拽缰绳，就被野猪撞翻了。野猪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继续往村子的方向跑去，遇到了朱张勤。



82岁的潘瓜得坐在院子里，五年前他的大腿被野猪咬伤。据他家人描述，被野猪攻击后，他的身体大不如前。

出事后，村里有流言说是几人抱走了“猪娃子”惹怒母猪才被野猪攻击。但几个当事人都否认了此说法，朱张勤说：“撞我们的是一头公猪。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抱走猪娃子，但我们几个都没有。”

从2017年至今，礼县共发生了5起野猪伤人事件，造成7人受伤。礼县自然资源局负责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魏亚军介绍，伤者均为农民，严重者丧失了劳动能力。陇南市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何小风解释，礼县人口数量大，农业人口占比大，加大了群众与野猪接触的几率，发生野猪危害的事件相对较多。实际上，近几年其他县区也常发生野猪伤人事件。

成县在礼县东南方，地处西秦岭余脉。崖背村位于成县的深山区，野猪经常晚上趁人不备进入农田偷食。2019年8月14日凌晨2点多，老人何海林背起背篓到玉米地，与一头正在偷食的野猪狭路相逢。隔壁的老人石俊林听到人声和撕咬声赶过去，挥起铁锹打在野猪身上，野猪没跑，反而调转头开始攻击他。

何海林因伤及动脉当日不治身亡，半年后石俊林去世。石俊林的女婿说，他内脏受伤，虽然在家人陪同下辗转多地就医，但终未见起色。

六年时间，野猪在陇南造成22人伤亡。目及全国，悲剧也在多地发生。2021年，四川理塘一名村支书在巡山途中受到野猪攻击后死亡；2018年，陕西紫阳县一名66岁的老人在自家门前遭到野猪袭击后不治身亡；2016年，四川宜宾一头野猪在几位村民的追捕下攻击了一名正在农田干活的农妇，致其死亡。

人猪冲突加剧

猪害不仅导致人员伤亡，还造成农作物损失。礼县的苹果是陇南的一张名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果农王冯华经营合作社种了635亩苹果。果树已进入盛果期，产量颇丰。8月中旬，漫山的苹果飘红，再过一个月就要收果了。山坡较高的一处，遍地都是野猪脚印，有的还新鲜湿润，旁边遗撒吃剩的残果。果树靠下部分果子稀疏，枝干有泥污和断枝。“它把腿架在树枝上偷吃苹果，把泥巴留在树上了。”王冯华说。

长势好的果树可以结果300斤，根据王冯华的经验，野猪最多能吃掉三分之一。“它们总浪费，许多果只啃一口就丢弃，果汁厂不收，只能烂掉。”为了防野猪，他放过炮仗，在树下放过猎套，也养了好几只凶猛的猎犬每天晚上巡逻。但山高沟深，种植面积也大，野猪很容易躲藏，这些方法都不顶事。秋天啃果，冬天山里缺食物，野猪会再次光顾苹果园，拱翻苹果树，吃它带甜味的根。

挨不住逐年增加的损失，王冯华通过村委会向镇里报告，希望能获得一定补偿。崖城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刘志鹏介绍，经过沟通和现场走访，野猪啃坏王冯华果园的果树有2600多株，连带果实损失达60万元左右。他们在5月底向县里上报了申请，但至8月中，还未收到回复和反馈。

除了王冯华这样损失严重的农业种植大户，野猪也影响着不少在山间求生的农户。成县陈院镇戚家沟村，几乎只能看得见老人和儿童。山上的农田坡度高，需要人工才能种植，又因野猪造访频繁，辛苦一年常常落得一场空，大量农田被撂荒。



礼县石桥镇，疑似被野猪啃食的玉米。据调查，陇南市受野猪危害颗粒无收的马铃薯、玉米、中药材等，占到总种植面积的三成以上。

赵有平家就撂荒了深山的10多亩农田。他今年64岁，不想给外出打工的儿子添负累，老两口趁还有力气，在家附近的山上、沟里种田。山上种的是不需要太多照料的油菜和中药材桔梗，村庄附近的沟里种了4亩左右的玉米和小麦。

“靠种庄稼没办法还饥荒（还债），只能种点自己吃。”陇南种植两年三熟，为了防止被野猪拱食，每年冬春油菜长嫩苗的时候，赵有平就要上山搭棚屋，晚上到田里守油菜，等到开春后菜苗的秆子变硬方可撤离。5月底左右，麦子开始灌浆，他又要在小麦地旁搭棚屋，一直守到小麦收割。之后玉米开始结穗，他又得在玉米田里搭起棚子，守到玉米完全收获。

棚屋通常用木桩、干草和塑料篷布搭成，十分简陋。不管是蚊蝇肆虐的夏季、露深霜重的秋天，还是气温常在零度徘徊的冬天，一年中的5个月里，赵有平的晚上都在这样的棚屋中度过。“去年我遇到点事，一个晚上没守，野猪就盘倒了半亩玉米。”

陈院镇书记张平良坦言，2018年前后，陈院镇接到群众关于野猪为害的反映越来越多，村民形容“到处都有”。全镇种植农作物的农田约2万亩，严重时撂荒地达到十分之一。有一个林缘地带的村庄，一次集结了二三十人到镇政府要求打野猪。“我们压力很大啊，但当时政策和法律就是那样规定的，野猪是保护动物，不能打，我们也没有办法。”他说。

为了减少损失，陈院镇政府曾倡导村民种植传统的潘林麦，它的麦芒更长更锋利，野猪不喜取食。但这一方法只在少量种植时有效，“玉米、土豆、小麦都有的时候，肯定是挑好吃的、它喜欢的先吃”，在食物没那么丰富的区域，这种麦子也不能幸免。

在作物成熟的季节，有人竖起围栏和稻草人，有人放喇叭、放炮仗驱赶，还有很多像赵有平一样搭了窝棚夜间守着。即便如此，乡村道路旁仍不乏只剩光杆的麦田。



礼县石桥镇（下同）村民为了防止野猪和其他野生动物入侵，在玉米地旁制作了稻草人。



村民在玉米地外围拉起铁丝网，牌子上标着“内设高压电网 请勿靠近”。



村民在靠近山边的土地围栏上绑上易拉罐，希望用噪声吓跑经过的野生动物。

尽管在农林部门的倡导下，成县绝大多数农民都购买了农业保险，但野猪致害并不在赔偿范围内。张平良介绍，陈院镇通过民政救济渠道，给予一些受到严重损害、条件非常困难的个别家庭补偿，绝大多数受灾的农户“确实只能抱怨”。

成县林草局副局长闫保林介绍，2022年全县由野猪致害导致的农林作物损失300余万元；而陇南市林草局数据显示，六年来野猪造成陇南市农林经济损失达3.9亿元。何小风分析近年来野猪侵害情况后发现，野猪活动范围由深山区向浅山区扩展，损害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逐年上升，“部分深山区林缘村村民已经丧失了种植农作物的信心”。

野猪致害导致农田弃耕，农作物种植区域萎缩，近村庄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和中药材受害面积增加。据何小风调查，陇南市受野猪危害颗粒无收的马铃薯、玉米、中药材等，占到总种植面积的三成以上。仅2020年，陇南全市估算经济损失近8000万元，对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8400元的陇南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陇南只是人猪冲突的样本之一。从全国来看，东至东北，西至西藏，野猪广泛分布在中国28个省份。四川、福建、江西等多个省份都面临和陇南类似的情况。2021年国家林草局表示，野猪已成为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

胡慧建认为，近年来野猪损害报告的频率越来越高，损失量越来越大，有从深山区向浅山区发展的趋势。金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四川省183个县中的103个县有野猪分布；广东省122个县中，野猪致害严重的有20个县；福建省85个行政县中，有35个县存在野猪致害问题。

受野猪影响最大的，或者说承担最严重代价的，多是居住在经济薄弱的偏远地区的那些弱势人群。如陇南，经济总量在甘肃14个地级市或自治州中排第10名（2022年）。国家林草局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专家组成员、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张明海认为，人猪冲突给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这一问题不容小觑，如不能恰当处理最终也会影响到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种群调控初探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14个省份开展野猪危害防控综合试点，指导地方成立117支狩猎队，开展种群调控。2023年6月30日，国家林草局更新的“三有”名录将野猪剔除，野猪的猎捕不再需要申请和审批。

陇南看到了风向的转变。8月13日太阳刚落，成县鸡峰镇赵山村附近，十多名猎捕队员带着十几条狗，有人负责观察，有人拿着长矛负责猎杀。几只土狗充当“侦察兵”，它们轻巧灵敏，一旦发现野猪踪迹就会狂吠，更凶猛的比特犬循声而去发动攻击。

这次猎捕地点选在两山中间。山间零星种植着一些玉米，猎捕队员严旭斌拾起其中被啃剩的半个玉米，用手一掐，玉米粒汁水溅了出来。他依此判断附近野猪出没的情况：若被啃食的边缘没有风干痕迹，说明野猪应是当日取食；但上边也没有野猪口水，那就说明取食已在两个小时以上。



成县鸡峰镇赵山村附近，黄昏时分气温回落有利于猎犬快速奔跑，十多名猎捕队员带着十几条狗，手持长矛和砍刀进山猎捕野猪。



苹果合作社地里的野猪脚印。秋天啃果，冬天山里缺食物，野猪会再次光顾苹果园，拱翻苹果树，吃它带甜味的根。

寻觅许久，林间突然传来阵阵犬吠，有野猪哼叫两声，下方树林间随即发出树枝咔嚓断裂的声音。几分钟之后，犬吠停止。人们上前发现领头的“侦察兵”白狗臀部受伤。严旭斌推测，8月山间林草密集影响到了狗的观测，野猪在慌不择路向下冲的时候，白狗未来得及躲避。

夜更深了。山间的猎捕无功而返，三辆车拉着十几个人和狗到了另一处开阔的农田。接近凌晨，有村民在玉米田旁点起火堆吓唬野猪。人们打着手电筒翻山越沟两个多小时，未发现野猪踪影。凌晨2点左右，猎捕队伍决定收工。这样的“坏运气”持续了四天，在四晚的猎捕中有狗受伤，但没能捕到一头野猪。



猎捕队员在追踪野猪。经过林草局审核成员名单，购买意外保险后，这支猎捕队自2022年4月开始猎捕工作。



一名猎捕队员听见声响，手拿石块准备对付随时可能窜出来的野猪。

有计划的猎捕是种群调控的常见手段，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均制定了猎捕指标以控制野猪数量。在德国，获得狩猎执照的猎人可以向政府申请或购买猎捕野猪的指标，之后就可以展开合法的狩猎活动。猎枪是其最主要的工具。

陇南县最初想到的也是持枪狩猎。2021年5月，陇南市成立野猪捕杀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市长张宏任组长。最初的实施方案中规定，在除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外的区域猎捕野猪，狩猎工具为枪支。

试点选在了农作物危害损失排全市第一的成县。根据2022年的摸底数据，整个陇南有野猪约4万头，其中成县野猪约1.5万头，依据国家林草局北方地区野猪种群1只/平方公里的控制标准，核定出成县需控制野猪200头，每头野猪奖补1000元。

但热热闹闹的启动仪式刚结束，工作就陷入停滞——卡在了枪上。闫保林回忆，各部门在成县召开协调会，希望能够用枪支猎捕野猪，“公安部门有现成的枪，最初想能不能让公安部门做这个工作，但他们提出只有在人身安全受到野猪威胁的时候，才有权使用枪支”。

于是考虑让退伍军人组建专业的猎捕队。林草局提出申请4支猎枪。省公安厅回复说，如要申请猎枪，需要建设专门的仓库，猎枪和子弹要分开存放，还需要有专人管理。闫保林说，其他问题也接踵而来，谁来监督枪支使用？打到人怎么办？打到其他的濒危物种了怎么办？



王冯华经营的苹果合作社长期遭到野猪侵害，于是他买来一副兽套对付野猪。

几个环节下来，闫保林决定换一条路。他们邀请乡镇上有经验的老猎人，讨论其他猎捕方法。电击、投毒、下套、陷阱，五花八门的建言被提出，但毒药、电击、猎套、兽夹都是《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的禁用工具。

他们在野猪出没频繁的区域试着挖了两个陷阱。“我们的山下边很多都是石头，挖起来费劲，成本也高。”十几天过去，陷阱空空如也；像诱捕老鼠一样的笼捕方式也行不通，成县多山，光是找一个又大又平坦的地方放置网笼都是难题。

严旭斌家里10来亩地的收成几乎年年因野猪而“打水漂”，想要“治一治它”，网上看到猎犬可以捕猎野猪，就购买了十几条猎犬，牵头成立了成县第一支猎捕队，承包了成县的猎捕任务。

经过林草局审核成员名单，购买意外保险后，猎捕队从2022年4月开始猎捕工作。他们根据从各个乡镇收集来的信息，确定操作区域，然后带狗猎捕。为了避免野猪肉流到市场上，在完成猎捕后，由兽医站对野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方可得到奖补。

但进山常常“十猎九空”。严旭斌回忆说，一次他们在马槽沟村猎捕，跟着野猪翻了五道山梁，带着长矛的队员体力不支掉队了，他没有武器，在路过一户村民家时借了一把斧头。待追上时，他看见一头约200斤的公野猪和6只狗在撕斗，因长时间追逐，狗已很疲惫。他挥起斧头朝野猪剁去，只剁到了猪皮。三斧头下去，野猪被激怒，一下甩开了几条狗，向严旭斌冲过去。

严旭斌边向后退边挥斧头，“退了有20多米，脚下一滑，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幸好狗赶上来把野猪拖住了”。回头一看，后边几步路就是个悬崖，“幸好滑倒了，不然我退着退着，可能就掉下去了”。



一名猎捕队员在检查猎狗的状态。这是一条快狗，它的体型有利于快速奔跑。



围猎后受伤的猎犬。据介绍，猎捕野猪就是靠狗，需要狗之间以及人与狗的配合。

从“生意”的角度来说，严旭斌认为，1000元一头的奖补标准过低，根本划不来。他原本做运输生意，去年把生意停了做猎捕，光是购买猎犬就花了7万元左右。“好的比特犬一只要五六千元，带上土狗，我这儿光被野猪咬死的就有27条。加上日常开支、车辆开销等，一年到头剩不下什么。”

今年成县有9个乡镇成立猎捕队，陈院镇已捕获了49头野猪。一位猎捕队员透露，其中一半是用兽套猎捕——目前兽套仍为禁用工具。对于如何避免其他野生动物受伤的疑问，该队员表示，兽套设备可与手机相连，在捕获猎物后能收到提醒。“我们去看，发现不是野猪的话就放了。”但这必然需要极强的自觉性。



猎捕队员展示捕获到的野猪的獠牙。

魏亚军坦言，礼县尚无专门资金做野猪的猎捕工作。提交到县政府的方案提出，给予村民每头野猪1500元的奖补后进行无害化处理，但礼县财政紧张，一直未获得反馈。

猎捕野猪难，猎捕后怎么处理也是难题。公益机构“让候鸟飞”下属的“反盗猎重案组”在8月发现，有人在社交网络晒出使用兽套猎捕、食用野猪肉的视频，他们向湖北宜昌当地执法部门举报后，对方得到的处罚是“批评教育”。

“反盗猎重案组”负责人表示，尽管管理部门一再强调野猪不能随便捕杀，但到底怎么捕、如何对猎捕进行监管，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回答。随着违法成本降低，定会有更多人参与到猎捕野猪中去。“如果老百姓都开始捕杀野猪，兽套、兽夹、电网这些工具都用上，其他野生动物也得跟着倒霉，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实际猎捕的规模和猎捕数量等也将失控。

一位不便具名的专家透露，在野猪调出“三有”名录之后，他接到全国多地的林业部门咨询，内容关于猎捕野猪的工具能否放开、野猪肉能否食用、野猪致害是否要赔偿等多个问题。“新政策之下，基层的林草部门同样迷茫。”

背后生态失衡

猪害如何发展到如今的地步？上世纪50年代起，对于野生动物的无差别猎杀使得野猪以及它的捕食者豺狼虎豹等数量锐减。根据1995年全国第一次野生动物资源专项调查结果，中小型和大型食肉动物的数量和分布区在全国非常堪忧，东部一些发达地区野猪的捕食者完全消失。

2000年，野猪被列入“三有”名录，受到保护。同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17个省启动。此后，野猪数量在多地开始上升。如黑龙江，2000年普查全省有野猪约3.6万只，至2007年野猪数量达到7万只，数量翻番。

这与该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极大关系。野猪不挑食，草根、坚果、昆虫、鸟蛋甚至腐肉都可以被它收入腹中，这让它具有超凡的适应能力。而这一长着獠牙的大型哺乳动物，却与蟑螂、鼠兔等一样采取机会主义策略，每胎可产7只左右，在温暖和食物资源更丰富的区域，一年就可繁殖两胎。

至2023年，全国天然林面积增加了3.23亿亩。赵序茅说，新增的林地中有大量生态价值弱、生物多样性差的经济林和速生林。因超强的“出厂设置”，野猪可以在这些相对贫瘠的林区安营扎寨。但它的捕食者往往适应能力更差，对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要求更高，难以在这些区域生存。



2017年12月，山西省永济市五老峰景区的密林中频繁出现野猪。彼时，野猪仍在“三有”名录，受到保护。

为何野猪捕食者的种群数量没有随着野猪一起恢复？张明海解释，除了野猪，豺狼虎豹这些顶层捕食者还需要其他多种中小型动物作为支撑，而这些位于食物链中下端的中小型动物的丰富程度取决于背后森林系统的健康程度。因此相比猎物，捕食者的恢复总有时间滞差，要慢上半拍。目前野猪的捕食者仍面临种群数量稀少、栖息地破碎化等多个瓶颈，恢复难度极高。

在野猪和捕食者的一张一弛之间，人猪矛盾愈演愈烈。但野猪数量增多仍有很重要的生态意义，在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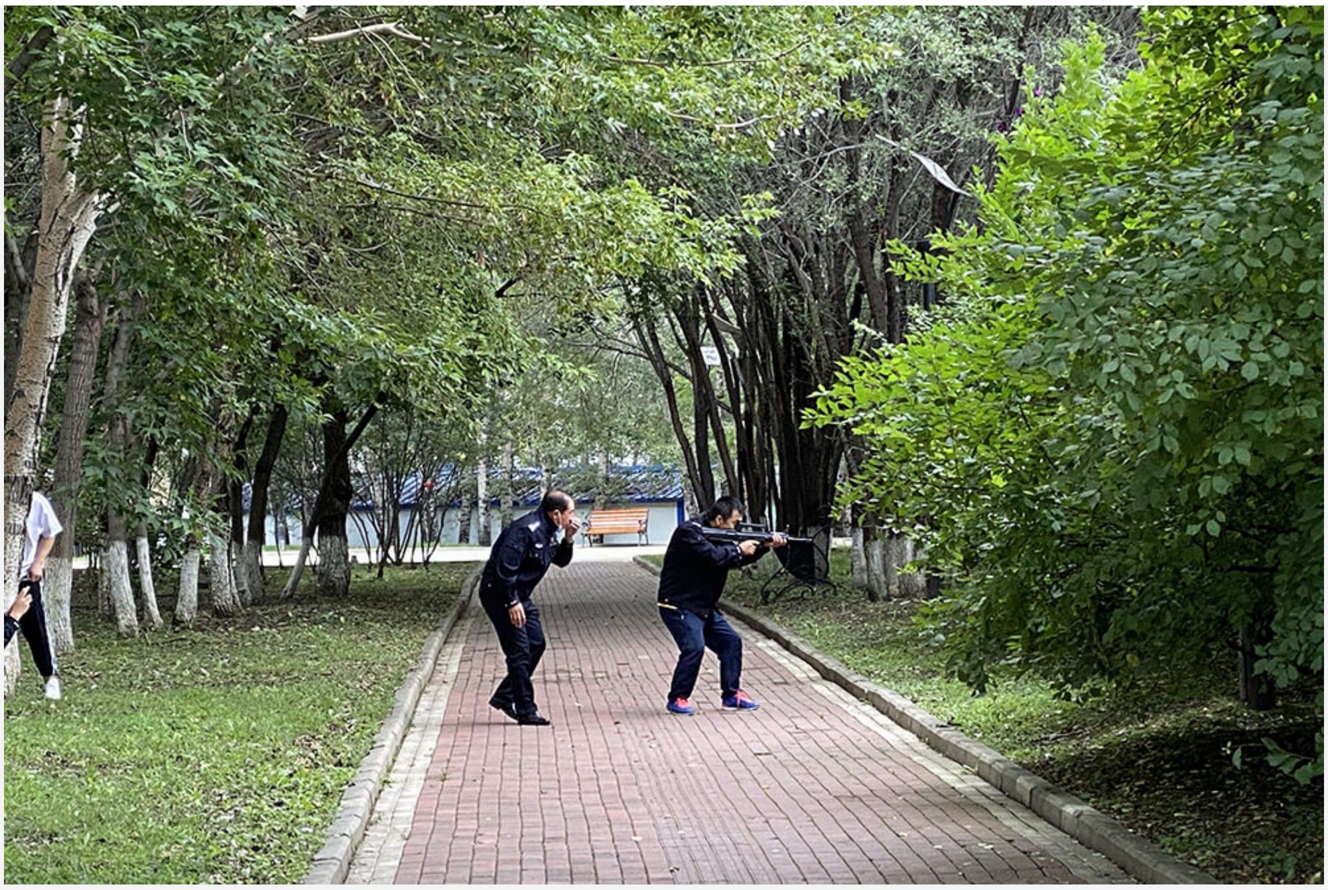
张明海表示，野猪种群的波动，必然会干扰到捕食者的生存和健康发展。捕食者的健康发展，则对野猪种群的扩张起到抑制作用，形成良性循环。他的研究发现，在东北虎豹的栖息地中，中国境内的野猪、马鹿、梅花鹿和狍子等密度远低于俄罗斯，猎物数量难以支撑东北虎定居，因此中国的定居虎数量少，迁移虎数量多。野猪增多显然对“大猫”的种群恢复是好消息。

除了作为顶级捕食者的食物，森林系统中，野猪还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态功能和地位。赵序茅介绍，尤其是在大雪封山之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跟在野猪的“屁股后”，野猪拱出的坑为其他小型野生动物和鸟类提供取食、栖息之地。此外野猪有利于森林里种子的传播。

保护与调控猎杀，这中间的边界如何把握？专注于中国野生猫科动物保护的公益组织猫盟CFCA创始人宋大昭对山西省的管理方式很认同：山西也在一些县区开展野猪种群调控试点，但华北豹栖息地晋中市和顺县并未开展捕杀工作，而是采取政府购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的方式，来弥补村民损失，增加村民对野猪的容忍度。

张明海说，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等猎捕活动“红灯区”之外，管理部门应对辖区内的野猪危害进行全面评估，掌握野猪种群数量、危害程度的情况，划分出“黄灯区”和“绿灯区”，依此来确定干预程度——红灯区100%禁止猎捕，绿灯区100%允许猎捕。

胡慧建认同这一观点：“只有进入农田范围的野猪才是我们要控制的，生活在森林里的野猪，我们没有必要去猎捕。”此外，他提出，野猪并非天天到农田采食，更多是在农作物成熟之际来为害，因此除了空间上的限制，也应在时间上对野猪的猎捕进行限制。农作物成熟时段应是控制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在时间空间上控制好，可大量减少野猪造成的损失”。



2021年8月，黑龙江省黑河市，市公安局爱辉分局民警将一头闯入闹市区的野猪击毙。



2021年11月，四川巴中市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工作人员将捕杀后的野猪做无害化处理。

肇事补偿难题

即使再怎么控制，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野生动物数量会增多，必然会影响到人类。宋大昭认为，尤其靠近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居民会受到更大影响，造成一定损失，“保护必然也有代价”。因此，通过补偿或保险等方式来弥补农民损失十分关键。

2012年，原成县林业局就野猪致害损失进行过专项调研，野猪当时属于“三有”名录保护动物，在补偿范围之内，因此希望向省级林业部门申请配套资金。闫保林说，但由于损失面积很大，“拿不出这么多钱，没办法给补偿”。

在成县，野猪导致的人身伤害最先开始走民政救济渠道进行救济。何海林去世后，当地民政部门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上了低保。礼县几起事故发生后，曾向省林草局申请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朱张勤等三人分别获得7000元至2.2万元不等的补偿。

礼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陈金驹介绍，近几年野猪导致该县7人遭到人身伤害，7人均得到了补偿，总金额近30万元。但对于农林经济作物损失，他也坦言并未进行过补偿。“我们有50多万人口，568个村，2000多个村小组，里边大多数都有野猪的问题。如果要把农田损失算进来，根本没有办法补偿。”



礼县，被野猪侵害的果树。对于农林经济作物损失，礼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陈金驹坦言并未进行过补偿。

许多村民在网上及市长信箱留言反映受到野猪侵害补偿难问题，这让管理部门备感压力。成县林草局根据统计上来的情况，去年向省林草局上报了约300万元的野猪损害损失，今年拿到92.7万元的补偿资金，目前这一笔钱尚未发放到受灾村民的手里。闫保林说：“这么多损失，我们这个钱要怎么分配？今年下发后，明年还能不能申请到这些钱？这都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我们还不敢往下发。”



成县一处撂荒、被野猪拱翻的土地。成县今年拿到92.7万元的补偿资金，当地林草局副局长闫保林表示：“这么多损失，我们这个钱要怎么分配？”

按照《甘肃省陆生野生保护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办法》,补偿经费由省财政负担50%，县市区财政负担50%。何小风介绍，近三年，陇南市争取省级落实补偿资金272.71万元，但部分县区因财政紧张，对落实县区财政补偿经费负担的50%有一些困难。

过去十多年，因人象冲突严重，云南探索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试点，由政府全额出资投保，在发生野生动物损害案件后补偿群众受到的人身和财产损失。魏亚军认为，如果“云南模式”能够在当地推广，将大大降低赔付难度，减少群众的抱怨和不满。

此外，多位受访者认为，在猎捕野猪成本较高、补偿难以落实的现在，监管之下对野猪及制品进行经营利用或许是一条出路。目前，野猪仍被禁止食用。据国家林草局《防控野猪危害工作要点》，依法经检疫合格后的猎获物可用作人工繁育种源、药用、皮革、动物饲料、保健食品等。因每头1000元的奖补难以覆盖猎捕成本，在陇南市的行动方案中，曾有过设想：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林草、市场监管等部门探索猎捕物可利用途径，“妥善解决猎捕物出路，弥补专项经费不足”。然而，当地并没有野猪制品相关的企业，实际处理过程中往往仍采取填埋处理。

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近年来，非洲猪瘟对中国生猪产业造成较大影响，2018年吉林曾发生野猪非洲猪瘟疫情。此外，野猪还可能携带结核、口蹄疫、甲型流感等多种疾病，若未经安全检疫，潜在威胁较大。张明海建议，针对野猪建立完善的检疫流程，开发野猪产品，放开野猪肉的食用。胡慧建也表示，在猎捕时空、猎捕数量均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可以增加检疫流程，放开野猪肉食用，“让大家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光明正大地吃野猪肉”。

但宋大昭有不一样的看法。新冠疫情暴发后，整个社会花费了高昂的成本才扭转了此前食用野味的陋习，一旦放开，这样的习俗很可能会回潮，殃及其他野生动物。“反盗猎重案组”的负责人更担心，无论猎捕数量，还是食用过程，落到执法力量非常薄弱的基层林草部门，所谓的“监管”极易落于纸面。

胡慧建认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顶层捕食者缺位，未来因种群数量增加而退出“三有”名录甚至对人类社会产生危害的野生动物只会越来越多。事实上近年来，在广东，蟒蛇偷食鸡鸭、猪羊幼崽的事情频频发生；在贵州、四川一些区域，猴子骚扰、袭击人变得频繁；在上海，貉在多个小区内定居，造成人员受伤。如何精细管理野生动物，将是一项需要长期面对的难题。



成县，一支猎捕队伍发现桔梗地里有一群野猪，朝着该方向放出猎犬，不过这一次扑了个空。多位受访者认为，猎捕野猪成本较高，奖补往往难以覆盖猎捕成本。

图片编辑 | 董德

开篇图说：2023年8月17日，甘肃省陇南市成县鸡峰镇赵山村附近，十几名护农猎捕队成员带着12只猎犬搜捕野猪。他们得到线索，前一晚附近这片玉米地曾出现一大一小两只野猪，顺着野猪留下的粪便和脚印，他

们准备展开猎捕行动。

最新财新周刊｜治理地面沉降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人们对待慢性病的科学态度是“早发现，早治疗”，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应对地面沉降



2023年6月7日，工作人员在天津碧桂园凤锦庭院小区测量地面沉降程度。沉降发生后，有高层住宅底部开裂明显，低层别墅则直接墙体开裂。图：牛牧江曲

文丨财新周刊 徐路易

2023年5月31日傍晚时分，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东路部分路面隆起开裂，邻近社区碧桂园凤锦庭院也出现局部草坪路面开裂，地下停车场墙体裂痕、渗水，楼梯明显沉降等现象。6月1日凌晨，近3000名住户被陆续疏散至附近酒店。近三个月后，津南区政府发布了一份《津南区八里台镇局部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安置方案》，其中透露，此次事件为八里台东路东侧地热勘探井作业过程中，突遇构造破碎带和地下空洞发生的局部突发性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远在6000公里外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印尼政府法律与人权部官员胡塔加隆近日接到了自己将于第三批离开雅加达的消息。雅加达位于爪哇岛上，根据美国宇航局数据，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土地沉降等，雅加达40%的地区已位于海平面以下。印尼于2019年宣布将迁都至加里曼丹岛上的东加里曼丹省。随着新首都的建设成型，约20万国家公务员将迁往1000公里外的新首都。

无论是抽取地热资源过程中突然的局部地面塌陷，还是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造成的整体地面沉降，都在告诉人们，危机可能是双重的：海平面会上升，地面也会下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面沉降倡议工作组多名研究人员于2021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显示，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出现过地质灾害性质的地面沉降，到2040年，全球近19%的人口极有可能面临地面沉降带来的风险。

对承载大量人口的沿海城市而言，比海平面上升更紧迫的问题是，地面沉降和海平面上升叠加形成的“相对海平面上升”。“地面沉降和海平面上升同时在发生，这会使得海水倒灌的情况范围更大、程度更严重。”荷兰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三角洲研究院沉降组组长吉勒斯?埃尔肯斯表示，“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雅加达、胡志明市、曼谷以及许多沿海城市的居住区都将沉到海平面之下。”

不过，比起海平面上升，减缓甚至逆转地面沉降要容易得多，一些相对简单的政策和工具就足以有效解决问题，比如能迅速确定沉降区域的卫星和雷达技术，以及持续的地下水开采管理。

地表陷落

荷兰是最早发现地面沉降现象的国家之一。荷兰大部分地区位于海平面以下，由于地理条件特殊，过去几个世纪一直面临着洪水威胁。为了对抗洪水，荷兰人采取了大规模的土地排水和垦荒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观察到系统性的土地逐渐下沉现象，以及这种沉降对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产生的巨大影响。

埃尔肯斯长期从事三角洲、河流系统发展、泥炭分类和沉降方面的研究。20年前，他曾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从事地质与地貌学研究，包括阿姆斯特丹在内的荷兰许多地区，土壤主要由含水量较高的泥炭构成，土壤中的水被排干或引入排水系统后，泥炭就会逐渐压缩和氧化，导致地面下沉。近几年来，夏季炎热干旱，导致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土壤的孔隙坍塌，使得土壤体积减小，加速了沉降发生。根据荷兰环境评估机构的数据，到2050年，地面下沉或将给荷兰造成220亿欧元的损失。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门多塔市西南处的圣华金河谷夏季炎热干旱，冬季潮湿多雨。在那里矗立着一根电线杆，电线杆底部有一块“1977”的牌子，离地9米处挂着另一块“1925”的牌子。也就是说，9米，是圣华金河谷从1925年到1977年间地面沉降的高度。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结果显示，圣华金河谷的沉降主要原因是过量抽取地下水，造成未固结的含水层系统压实。一名土木工程师向财新解释，未固结含水层系统压实也是大部分地面沉降的主因。土壤在含水量较高的情况下，外部的压力会逐渐排出土壤中的水分和空气等，组成土壤的固体颗粒会排列得更紧密。水的存在还会使土壤颗粒更容易移动和重新排列，最终土壤的体积减小、密度增加，形成固结的土体。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还强调，过度抽取未固结含水层系统中的水，导致了圣华金河谷地面的永久性沉降，并与多起局部地面塌陷事件直接相关，而且这种变化基本是不可恢复的，含水层系统的总储水能力也会下降。

中国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和天津就发现了地面沉降的现象；30年代则在北京也出现地面沉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教授级高工李文鹏向财新介绍，2019年中国地面年沉降量大于50毫米的沉降严重区面积约为1.14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汾渭盆地和淮北平原。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秦四清解释道，造成地面沉降的原因有很多种，自然原因包括板块构造运动和区域性海平面上升，人为原因包括地热开采、石油等地下化石能源开采、工程沉降以及地下水开采。这其中，工程沉降和地下水开采是直接导致区域地面沉降问题的普遍原因，而其他四种原因引起的沉降量较小也比较缓慢。由于构造活动等天然原因造成的区域沉降量一般不会超过总沉降量的5%。

城市结构也一定程度上为地面沉降带来压力。2023年5月下旬发表在期刊《地球未来》的一项研究显示，利用卫星成像、数学假设和数据建模发现，美国纽约市内密集而沉重的建筑群也会对地面下沉产生影响。计算选取的100多万栋建筑（囊括所有摩天大楼）总共对地面产生了7.62亿吨的向下压力。在土壤结构含黏土量较高的地区，建筑物对沉降的影响更大。不过，该研究第一作者、美国地质调查局科学家汤姆?帕森斯（Tom Parsons）认为，摩天大楼的数量并非重要因素，纽约和美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地表下沉主要是因为地质构造。

多名国内外专家向财新表示，城市结构对沉降的影响相关定量研究较少，它可能是一些人口密集的沿海城市下沉的原因之一，但非主因。“一般来说，人口增长和发展可能会增加对地下水使用的需求，并导致更快的沉降。”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环境学院地球科学系博士郑文静表示。

地球上的水在大气、地表和地下之间循环，地下水是地球水循环的重要部分。地下水的循环速度相对较慢，主要储存在土壤和岩石的孔隙中，通过渗漏等方式参与调节地表水流量，比如在降雨较少或干旱条件下，地下水可以作为一种延迟效应，提供连续的水源补充缺乏降水的地表水体。

前述土木工程师介绍，超量开采地下水就是抽取的水量超过了地下水补给速度，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就破坏了原本地下水供需的动态平衡，土壤中的水分减少，由此土壤中的饱和层会逐渐变窄，非饱和的干燥层扩大，从而导致土壤中的水分分布不均，土壤就会压缩或变形。这种土壤的压缩变形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存在实质影响，因为每个区域的地质结构和岩石性质都不是平均分配的，存在差异就会存在沉降的不均匀。“通常区域沉降会呈现碗状，地面沉降的中心就是凹陷的区域，周围是相对稳定的区域。”

2003年11月，国务院公布《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其中地面沉降被归为“缓变性地质灾害”。在这种地质现象中，地下松散岩层会发生固结压缩，导致一定区域的地面高程降低。其反应迟缓、进展缓慢，沉降速率以毫米为单位计算，不易被人察觉，但其形成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防治难度大，恢复困难。根据中国气象局网公布的信息，从1959年到1998年，天津沉降中心的累计沉降量最大为3.916米。

认识土地“慢性病”

沉降是土地的慢性病。许多慢性疾病在早期没有典型症状，只有当疾病进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被察觉，人们对待慢性病的科学态度是“早发现，早治疗”，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应对地面沉降。

财新查到的原上海地质处资料显示，上海连续开采地下水的历史从1910年起，彼时年采量仅在25万—35万吨。不过，1922年前后上海港务管理局就注意到，吴淞江验潮站的潮位逐年上升，但同期近海潮位并无持续上升的情况。经过1947年和1951年两次与青浦佘山的水准基点连测后，才发现并非潮位上涨，而是验潮站的水准点大幅度下沉，导致对潮位的读数变大。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评估，1974年至2014年，中国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元，上海直接经济损失为145亿元，间接经济损失为2754亿元；华北平原地面沉降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达404.42亿元，间接经济损失2923.8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间接损失在总损失中所占的份额较大，意味着地面沉降后期带来的灾害会广泛造成各个方面的影响。

综合各专家分析，地面沉降可能带来的直接损失包括导致建筑物地基下沉、房屋出现裂缝、地下管道破损、井管抬升以及加剧洪涝和风暴潮等灾害；间接经济损失则包括影响居民的生活和区域土地利用计划、增加道路修复成本、破坏当地生态系统等。

损失出现后，人们才开始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地面沉降。卫星遥感和雷达技术为监测地面沉降提供了重要工具。2000年前后，雷达干涉测量（InSAR）技术经过欧洲众多科研团队的研究与发展，具备了从事地表形变调查与监测的基本条件。2015年欧洲航天局（ESA）发射的哨兵1号卫星载有C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可以提供连续的图像，使得InSAR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监测变得更加可行和实时。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葛大庆表示，InSAR技术的核心正是测量缓慢的地表形变，近10年来InSAR成为地面沉降领域研究最普遍使用的技术，而哨兵1号数据的开放，也让更多科研工作者可以使用和练习数据处理方法。

多个研究团队向财新介绍，其通常的步骤是，获得卫星或地面SAR系统提供的数据后，对数据进行相位解缠、滤波、去除不相关信号等干涉处理，比较两个或多个不同时间的SAR图像；再计算相位差异，生成地面位移图，图片就会显示地面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形情况，从而可以确定地面沉降的情况，包括确定沉降的空间分布、速率和时间演化等。

郑文静小组于2022年12月在期刊《自然-可持续发展》上发文，利用InSAR绘制了48座沿海城市2014年至2020年的地面沉降图，发现这些城市同时面临着地面沉降和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48座城市主要集中在亚洲沿海地带，研究小组发现其下沉速度的中位数为每年16.2毫米，其中一些城市的地面沉降速度达到每年43毫米。而目前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为每年3.7毫米。

郑文静告诉财新，地面沉降在沿海城市中很常见，通过高分辨率地图可以识别出具体的下沉区域。有趣的是，从卫星数据看，中国南京、美国华盛顿等城市的土地平均呈现出上升而不是下沉趋势。2013年，南京市出台《地下水资源保护管理办法》，禁止在城市、集镇等建筑物密集区直接取用地下水用于节能建筑的地源热泵系统，防止地面沉降。她表示，卫星数据的结果不意味着整个城市正在抬升，因为城市中仍会有部分区域在下沉。

InSAR技术虽然具有高精度和广覆盖性，但也受到一些限制，如大气干扰、地表覆盖、雷达几何和角度解析度等。葛大庆表示，对于地表形变背后的隐患以及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预测，仅使用InSAR技术还不够。他所在中心承担了"全国地面沉降遥感地质调查与监测"项目，其成果显示，完整的地面沉降立体监测网络布网将结合陆空数据，包括水准地面沉降监测、地下水位观测井、GPS地面沉降监测、地面沉降监测站以及InSAR地面沉降监测。

以简驭繁

治疗慢性病需要定期体检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土地沉降的治理。多名专家学者建议，治理地面沉降的主要手段包括长期监测、做好工程前的勘测和防治计划、控制地下水开采，有条件可以采取超量回灌地下水以恢复土壤弹性。

李文鹏总结道，一般地区的地面沉降主要是因为抽取了深层承压水，控制开采和回灌后，沉降基本都会得到有效控制。像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仍然会有沉降，是因为沿海地区的浅层土层形成时间较晚，尚未完成压实固结的过程。在建大楼或修地铁的过程中，浅层建设必须对土地进行排水，而如果工程的排水方案不当，就会引起周围地面的沉降。前述土木工程师告诉财新，在道路、铁路和机场的基础施工中，对未固结的含水层进行合适的压实力和控制土壤水分，还可以增加地基的承载力和稳定性。

在南京，长江沿岸、秦淮河沿岸、滁河沿岸等区域被归为特殊类土防治区，其地形平坦，软土分布广泛且在浅层分布，《南京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7—2025年）》中特别强调了"工程建设中，若工程措施不当，易引发地面沉降地质灾害"。规划要求在相关区域进行工程建设时，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进行详细勘察设计，查明软土的分布特点，有关部门对评估、勘察、设计、施工单位资质和工作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和监督。

对于可能由工程造成地面沉降的情况，事前谨慎勘察把关远远优于事后弥补。由人为原因造成的地面沉降损失情况在全球并不少见，但鲜有让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美国一名熟悉地产纠纷的律师告诉财新，上世纪90年代加州曾发生一起因沉降引发的法律纠纷，事关洛杉矶一处市府资助类联排别墅（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类似），约700多户居民入住后不久发现房屋的紧急逃生门无法关上、地面开裂，建筑物外立面严重脱落等情况。此后，专家认定房屋之下的土壤没有压实，本应被清除的黏土层吸收了过多的水，导致房屋沉降不均匀。这起纠纷前后一共耗时六年，仅仲裁听证就花了三年时间，最终没有能够评估出事件责任方。提起诉讼的770位居民获得了总计约6250万美元的赔偿金，其中市政府只赔偿了约300万美元，剩余部分则由25家保险公司赔付。赔偿金一半用于房屋修复，扣除法律费用后，提起诉讼的每名房主仅获得约2万美元赔偿。

浅层土层带来的地面沉降问题需要靠一个个具体的工程项目来进行有效防治，深层含水层变化引发的地面沉降则需要区域的全盘规划。在管控地下水方面，联合国人居署将上海和东京视为地面沉降治理的成功案例。上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实行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制度，并设立了地下水资源管理机构。1996年开始上海又实行超额回灌地下水，也就是每年回灌地下水的量超过开采量，并且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地下水管理政策和措施，比如《深井管理办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法》等。21世纪初，上海又实施更为严格的地下水开采控制政策，包括进一步压缩地下水开采总量等。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上海市全市开采地下水105万立方米，实际回灌量约1810万立方米，年均地面沉降量从10.22毫米降至5毫米。

日本自1970年以后，通过实施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用水法以及实施《东京都公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限制地下水开采，并采取回灌措施，将河水、雨水和经过三级处理的废水注入含水层。此外，政府还通过购买矿业权限来控制天然气开采。这些措施使得地面沉降速率逐渐减缓。

不过，多名专家表示，回灌在现实中面临的困难是，很多地区抽取深层地下水本就是因为用水短缺，难以拥有更多的水资源进行回灌；而如果采用雨水回灌，则必须保证回灌的水不能低于当前地下水质量，雨水的收集和处理也面临工程量和成本问题。

地面沉降背后的长期难题是水资源的分配不均。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仅有全国20%的水资源，但需要供给50%的人口和65%的耕地。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大部分地区依赖地下水资源进行开采。以华北平原为例，每年地下水开采量达206亿立方米。“完全禁止地下水开采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是可行的。”李文鹏告诉财新，重要措施是积极发展调水工程，例如引滦入津、南水北调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水地区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起到控制地面沉降的作用。尤其是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华北平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得以缓解。

“十二五”期间，原国土资源部部署了全国范围内地面沉降持续调查监测与防治。到2019年，全国地面沉降情况总体呈现微量沉降和微量回弹并行，但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浅层软土、沿海地区回填及工程性地面沉降仍有发生，今后仍需进一步防治。郑文静表示，近年来可用于研究的高分辨率地面沉降数据不断增加，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更明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资源分配，以规避风险较高的地区。

“从长远看，提高公众的节约用水意识对保持用水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和减轻水资源压力非常重要。”多名专家向财新表示，地面沉降的本质其实还是一个社会生态问题，可以被科学认识并解决，至少“比解决海平面上升容易多了”。

牛牧江曲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肖子何

最新特别报道｜绿电提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减碳从政治传递到企业，从国内传递到国际，供应链共舞，何谓真正的绿色价值？

文｜财新周刊 范若虹 赵煊 覃敏 刘沛林

美国当地时间9月12日，苹果公司CEO库克在iPhone 15等新品发布会上大谈"碳中和"，强调将履行2030年所有产品碳中和的承诺，而此次新款苹果手表是首个完成这一目标的产品。通过在材料、清洁电力和低碳物流等方面的努力，苹果手表减除了生产过程78%的碳足迹，并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抵消了余下的碳排放。

"使用清洁能源（又称绿电），已成苹果公司供应商认证的重要指标，通过了认证，才有机会参加项目竞标，这是入场券。"中国一家苹果公司供应链（"果链"）企业高管告诉财新。"果链"供应商已处于"不绿电、就出局"的境地，使用绿电不是成本问题，而是订单和生存问题。

苹果公司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8家中国制造商承诺到2030年底前全部使用绿电生产苹果公司产品；而在2021年和2022年，作出承诺的供应商分别为32家和55家。

作为品牌商，苹果公司的碳足迹主要来自供应商，尤以用电为重，比如电力排放在苹果手表的碳足迹中占四分之三以上。减碳首先要从清洁电力的变革开始。

以"果链"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及供应链，外贸出口等外向型企业，背负更多社会责任的央国企，运营高耗能数据中心的互联网公司等，越来越多企业以用能成本攀升为代价，成为绿电需求者。

中国绿证推出六年有余，绿电交易试点已启动两年，但2023年绿电的火热程度远超市场预期，交易量迅速攀升。截至8月25日，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成交绿电478.6亿度（千瓦时），较去年全年增长215%；成交绿证341.5万张，折合电量34.15亿度，较去年全年增长136%——提前完成了年度绿电300亿度、绿证300万张的目标任务。南方电网域内上半年达成的绿电交易也有56.7亿度，同比增长120%。

绿电领域的关键进展来自政策端。8月3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1044号文），将以往绿证核发范围由陆上风电、集中式光伏项目，拓展至可再生能源发电各领域，包括分布式光伏、海上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实现绿证核发全覆盖。

绿证，即绿色电力证书，是绿色电力的"身份证"，由国家能源局核发，1个绿证单位对应1000度可再生能源电量。绿电上网消纳后，即可获得相应的绿证。1044号文破除了绿电供给侧的政策障碍，意味着绿证的市场供应量将被全面释放。

事实上，绿电政策正在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全面进入市场铺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早期依赖政府补贴，带有补贴的风、光项目拥有优先发电权，不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2020年以来，新能源补贴逐步退坡，新建项目进入不含补贴的平价时代。充满间歇性的风、光发电与传统煤电相比，在供给安全性、稳定性甚至上网综合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竞争优势，但若赋予它们绿电属性、绿证身份以及绿色环境价值，无疑为清洁能源打开了可持续、市场化发展的巨大空间。

全球控排减排趋同、趋严，也给中国带来了必须跟进的责任与压力。自10月1日起，中国出口企业就需应对欧盟"碳关税"的数据申报要求，而生产过程中使用绿电，可有效降低出口产品潜在的碳关税负担。业界早已预期，包含碳成本、碳中和等因素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将成为企业除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外的第四张财务报表。

欧盟"碳关税"，即"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10月1日起开启相关行业或进口产品碳排放信息的申报程序。CBAM虽在国际社会存在贸易壁垒、重复征税等诸多争议，但欧盟坚定的碳中和路线，无论过渡期的"碳信披"还是三年后落地"碳关税"，都给全球企业带来了清晰的方向与警示。

到2025年底，CBAM过渡期结束后，中国相关企业若无法提供欧盟认可的碳减排数据（绿电指标或绿证），则可能需要按照欧盟的碳价来补缴相应的碳排放指标，即缴纳碳关税。钢铁和铝出口企业首当其冲，在欧盟"碳关税"覆盖的国家中，这两大行业产品最大来源国均为中国。

财新数据专题《央企、"果链"都发力 绿电应用提速带来什么机会？》，结合本篇深度报道和新能源行业的全面数据与资讯，数据通Pro会员专享。

"果链"必须绿

苹果公司于2015年启动了供应商清洁能源项目，2020年宣称公司自身运营已实现碳中和，计划到2030年供应链

及全产品生命周期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须从原材料、生产制造、运输、零售、回收等全流程管控碳排放。

苹果公司的最大供应商富士康率先响应，承诺到2018年建成400兆瓦太阳能项目；2016年，玻璃面板供应商蓝思科技（300433.SZ）也承诺到2018年苹果公司产品全部使用清洁能源。这些承诺都按时兑现了。此后，立讯精密（002475.SZ）、闻泰科技（600745.SH）、欣旺达（300207.SZ）、京东方（000725.SZ）等中国"果链"公司纷纷跟进。

"庞大的'果链'是一个共生体系。"标普中国电力与可再生能源研究分析总监彭澄瑶对财新指出，苹果与供应链企业是深度绑定和高度黏性关系，及早让供应商循序渐进地提高绿电比例、消化新增成本、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二者双赢路径。

努力多年，苹果公司大部分供应商已"转绿"。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苹果公司全球250多个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这些供应商占苹果直接生产成本的85%以上；供应商承诺的清洁能源电力规模总计超过0.2亿千瓦，其中近三分之二已经投入使用。

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高级分析师Ivan lam亦对财新称，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供应商可在2030年达成全绿色供应。而且中国企业爱研究政策，中国高层明确承诺了"双碳"路线图，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先进高端制造行业，必然承担绿色能源转型先行者的角色。

"绿化"的推力不仅仅来自苹果公司。"越来越多客户也对我们提出了绿电要求。"电池供应商欣旺达对财新称，不管是基于客户、社会责任以及自身运营需求，使用绿电已是企业重要的战略手段，即便成本增加也会坚定执行。欣旺达透露，2022年公司绿电占比8.24%，主要来自光伏；预计2029年绿电占比将增至50%左右。

立讯精密的ESG负责人则向财新介绍，立讯精密在2019年前后开始使用绿电，2022年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超过20%，计划2023年、2024年、2025年分别达到30%、40%、50%；目前绿电消费方式包括绿电交易直购、购买绿证和与第三方合作自建屋顶光伏三种模式。"尽管分布式屋顶光伏的可控性高，对企业来说是最佳选择，但公司庞大的用电需求仍需通过直购绿电、绿证等方式补充。"

另一家"果链"公司闻泰科技亦以采购绿电为主。闻泰科技介绍称，2022年整个集团清洁电力占25%；2023年预计提高至40%；未来3年计划提升到60%以上。在闻泰科技相关人士看来，自建光伏项目成本高、投资回收期长，更倾向合建模式。闻泰科技浙江嘉兴工厂即采用合建模式，由光伏厂家负责投资，在嘉兴园区屋顶、空地等地加装设备，负责运营维护，投资方通过电费收入获得收益。



每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前夕，苹果直营店的标识都会换上"绿叶"。苹果公司于2015年启动了供应商清洁能源项目，2020年宣称自身公司运营已实现碳中和，并计划到2030年实现供应链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碳中和。

"果链"之外，大量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在大力推进绿电应用。

9月7日，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称"国电投"）签署了一份为期25年的购电协议。从2025年起，国电投将每年为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供应10亿度可再生能源电力，主要为海上风电与太阳能等绿色电力。湛江一体化基地项目总投资额达100亿欧元，为巴斯夫独资投建，计划到2025年实现100%绿电。

在2021年9月中国绿电交易试点启动之际，巴斯夫就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绿电采购方，其在上海的3个生产基

地完成了中国首次跨省份绿电交易，采购量达到其所需电力的三成。2022年，巴斯夫大中华区绿电采购量总计3.3亿千瓦时；2023年采购规模继续扩大，其中国区13个基地均参与绿电交易，其中7个基地与电力供应商签订了100%绿电供应合同。这家高排放公司承担着巨大的能源转型压力，其德国总部承诺的减碳目标是：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在2018年基础上下降25%，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相较欧洲，巴斯夫在中国的绿电可获得性上挑战更大。”巴斯夫有关人士对财新指出，目前中国市场的绿电持续稳定供应能力不足，“例如，江浙沪地区是巴斯夫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但这些地区电力资源禀赋弱，非常依赖跨省份交易，但又受制于送出省份的意愿及跨省份输配通道容量有限”。

因此，在参与绿电交易之外，巴斯夫更青睐直接投建新能源项目，今年7月宣布与中国风电企业明阳智能共同投资运营一座500兆瓦海上风电场，预计于2025年投入运营，所生产绿电全部供应湛江一体化项目。

“巴斯夫优先通过绿电交易合同、自建或参股可再生能源项目，获取有价格竞争力的绿电。”上述巴斯夫人士称，绿证在该公司的绿电消费中优先级靠后，只作为一项临时措施考虑。“绿证需求的激发，还在于消费激励政策的完善，比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是否进一步下放到用户主体，绿证消费认证体系构建进展，以及绿证与碳市场的衔接进度等。”他说。

多名业内人士对财新分析称，类似巴斯夫、苹果公司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往往以最严格的标准采购绿电，在绿电的额外性（支持新增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立）、可溯源性、就近性等条件上要求较高。“不仅要买绿电，它们还在乎买什么样的绿电，在哪买绿电，是不是最纯正的绿电？”彭澄瑶说。

但与耗电量大、用能集中的制造业企业不同，同样设定了碳中和目标的跨国零售企业优先选择绿证。

比如全球连锁零售商星巴克的减排目标是，到2030年，在碳排放、水资源使用、废弃物排放等指标上，比2019年分别减少50%。在门店端，2021年9月在上海推出了全球首家绿色门店——星巴克向绿工坊，计划至2025年，星巴克将在中国运营这样的绿色门店2500家，占全国门店总数的三成。星巴克主要通过绿证覆盖绿色门店的电力需求，保证它们全部对应可再生能源电力。

一名零售行业人士分析称，作为租赁店铺的零售企业，受地理条件、供电环境限制，企业很难直接采购绿电或自建发电资产。“店铺所在楼宇的电网输什么电，就只能用什么电。因此，零售企业采用购买绿证方式实现减排，更为便捷。”

环保在消费行业也是时兴话题，各大品牌已把可持续发展视作未来新赛道。普华永道发布的《2022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中国报告》显示，45%的受访消费者愿意购买用可回收、可持续或环保材料制造的产品，这意味着他们愿意为环保产品的环境溢价埋单。

据财新了解，在中国，H&M、迪卡侬、宜家、沃尔玛、百威等消费品牌均在通过不同途径参与绿电消费。“某跨国服装企业曾试图帮助江浙沪地区的供应链企业组团跨省购买绿电，但这些企业用电量规模有限，在电力交易中很难和发电企业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最终我们建议这家公司购买绿证。”彭澄瑶透露。

央国企带头

“绿电的应用是大势所趋，中央企业要带头。”中国移动相关人士告诉财新，中国移动目前绿电年消费量约30亿度，占比超过5%。“我们是国务院国资委明确的首批11家‘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之一，在绿色低碳、公司治理上需要起到引领作用，因此也在积极推广绿电应用。”她说。

1044号文明确提出，推动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发挥先行带头作用，稳步提升绿电消费比例。

2021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央企在推进工业绿色升级、建立低碳化的绿色工厂、提高工业电气化水平中的关键作用；2022年，又发布《中央企业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将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结果纳入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

相关部门还希望通过政府采购拉动绿电应用。今年4月，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要求，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数据中心相关设备、运维服务时，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应逐年增加，2023年最低使用率5%、2025年30%、2027年50%、2030年75%、2032年达到100%。“对所有想进入政务市场的供应商来说，这是刚性条件。”一名熟悉数据中心运营的人士指出。

但绿电消费是一笔硬成本。一家大型央企内部人士给财新算了一笔账，公司平均电价约0.6元/度，绿电溢价0.03—0.05元/度，每年公司电费约300亿—400亿元，在此基数上购电成本提升5%—10%，是一笔很大的支出，需要在其他地方千方百计地降成本。

为响应国家低碳转型号召，许多工业领域的央国企也在尝试绿电应用。据中国石化提供的数据，截至2023年1月，该公司累计购买绿色电力11.7亿度，参与绿电交易的二级单位有15家，是国内绿电消费量最大的中央能源企

业。在2021年9月首批绿电交易中，中国石化旗下燕山石化、合资子公司扬子石化—巴斯夫分别是北京、江苏两地的最大买方。此外，到2022年底，中国石化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近1吉瓦（GW，百万千瓦）；2023年计划开工建设光伏项目也在1吉瓦以上，自建绿电项目翻番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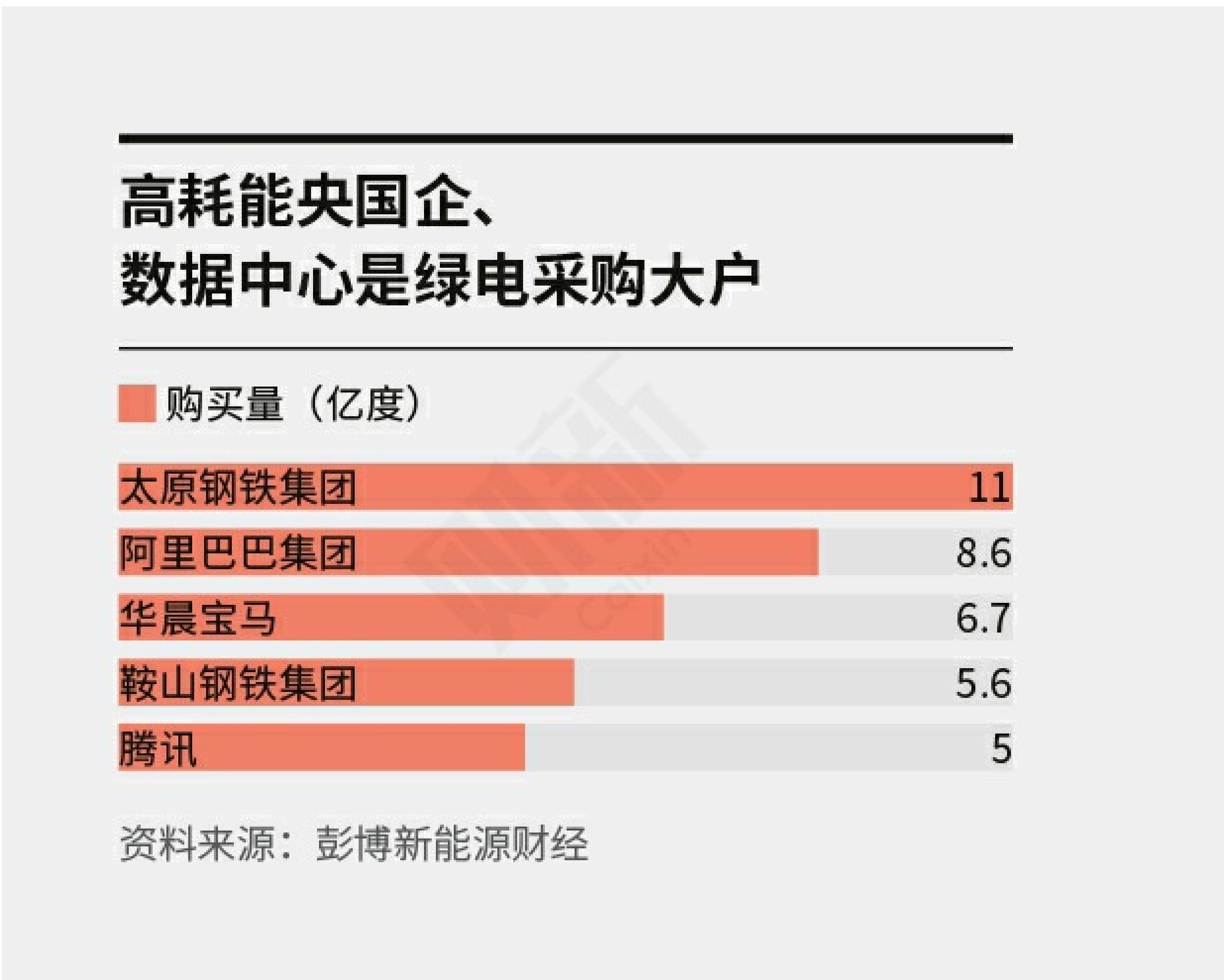
中国海油副总裁杨云向财新介绍，中国海油去年消费绿电3.05亿度，今年计划绿电消费量再翻3倍，达到10.5亿度。截至8月底，中国海油今年绿电实际消费已达7.3亿度，来源以自建新能源发电项目为主，参与市场化绿电、绿证交易为辅，在河北、山东、浙江、广东等多个电力市场均参与了绿电交易。

新兴的数据中心有"不冒烟的钢厂"之名，是绿电市场的积极买方。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的2022年中国企业绿电买家排行榜中，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以8.6亿度、5.04亿度交易量位居第二、第五。作为"能耗巨兽"，阿里云和腾讯云都提出了在2030年实现数据中心100%使用绿电的承诺。

"云计算有广泛的客户群体，下游客户算清自身碳账单、降低碳排放的需求越来越强，驱动云数据中心扩大绿电使用。"阿里云IDC研发事业部能源与碳管理总监毛宏举对财新称，阿里云用户中，零售、汽车、能源等行业企业有ESG披露需求，阿里云的碳排放则是用户间接排放的一部分。"一些公司也有碳中和愿景，在碳排放上和我们有共同目标。"他说。

毛宏举感受到下游客户的减碳动力越来越大，除企业自身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外，资本市场对ESG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企业减碳表现攸关上市、融资、估值等实际利益。"比如有客户打算港股上市，ESG报告披露要求会促进企业进行碳盘查，推动绿电需求。"而对已上市企业来说，也会有国际评级机构专门进行ESG报告评级，碳排放问题首当其冲，评级结果往往直接影响投资者决策和公司股价表现。

"投资者对ESG表现非常关注，腾讯成立了ESG委员会，希望通过扩大绿电使用，达到市场预期。"腾讯云数据中心双碳项目负责人梁家启对财新表示，作为耗电大户，企业需对潜在风险未雨绸缪，例如政策对数据中心能耗指标约束收紧，或将企业纳入控排范围等，腾讯需要更多采购可再生能源，以降低数据中心碳排放。



"国际上，绿电交易已是领先云计算企业的必选项。"毛宏举指出，云计算国际同行谷歌等企业，早在2010年前后就已参与绿电交易，对标它们的用能模式，国内数据中心对绿电的重视程度亟须升级。

据毛宏举介绍，阿里云目前主要开展与平价新能源电站的绿电交易，自2021年9月参加国内首次市场化绿电交易后，2023财年，在五大自建数据中心基地使用清洁能源的占比从上个财年的21.6%增至53.9%。



企业关心如何可持续获取绿电　体现减碳价值

用户绿电消费中的考量因素

绿电消费机制对比	自建、参股可再生能源项目	绿电交易	绿证采购
描述	企业直接投资分布式或集中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拥有部分项目所有权及相应环境权益	电力市场中长期交易的类型之一，用户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或由售电公司、电网企业代理）之间直接签订购电合同，类似欧美电力市场直接签署购电协议（Power Purchase Agreement，PPA）	用户单纯为环境权益支付额外费用。由国家对每兆瓦时（1000度电）可再生能源电量颁发证书，以证明其绿色环境属性
环境权益的惟一性（采购模式是否可以带来清晰的、不重复计量的环境权益）	确定	确定	不确定
采购规模（采购规模是否可以满足企业的目标）	分布式项目规模小，集中式项目规模大	大	大
就近性/本地性	高	中等	低
供应稳定性	高	中等（当前绿电交易并未于全国范围常态化开展；交易合同合约期通常在小于等于一年）	高
经济性	企业需要承担前期投资及相应运营成本，且项目运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企业能够锁定一段时间内的绿电价格，帮助企业降低电价波动风险，但需支付额外的环境溢价，每度电3—7分不等	小额交易价格较高，平价绿证约为30—50元/张（约合每度电3—5分），大宗交易能为企业获取更大优惠（每度电低于3分）

资料来源：落基山研究所，财新根据采访整理

腾讯也参加了国内首次市场化绿电交易，2022年绿电采购量约5亿度，2023年提升至5.34亿度。“去年由于整体市场大环境影响，绿电采购量增幅不大，但2030年碳中和的目标摆在那儿，还是会逐步提升绿电占比。”梁家启坦承，“我们对绿电成本非常敏感，多一分都会受到影响。在满足绿电额外性、可追溯性和就近性标准下，会考虑在哪里、通过何种渠道来控制绿电成本。”据财新了解，2023年，腾讯绿色电力使用占比约7%，目标逐步提升。

“碳关税”来了

近年来，全球极端气候现象愈发严重，迫使人类必须审视自身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欧盟是环保急先锋，是全球首个征收“碳关税”的经济体。经酝酿数年，2023年5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成为法律，首批覆盖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等行业以及有机化学品、塑料、氢、氨等产品，并将间接排放（用电排放）也纳入报告披露范围。2023—2025年为过渡期，其间申报企业只需履行报告义务；2026—2034年将逐步实施。

欧盟称，CBAM意在保护境内的气候行动，避免本土企业将碳密集型产业外包给排放目标较低国家造成“碳泄漏”。碳泄漏是指一地区采用较严格的气候政策减少碳排放量，却导致另一地区碳排放量增加。但因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处于价值链下游，CBAM也被认为会给发展中国家造成贸易负担，成为一种技术性贸易“绿色壁垒”。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就认为CBAM可能有违WTO（世界贸易组织）公平贸易规则。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曾对财新表示，中国不赞成CBAM有多重考虑，比如有效性、正当性问题，会否重复收税，认为各方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多边框架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应再采取单边措施，造成额外的财政负担。今年6月，中方向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提交的CBAM相关问题的建设性提案，获得了多国响应。（详见本刊2023年第25期《欧盟碳关税落定》）

尽管CBAM还在争议之中，且初期覆盖行业较少、出口占比不高、起征时间尚早等，多数观察者认为其对中国外贸的短期影响有限，但对长远影响还需予以足够的重视。

本质上，CBAM是将欧盟以外的产品生产，置于一个虚拟的欧盟碳市场中。即把欧盟碳市场中的“碳成本”原样复制给了它们的进口产品。彭澄瑶指出，企业现在就需要预期和判断，在中国不同省份乃至全球各区域，哪些地区的排放要求会不断收紧，哪种电力消费方式能抵消碳排放并受到认可。“今天所做的工作，是为了防止未来有一天，突然出现激增的环境成本。”

正因此预期，钢铁企业已成为中国的绿电消费大户。在BNEF的2022年中国企业绿电交易排行榜中，中国宝武

集团旗下的太原钢铁集团（下称“太钢”）位居榜首，当年绿电采购达11亿度，鞍山钢铁集团则以5.6亿度位居第四。

太钢旗下上市平台太钢不锈（000825.SZ）董事长盛更红9月5日指出，为应对欧盟碳关税，公司组织推进全流程在线碳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完成立项审查，项目包括组织碳核算、产品碳足迹、碳资产、碳控排、政策法规库等核心模块；同时还在积极开展绿电采购、自建光伏项目，持续增加绿电使用占比。

电解铝也是“碳压力”之下的焦虑者。云铝股份（000807.SZ）一名人士告诉财新，公司生产用电中绿电占比2022年已经达到89%，主要从云南省内市场购买，但今年上半年这一比重下滑到70%，主要原因是云南干旱，水电出力不足。

这名云铝股份人士指出，云铝股份之所以愿意使用绿电，一方面是预期未来碳市场扩容，如果电解铝行业被纳入其中，绿色的“水电铝”比“煤电铝”的排放更低，能减轻碳成本；另一方面，更是由下游客户对绿色铝的需求推动。“我们生产的铝材主要出口欧洲，当地对铝材的绿色环保属性要求较高。”云铝股份称。事实上，绿色铝也得到了较高的销售溢价。“可以在市场上每吨多卖3000—5000元。”一名电力行业人士告诉财新。



钢铁、铝的下游产业——汽车制造行业也在加速减碳，更多是由于其国际总部响应欧洲进取的减排政策。汽车制造商华晨宝马在BNEF的2022年排行榜中排名第三，全年绿电采购量达6.7亿千瓦时。“宝马对供应商都有绿电使用、再生材料使用等要求。未来，不同的车型项目也有减碳目标。”华晨宝马业务发展和企业可持续发展部经理郭隽菡告诉财新，自2023年年中起，国产车型逐步使用低碳绿色汽车用钢。

“欧洲企业在各种法案的推动下大力减碳。”郭隽菡介绍说，今年4月，欧盟议会通过了《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要求企业做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内容相关的详细信息披露。“企业需要用行动去支撑报告与披露内容。”她说。

“大力减碳变成了欧洲公司的战略，必然传递到全球。”一名资深气候政策研究者告诉财新，这实际是一个从政治传递到企业、再从国内传递到国际的目标，供应链的绿色标准化管理也随之一致起来，“中国企业必须与之共舞，因为这已成为市场准入门槛”。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韩雪告诉财新，CBAM不仅不认可中国的绿证，而且在其已明确的规则中，并未提及对各类绿证的支持，主要原因是CBAM是基于欧盟碳配额市场设计规则的，一方面，欧盟碳市场不考虑抵消机制，即企业的碳排放，不能通过购买绿电或绿证对直接排放进行抵消；另一方面，针对部分产品的电力间接排放，由于没有欧盟碳市场规则作为参照，且尚未确定时间表和细则，绿证的作用仍不明确。

据国家电网数据，当前外资、外向型企业消费量占全部绿电消费量近七成，多数外向型用户最在乎的是其所消费绿电的国际认可度。无法获得CBAM的认可，成为相当多企业的顾虑，制约了绿证在中国的推广与应用。一名电力央企负责人对财新直言，2022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8.64万亿度，其中风、光等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1.37万亿度，占比15.9%，这是相当大的比重，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应用清洁能源最多的国家。“即便这样，我们的

绿证却不被认可，这需要反思。”他说。

在这名电力央企人士看来，在清洁能源的应用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很不够，包括政府高层间交流以及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使得世界对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认识不足。此外，CBAM是一种贸易壁垒，需要中国政府进一步规范绿电和绿证的同时，启动与欧盟的碳关税协商与谈判，依据双方市场特点达成某种共赢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双方机制上的冲突，这样才有利于绿电在中国的推广。

“中国亟须建立一个公认的、明确所有可再生能源环境权益的机制。”基建咨询机构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工程上海一部总经理陈伟认为，绿证就是这一机制的探索。下一步，政策层应考虑扩大国内绿证的国际认可度，衔接国内绿证与碳减排体系，以发挥在国际碳抵消市场的作用。

据陈伟介绍，目前在国内市场，绿证、绿电与碳市场的衔接已有试点。“京、津、沪碳市场允许绿电抵消相应碳排放，但各地具体操作存在差异。天津碳市场直接承认绿证的抵消，北京、上海则需要绿电交易凭证；进一步看，如何把绿证、绿电纳入全国碳市场还不明确。中国自身要先明确建立起一套系统，建立起国际对话的工具性基础。”他说。

变绿路径

因绿电交易可溯源性高，在多数用户心目中，绿电比绿证更受欢迎。“绿电从交易机制上保证了参与项目是无补贴的，这更能证明企业绿电消费行为对直接减排的贡献。”BNEF中国研究主管寇楠楠解释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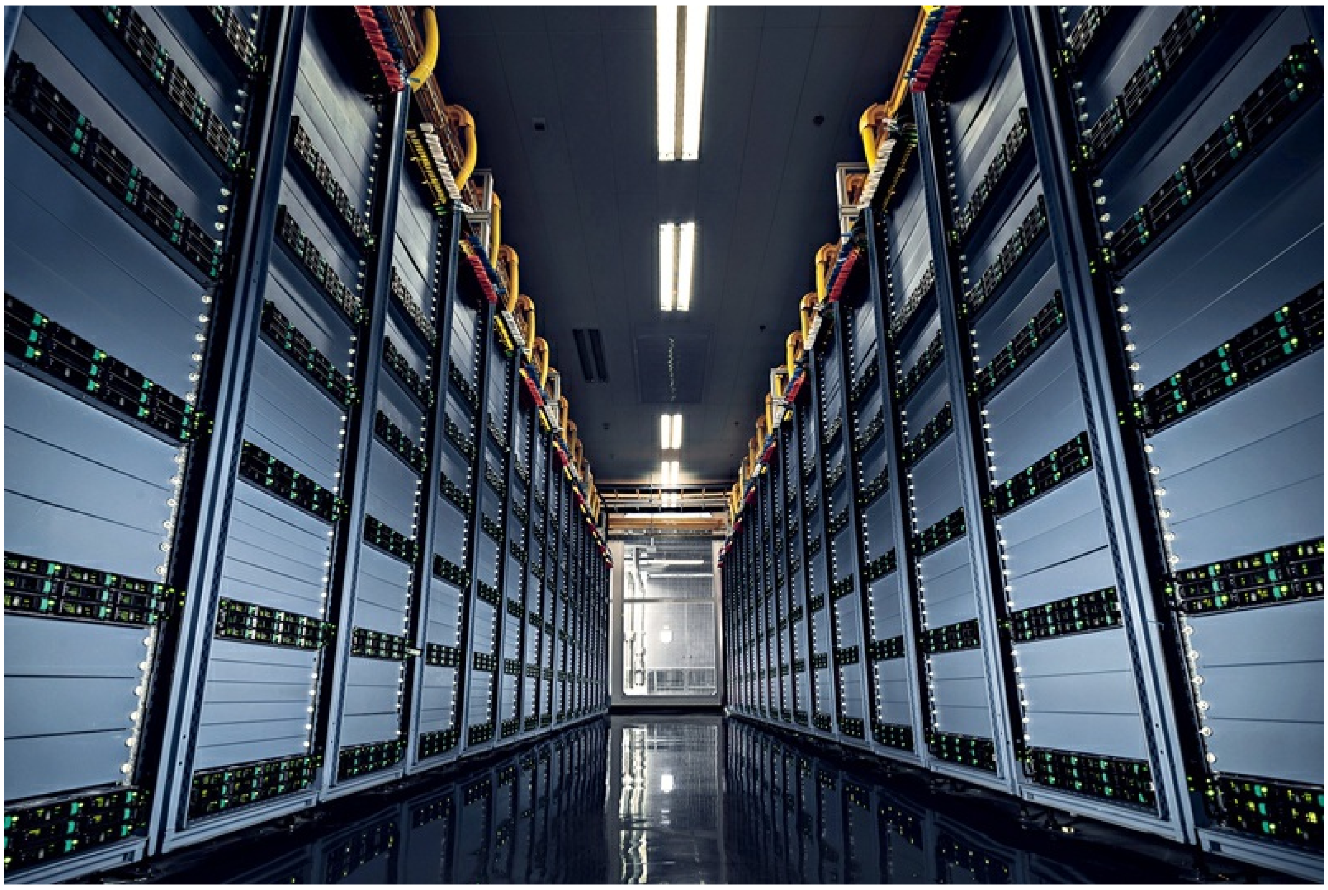
腾讯就偏好绿电交易。“因为绿证存在跟补贴挂钩的情况，还有环境权益重复计算问题；而绿电由交易中心组织，提供‘电证合一’的资源，对企业较为友好。”梁家启表示，但1044号文出台后，腾讯也在关注绿证的发展，判断这是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的方向，“比如分布式光伏绿证、海上风电绿证进入市场后，如有无补贴绿证，也可以作为绿电的补充。”

目前新能源发电企业把环境价值变现的途径包括出售绿电、绿证、出售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为碳市场中的抵消机制），当前政策并未限制发电企业只能选一种变现方式。“目前由于电、碳市场尚未完全打通，同一个可再生能源资产存在重复核发绿证和CCER的可能。”落基山研究所部门总监路舒童对财新说。

但多家企业人士对财新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绿电市场供不应求，“买不到绿电”。“我们的感受是，用户侧绿电需求增速比供给侧更快。”毛宏举说。

近期，1044号文大幅扩大了绿证供给量，牵引国内绿证价格明显下行。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显示，今年1—7月，风、光平价绿证成交均价约42元/张（即每千度电42元）；但8月起，每张绿证价格下跌超过两成，当月风电平价绿证成交均价降到32.9元/张，光伏平价绿证成交均价降到31.6元/张。一名浙江售电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当地绿证最低价一度跌至20元/张以下——这一价格折合度电成本低于0.02元，相比绿电有了些许成本优势。

前述立讯精密人士更期待绿证市场的爆发。他称，从企业情况看，绿电交易需要集团各地厂区通过售电公司在省份内分别购买，而绿证可以从集团层面综合统计和推进，更灵活且具有规模优势。“但国际上绿证认可度存在争议，而且最终选择何种绿电消费方式，还要看客户需求、不同工具的成本，以及在不同国家适用性上的综合评估。”



河北省张北县，阿里巴巴数据中心。在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的2022年中国企业绿电买家排行榜中，阿里巴巴以8.6亿度的交易量位居第二

在韩雪看来，绿电交易受地理限制和机制约束，跨省跨区供应不足是用户当前普遍的痛点。跨省份绿电交易中，即便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愿意匹配，也很难全电量交易成功。

一个现实的例证是，今年8月中旬，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江浙沪三省份与山西进行了今年9—12月首次绿电交易跨省份集中竞价试点，最终2亿度电量成交，但经电网安全校核后，只有1.5亿度可以完成交易，削减量达25%。

“目前跨省份特高压通道优先输送省份间框架协议内电量，这部分电量基本把通道占得差不多了。”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一名负责人称，新组织的跨省份绿电交易，只能见缝插针地寻找通道空闲时段，这也造成跨省份绿电交易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上海远景科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电力交易专家（COE）龚昭宇也指出，由于绿电的出售和交割需要通过电网协助，必须考虑电网输送能力、电厂实际发电情况以及用户用电情况。

“绿电采购的一大痛点是合同电量跟实际交付电量偏差比较大。”梁家启也说，因为风、光的间歇性，腾讯去年绿电实际交付率和合同存在差异，“今年通过更准确地预测，以及对发电场站实际调研了解绿电具体情况，来提高合同交付率。今年绿电交付明显好于去年”。

由于新能源出力的波动性，发电和实际用电的不匹配，部分电力行业人士建议，通过“证电分离”方式，将可再生能源的电能量价值和绿色价值分别确认。

“不仅是合同偏差问题，还有电力系统额外成本问题。”一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人士指出，比如用户签了1亿度绿电的年度合同，发电侧履约颗粒度却过粗，都是月内平衡甚至年内平衡，成本得不到合理体现。“未来绿电交易应解决发用交易双方的偏差处理机制。”龚昭宇也建议。

随着近期绿证价格下行，一名业内人士透露，有多个地方政府探询能否通过绿证，来抵消部分本地区能耗双控指标。“这是一个捷径。”该人士也预期，这一方式今年底可能会有一轮追捧，“一旦有一个省份采取大量购买绿证的方式控制能耗，那么其他省份就会跟进，短时间内或将推升绿证价格。”

从全球范围看，欧洲在减碳路径上走得最早，市场接受度也最高。目前欧洲碳市场空前火热，高昂碳价对企业形成刚性减排约束。战争导致化石能源市场价格飙升，欧盟在新能源转型上更为坚定，欧盟碳价从2020年的20欧元/吨上涨到目前的90欧元/吨左右（约合690元人民币/吨）。相较而言，中国全国碳市场于2021年7月起步，目前碳价在50—75元/吨之间波动。生产相同的产品，在欧盟生产的碳价成本显然更高。昂贵的碳价意味着企业碳排放成本越来越高，进而提高企业使用化石能源的成本，间接激励绿电发展。

在欧洲，巴斯夫主要通过购电协议（PPA）和自建、参股可再生能源项目方式加紧应用绿电。

例如，巴斯夫曾在2021年投资16亿欧元收购全球最大近海风电场Hollandse Kust Zuid 49.5%的股份，目标是为其在比利时的化工生产基地供电，该基地是巴斯夫集团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该风电场将在2023年底投入运营，总装机容量1.5吉瓦，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无补贴海上风电场。

另外，巴斯夫还与法国能源公司ENGIE签有一份为期25年的PPA，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将在整个协议期内向巴斯夫提供总计207亿度的绿电。

在英国，面对减碳压力，当地钢铁企业步履维艰，首先需要大量资金将传统高炉炼钢改造为较低排放的电弧炉炼钢。塔塔钢铁在英国威尔士塔尔伯特港的钢厂是英国最大钢厂，包括工艺模式在内的能源转型就需要投资12.5亿英镑，英国政府承诺提供5亿英镑补贴。

另外，英国第二大钢铁企业英国钢铁也面临同样困境，预估能源转型总投资10亿英镑，英国政府或将予其3亿英镑补贴。英国钢铁曾在2019年5月宣布破产，2020年3月被中国河北的民营钢铁企业敬业钢铁，以约5000万英镑收购其100%股权。

如何实质性减碳？

寇楠楠告诉财新，当下从实质性减碳角度看，绿电消费存在“鄙视链”，按偏好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自建或股权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电站、绿电、绿证。这一次序显示了绿电投资的额外性从高到低。

“如果用户所消纳的绿电来自新建电站，且电站投资来自用电企业自身，这部分绿电消费的额外性最强——能够直接带来新增装机，因此认可度最高。”寇楠楠说。

腾讯、巴斯夫等企业均表示青睐自建或参股可再生能源电站；其次的方式是目前国际流行的PPA（Power Purchase Agreement）模式，即电力用户跟电站投资方签订长期稳定的绿电购买协议，投资方凭借协议融资建设电站；电力用户则通过购电消纳绿电。在国外，PPA的额外性被普遍认可，主要是购电协议成为融资前提，证明了绿电装机的“额外性”。

国内绿电交易大致可类比PPA。落基山研究所董事郝一涵指出，国内与国外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和市场交易机制均不同，比如国内主要由自上而下规划，往往是先装机后卖电。前文提及的巴斯夫与国电投在广东湛江的项目就属于特殊的PPA。

“这一协议长达25年，仍是一个战略框架。由于国内尚未正式推出多年期绿电PPA，在这之前，此类长协还需要逐年和电力交易中心落实。”龚昭宇指出。

当下，市场对绿证的质疑更多指向其是否隐含补贴。例如三峡水电属于可再生能源范围，可以核发绿证，但在部分用户看来，三峡水电建立之初就设立了三峡基金，该电站的建设成本已在电价中被全社会分摊了，因此其绿证效力存有争议。

此外，由国际非盈利组织核发的国际绿证（I-REC）目前在市场上的可信力与估值都最弱，价格低至约10元/张左右，也是因为这些绿证此前允许含有补贴的风光项目申请。从2023年开始，I-REC暂停了补贴项目注册。

绿证和绿电正在经历几年来最高速的发展，但对中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碳减排的实际影响仍十分有限。

2020年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主要依赖补贴，之后风、光项目进入平价时代，新增项目停止补贴。政策层随后推出绿证和绿电，目的是以市场化方式替代补贴，持续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践行减碳路径。

从2020年开始，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每年发布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至今已经第四年。该责任权重按省级行政区域设定消纳目标，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每年责任权重的

比例会有微小变化，整体趋势是逐步提高。例如，广东省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最低消纳权重为29.5%，2023年为29.6%，2024年预计为30.6%。各省份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协同承担消纳责任。如不能完成消纳责任，这些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购买绿证弥补。

然而，该机制并未从政策上设置经济惩罚措施，使得政策效力寥寥。“如果完不成消纳责任，政府应该设置一个罚款额度，企业就会比较绿证的成本与罚款成本，然后作出理性选择。”一名电力行业人士认为，经济惩罚标准实质上可以成为绿证的价格“锚”。

绿证价格本应围绕“锚”上下浮动，依据供需变化形成市场价格。但如今“锚”不存在，绿证交易也不是企业为完成自身消纳责任而进行，更多是自愿购买或满足国际供应链的需求。

上述电力行业人士认为，绿证没有严格的认证标准，以及强制约束机制与价格锚的缺失，是其难以在国内大范围推开的主要障碍。

中国的“双碳”目标明确提出，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而截至2022年底，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7.5%，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为7.6亿千瓦。这意味着，未来8年这两大指标还有待高速提升。

2013年以来，中国以产业补贴政策促进风电、光伏大发展，新能源发电装机量领跑全球，但为此承受的补贴压力也滚动累积，越来越难以支撑。据业内资深人士测算，截至2021年底，此前投建的含补贴项目的年补贴需求量约为1500亿元，每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资金约为900亿元，年度新增补贴缺口约600亿元。截至目前，这部分补贴缺口存量已滚存至约4000亿元。

“发展绿电的目的就是代替补贴，通过市场支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述电力行业人士表示，赋予新项目绿色环境价值，才能让它们在无补贴情况下与其他电源竞争，建立合理回报机制，激励可再生能源持续投资与发展，进而实质性减碳。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双碳目标的中国答卷

版面编辑：肖子何

专栏丨全球货币地位因何终结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美元能否保住其全球地位，不仅取决于美国与俄罗斯、中国或金砖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美国能否控制住债务飙升和更广泛地协调好经济和政治活动

文丨巴里?艾肯格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

美元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是否摇摇欲坠？许多评论家的回答是“是”。

俄罗斯自然希望这一答案是对的，因为俄罗斯已被美国银行体系拒之门外，并被剔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中国希望借机鼓励各国使用人民币交易；巴西总统卢拉则呼吁金砖国家创建一种共同货币替代美元。

由于担心被制裁，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后就开始与美元脱钩，这一担心随后变成事实。此后，不少评论家警告称，其他国家目睹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后，将会效仿克里姆林宫的做法。

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反映了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还反映了中国希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愿景，其他政策所反映的追求经济和金融自给自足为这一愿景提供动力。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元的单一主导地位不太可能在两个大型经济体争夺主导权的背景下维持，只有一个经济体能够从美元“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中获益。

卢拉提出的共同货币倡议反映了金砖五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已经不容忽视，无论美国是否同意，它们都应在具有顶级影响力的货币圈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这些全球地缘政治的发展是否预示着美元主导地位将终结？至少是20世纪的历史表明并非如此。

诚然，历史证明，国际货币地位是可能丧失的。但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发行国无法控制的地缘政治环境。

很大程度上，20世纪的全球货币史就是英镑的历史。“一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和金融实力被削弱。英国失去了大量熟练的劳动力，出售资产为战争融资，此后又面临来自其他经济体的激烈竞争。更重要的是，“一战”后英国公共债务规模快速扩张，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0%，是“一战”前的6倍。

这引发一个问题：英国将维持其债务的价值，还是像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最终所做的那样，通过通货膨胀来偿还债务？

尽管美元在上世纪20年代初已经成为竞争者，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决定维护英镑的国际地位，并得到政治阶层的广泛支持。英国选择将价格维持在“一战”前的水平，恢复了此前英镑对黄金和美元的汇率，并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了痛苦的措施来限制公共支出。

这些政策以牺牲英国竞争力为代价，损害了产出和就业。但为了重新确立英镑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种牺牲是可以接受的，金融领袖们认为这符合自身利益，帝国主义者则认为这是维持英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因此即使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英镑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动摇。

“二战”结束后，英国债务继续增加。同时，英国政府承诺，充分就业压倒一切，这意味着英镑政策将截然不同。为了协调刺激需求、充分就业与外部平衡之间的关系，英镑在1949年贬值。英国政府通过外汇管制和商业威胁阻止了其他国家央行和政府对英镑差额的无序清算。这些措施与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背道而驰。与教科书中“二战”后英镑与美元仍在持续竞争的观点相反，梅里斯?阿瓦罗（Maylis Avaro）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英镑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

此时，地缘政治也发生变化。当英国在1956年为了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而入侵埃及时，英镑暴跌，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提供帮助，直到英国撤军，这彻底削弱了英镑的全球地位。但是，这些地缘政治事件只是确认了英镑衰落既成事实。

英镑衰落留下的基本教训是，全球货币的发行者应当有能力捍卫这一地位，否则就会失去全球货币地位。因此，美元能否保住其全球地位，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与俄罗斯、中国或金砖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美国能否控制住债务飙升，避免另一场徒劳的因债务上限导致的摊牌，以及能否更广泛地协调好经济和政治活动。

版面编辑：肖子何

回溯｜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3年第38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9月22日至23日，习近平出席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并为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

9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审议通过《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方案》，听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督查调研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草案）》。

9月18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9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7项。

9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柬埔寨首相洪玛奈、老挝总理宋赛、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越南总理范明政、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普坦、东盟秘书长高金洪等亦出席。

9月21日，美联储决定暂停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5.25%到5.50%之间。

9月19日，伊朗宣布5名被关押在美国监狱中的伊朗公民将获释。与此同时，5名被关押在伊朗的美国囚犯也将被释放。此外，伊朗在韩国两家银行被冻结的60亿美元将完成解冻并转入伊朗在友好国家的账户。

9月18日，加拿大政府指认印度政府关联一名加拿大籍锡克教知名人士遭枪杀事件，下令驱逐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印度政府称加方说法“没有事实依据”，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作为报复。

9月18日，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退出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

9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后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对参与美售台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实施制裁。

9月19日，交通运输部表示，在上海、深圳邮轮港口试点恢复国际邮轮运输的基础上，全面恢复进出中国境内邮轮港口的国际邮轮运输。

9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马耳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多轮会晤；9月18日至19日，王毅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同俄官员共同主持中俄第十八轮战略安全磋商。

9月18日，“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9月16日至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工商银行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立宪，黑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分别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刘立宪系主动投案。

9月18日，乌克兰内阁下令解除包括安娜?马利亚尔在内的乌国防部6名副部长和国务秘书的职务。解职名单中不包括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帕夫柳克。

9月15日，俄罗斯央行宣布，自当日起提高基准利率100个基点至13%。

9月21日，鲁珀特?默多克将辞去福克斯和新闻集团董事长一职。

9月18日，绝食抗议19天后，59岁的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因健康状况恶化被送入医院，李在明8月31日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总统尹锡悦的施政。

9月15日，中国男子篮球运动员易建联在广东广州举行退役仪式，正式告别21年的职业生涯。

9月19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龚建华受贿案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华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50万元。

9月16日，深圳公安发布消息，近期，公安机关依法对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杜某等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月14日，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因涉嫌吸毒期间非法购买枪支、非法持枪受到刑事起诉。

9月12日，越南首都河内一栋九层公寓楼突发大火，河内市公安局确认火灾造成56人死亡、37人受伤。

版面编辑：肖子何

前瞻丨斯洛伐克举行议会大选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资料图：罗伯特?菲佐。由前总理罗伯特?菲佐领导、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方向党”（SMER–SD），仍在各家民调中稳居榜首。这意味着，菲佐最有望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赢得组阁权，并当选新一届斯洛伐克总理。图：John Thys/视觉中国

文丨财新周刊 路尘

中欧国家斯洛伐克将于9月30日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这场为应对今年5月该国政府辞职而提前举行的大选，或将成为改变这个中东欧国家政治走向的分水岭。

截至发稿，由前总理罗伯特?菲佐领导、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方向党”（SMER–SD），仍在各家民调中稳居榜首。这意味着，菲佐最有望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赢得组阁权，并当选新一届斯洛伐克总理。

以亲俄疑欧立场著称的菲佐，主张俄乌应在当前交火线基础上谈判，并质疑西方军援对俄乌战场态势的影响。他还暗示，若能再次当选，将带领斯洛伐克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在9月17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菲佐还明确表示，若他领导的政党赢得大选，斯洛伐克将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

斯洛伐克曾是最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盟成员国之一，俄乌冲突爆发前，该国85%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相较之下德国仅为65%；斯洛伐克还是欧洲主要的天然气中转国，俄气经其转运至捷克、德国和奥地利等地。

早在俄乌全面冲突爆发前，斯洛伐克就已深陷经济与政治危机。2021年4月，爱德华?黑格尔接替因采购俄产新冠疫苗风波而下台的马托维奇，成为斯洛伐克总理。但黑格尔执政的两年间，斯洛伐克未能通过争取欧盟复苏资金推动全面改革。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带来的震荡，迅速将斯洛伐克的通胀与能源价格推升至失控水平。

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的2022年3月，黑格尔带领斯洛伐克采取积极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成为最早向乌克兰移交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致命武器的欧洲国家之一。但随着斯洛伐克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加剧，2022年9月，该国由四个党派组成的原执政联盟宣告瓦解。同年12月，退出执政联盟的自由与民主党以政府应对民生问题不力为由，推动议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2023年5月，黑格尔政府正式宣布解散，前央行副行长鲁多维特?奥多尔被任命为看守政府总理，直至四个月后选出新一届政府。这一时期，因政治丑闻下台、至今仍多项官司缠身的菲佐，则公开将斯洛伐克内部的经济民生问题与欧盟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等政策挂钩，并由此迅速在短期内积攒起民意支持。

斯洛伐克对俄乌问题的立场摇摆背后，是战事不断延长之下，欧洲部分民众逐渐滋生的对欧盟政策的失望和质疑情绪。今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51%的斯洛伐克受访者认为，西方国家或乌克兰应为俄乌冲突负主要责任。而除了斯洛伐克以及持鲜明疑欧立场的匈牙利，类似的舆论波动也正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浮现。

版面编辑：肖子何

国风丨北京明确老楼加装电梯流程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北京海淀区，一处老旧小区内加装的电梯正式运行。老楼加装电梯在全国多有推行，但低层业主和高层业主因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纠纷的情况屡见不鲜。图：视觉中国

文丨财新周刊 牛牧江曲

北京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老楼加装电梯已多年，相关规定持续完善。9月18日，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自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操作指引（试行）》，进一步规范加装电梯的报建、施工、验收等。该指引提出，具备加装电梯条件的，有一户申请即可启动征询意愿工作。

此前根据规定，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必须加装电梯，这导致大量存量老旧住宅楼建设为七层以下，且未配备电梯。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在一项指导意见中提出，各级政府要把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点改造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给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北京自2017年起加大老楼加装电梯工作力度，连续四年将其列为市政府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其间连续印发多个文件完善加装电梯时的种种环节，包括不同楼层业主出资比例指导区间、加装电梯时的工程技术导则等。

老楼加装电梯在全国多有推行，但低层业主和高层业主因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纠纷的情况屡见不鲜。北京市住建委于2022年2月印发的一项工作指引还提出，同一单元其他业主可以给予低层业主适当经济补偿，补偿金额从业主筹集资金中支出，由业主之间协商确定。

加装电梯是老旧小区改造中的重要一环，国家亦从立法层面支持了这一举措。刚刚于2023年9月1日起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国家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并发挥社区基层组织作用，推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

根据北京市年初发布的2023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任务，全年要新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01个，新完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43个。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最新数据，截至8月底，市属老旧小区改造新开工 208个、新完工128个。

北京市的老旧小区改造采用“政府+居民+社会资本”的方式，即改造资金由三方共担，政府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后支持基础类改造内容；功能完善类的改造内容则鼓励居民捐资捐物、投工投劳。同时，北京市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即可通过提供专业化物业服务方式参与，如提供“改造+运营+物业”服务，也可作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通过“投资+设计+施工+运营”一体化实施方式参与。

除改善民生这一作用，老旧小区改造虽不同于城中村改造、旧改和棚改，仍是当前经济形势下拉动投资的手段之一。国信证券7月22日的研报称，老旧小区改造潜在市场约 1.6万亿—2.4 万亿元，2022至2025 年均投资约 2100亿—2700 亿元，对应可分别带动规划设计和建筑检测 20亿—40 亿元的市场空间。

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6.7 万个。住建部也于2020年和2023年两次发布文件，要

求各地结合实际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鼓励具备条件的项目提前开工实施。

版面编辑：肖子何

心智丨你能持续快乐吗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插画丨董必奇

文丨蓝玲

我们希望能一直体验快乐，体验到以后又希望能强化它，更持久地维持它。我们不只能从当下体验快乐，还能更多从回忆过去与畅想未来中感受快乐。只是，这样的快乐足够真实吗？

我们回忆起某一次旅游，或者某一次与朋友聚会，大都感觉愉悦。但是，回忆中的感觉，会契合当时的感受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提出过一个"峰终定律"（peak-end rule），指我们对一件事物的记忆仅限于高峰和结尾，事件过程对记忆几乎没有影响。高峰之后，终点出现得越迅速，这件事留给我们的印象就越深刻。

峰终定律反映出，我们的回忆并不能忠实地体现事实的原貌。我们对过去事件的回忆，更多是反映当时体验过程中感受最强的时刻和事件即将结束的时刻，而非整个事件的体验。比如一次旅游，整个行程都非常愉快，但在行程即将结束时，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以后回想起，你可能就会觉得这次旅游整体体验很糟糕。

峰终定律也给了我们启发，计划活动时，不妨给它建立一个快乐的高峰点和好的结尾，这样回忆就会更偏向那些美好的部分。

我们对过去经历的回忆会出现偏差，那么对未来的畅想呢？我们想象现在的一些愿望在未来可以实现，总是快乐甚至是兴奋的。但是，心理学家也提醒，我们对未来的快乐并非一无所知，但在预测未来时，感觉同样会出现一些偏差。

曝光效应，是指我们对不断重复接触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好感，即使这种接触是发生在意识之外的。它如何影响我们对未来的预测？环境中的危机层出不穷，我们对新奇刺激的出现就要谨慎回应，如果没有心存戒备，很可能就会陷入危险。但是，如果一个刺激重复曝光，并且没有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就会把这个刺激视为是安全的，从而放松警惕。

然而，这真的就安全吗？例如，我们并不能确定，一个住在附近、你经常碰到的、没有表现出恶意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只是我们的警觉性确实会降低。熟悉会促成喜爱而非厌恶，而这个过程，我们还很难意识到。

当我们拥有一件东西，对它的价值判断也会出现偏差。禀赋效应，就是指人们对已经拥有的东西会赋予更大的价值，即使一开始并不那么喜欢它。有一个实验，研究人员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直接得到一个小物品（比如咖啡杯），一组有权选择得到一个物品还是一些现金。后来在把这些小物品卖给研究人员时，直接得到物品的被试，比选择得到物品的被试，出价会更高。

这些影响表明，我们对未来快乐的预测不一定准确，我们对熟悉的、已经拥有的东西，会分配更多喜爱。

心理学家发现，预测未来快乐最典型的偏差，是对快乐持续时间的估计。比如你会听到有人说，要是买彩票中了大奖，未来的生活就非常幸福了。事实真是这样吗？

有心理学家采访了 22 位彩票中奖者，其中每一个人在过去一年都至少得到过 5 万美元。研究人员要求这些中奖者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预期的幸福程度，以及参加一些日常活动（比如与朋友聊天、看杂志）的幸福程度做出评定。研究者还采访了58 位没有中奖但与中奖者为邻的人。结果发现，与没有中奖的人相比，中奖者现在、将来的幸福程度并没有高出多少，但在日常活动中，却感受到更少的快乐。

此外，研究者又采访了 29 位遭受过重大事故，并且四肢永久残疾的人。发现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比彩票中奖者稍低，不过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低，但他们预期未来的幸福，以及在日常活动中体验到的幸福，却比中奖者要稍微高些。

意外的惊喜，没有给人带来持久的快乐；意外的灾难，也没有永久打击人们体验快乐的能力。上述研究结果，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想。为什么？

原因在于“适应”，当你反复感受同一种快乐刺激时，主观体验到的快乐，就会逐渐减少；反之，当你不断感受一种痛苦的刺激时，主观体验到的痛苦，同样也会逐渐减少。心理学家将适应快乐的现象称为“享乐跑步机”（hedonic treadmill），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会不断遇到各种幸福或不幸的事，我们要不断适应环境中的各种变化，最终都会返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中立状态。

所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中了彩票之后幸福感没能持续很久，因为他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并且期望与欲望可能同时增加，那么，最初的快乐，很快就降低了。

不过，如果没有适应，可以长久地体验快乐，就是一件好事吗？适应的作用，在于保护我们免受外界的刺激，而快乐与痛苦，都会让人分心，丧失对环境的敏感，这不利于生存。长期的痛苦不利于生存这很好理解，那长期的快乐呢？你品味一下乐极生悲、得意忘形这类成语，是不是也容易理解了？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生活的常态中去。

但是，也不必担心，适应并不会永久改变我们体验特定快乐的能力。想想，你每一次观看日出、看到孩子的笑脸、读到温柔的诗歌，是不是都会感觉愉快？心理学家告诉你，把不同种类的快乐分散到不同的时间，可以扩大快乐的感受，但把它们聚在一起，却不一定能让你感受到多倍的快乐。许多快乐的体验，本质上就是快乐的，不管体验多少次，体验的那一刻就是快乐的。适应的过程会影响我们对快乐的体验，但不必太在意它。

更多精彩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肖子何

天眼丨纳卡地区冲突再起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图丨视觉中国

图丨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9日，数千名亚美尼亚民众聚集在首都埃里温市中心，要求承认纳卡地区未得到国际承认的亲亚美尼亚政权“阿尔察赫共和国”、采取措施保护纳卡地区的安全，并呼吁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西尼扬辞职。当日，阿塞拜疆宣布在纳卡地区启动以“反恐行动”为名义的军事行动。20日，“阿尔察赫共和国”宣布，接受阿塞拜疆方面提出的条件，同意停火并解散自身武装。21日，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表示，阿塞拜疆已完成了所有目标，阿塞拜疆政府已恢复了对纳卡地区的主权。随后，双方将就纳卡当地亚美尼亚族人口的权利保障问题展开对话和谈判。

版面编辑：肖子何

回声（《财新周刊》2023年第3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回来了:权力只对其来源负责，来源在哪里，哪里就有充分的保障。

《基本民生仍须保》

财新网友:近年压缩教育经费的趋势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宏观税负很高的国家，公共教育开支的不断下滑，让人不解。对各类基建项目的投资可以看作是（相对）短期投资；而对人的投资，包括教育卫生医疗文化，则是长期投资，也应该是一个文明国家所有公共投资的最终目的。

《基本民生仍须保》

东邪门人:日本巅峰时GDP总量达到美国的72%、 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中国目前人均GDP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中国会像30年前的日本吗？**》

石城居士:如果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执行机构对骗子无能为力，这才是社会最大的悲哀。

《紫晶存储退市：钱去哪儿了》

版面编辑：肖子何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3年第38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会不会出现应用井喷盛况——@《财新周刊》《中国AI大模型开闸》，相关视频：马斯克：AI出错将造成严重后果

留学生无论归国还是在海外求职的酸甜苦辣，亦是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缩影——@《财新周刊》《留学生求职迷途》，相关视频：美联储官员：美国就业市场开始降温。

版面编辑：肖子何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3年第38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财新时间】 刘守英： 乡村系统被打破后， 农民三代何以立身？

从土地改革、乡村业态到农民身份，对于农村问题，不理想化、不浪漫化、亦不刻板印象，实证方知全貌

【华尔街原声】

美国汽车行业罢工或严重干扰汽车供应链/摩根士丹利：美联储加息近尾声/苹果新品发布未及市场预期 股价下跌。

版面编辑：肖子何

答疑（《财新周刊》2023年第38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联系编辑部：邮箱newsroom@caixin.com或电话（010）8590 5000

广东读者 庆胜：

9月19日，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表《香港贫穷状况报告》，显示疫情过去、社会恢复常态后，香港低收入家庭的贫困状况反而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原因为何？

本刊产业新闻部：

疫情暴发以来，由于生活必需品涨价，香港普通民众实际收入明显缩水，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则随着资产价格上升而强劲增长，贫富差距愈发悬殊。报告指出，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复原进展呈两极化，高收入家庭更能受惠于经济复苏，而低收入家庭不仅未能受惠，反而面临新的挑战。

报告发现，2023年一季度香港整体贫穷率达20%——这里的“贫穷”根据特区政府设立的官方贫穷线来定义，一季度香港整体贫穷线水平为14700港元。用“相对贫穷”而不是“绝对贫困”，因香港扶贫委员会认为在香港这样富裕的城市，不能仅以生存的水平来界定贫穷。

与此同时，香港在职贫穷问题仍然存在，近21万人即使有工作也依然处于贫穷状态。在职贫穷比例最高的行业为零售、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乐施会认为，在职贫穷的问题一方面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过低有关，许多基层市民即使有工作也未能脱贫；另一方面是因为就业市场趋向零工化，而社会对零工保障不足。

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黄硕红表示，疫情期间新增的岗位逐渐取消，加上疫情让各行业电子化快速发展，变相削减了许多低技术工作岗位，令基层未能受惠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贫穷情况反而加剧。

版面编辑：肖子何

休刊启事（《财新周刊》2022年第38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因国庆假期，《财新周刊》10月2日一期休刊，10月9日一期正常出版。

本刊编辑部

版面编辑：肖子何

最新财新周刊｜电竞闯亚运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电子竞技受众广泛却争议不绝，进入主流体育赛事后前景何如？



2023年7月14日，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国家集训队部分队员正式亮相。中国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电竞市场，目前核心电竞爱好者近亿。图：腾讯电竞

文丨财新周刊 关聪

2023年9月23日晚间，因新冠疫情推迟一年的第19届亚运会在杭州开幕，这是中国第三次承办亚运会，也是电子竞技（下称“电竞”）首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进入亚运会。

9月24日起，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亚运版、和平精英亚运版、刀塔（Dota 2）、梦三国2、街霸5、足球在线4，这七个项目将在九天中陆续开战，中国电竞国家队参与除街霸5之外的全部项目。31名平均年龄24岁的选手遴选自全国近20家俱乐部，此前他们拿过超60个各类赛事的冠军奖杯。

多名受访的电竞从业者预测：中国队有望在王者荣耀项目拿到首金；在英雄联盟大概率与韩国棋逢对手；而在刀塔项目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都是潜在劲敌。“中国队的整体表现一定会很不错，但就某些项目而言，韩国队、泰国队、越南队和中国台北队等也有机会。一些项目很难预测，有时可能到最后一刻才见分晓。”越南电竞协会秘书长DO VIET HUNG告诉财新。

对中国电竞行业来说，这一时刻意义非凡。据游戏行业调研机构Newzoo，到2022年底，电竞行业在全球产出近13.8亿美元收入，中国占近三分之一。中国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电竞市场，目前核心电竞爱好者近亿。

电竞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中国，2003年被列为正式体育竞赛项目。20年间，随着海外电竞游戏引进，中国游戏公司积极投资赛事和直播平台，俱乐部兴起，电竞借助日益丰富的比赛和互联网内容平台逐渐大众化。

2015年至2017年，全球电竞人口从2.35亿激增至3.85亿；2017年4月，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下称“亚奥理事会”）将电竞纳入亚运会比赛项目，国际奥委会随后也认证电竞为正式体育项目。2018年，电竞先作为表演项目进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代表队收获两金一银，但不计入总奖牌榜。2021年，中国战队EDG在英雄联盟S11全球总决赛夺冠，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出圈”热潮。

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体育信息中心负责电竞项目的组织和参赛工作。据财新了解，因为电竞国家队未开放品牌赞助和联名，在商业资源上逊于其他项目国家队。“电竞第一次进亚运会，流量本身要比一些传统体育项目高，主管部门比较谨慎。”一名业内人士说。

电竞及其“入亚”一直伴随着争议。把电竞纳入大型体育赛事的障碍在于，电竞缺乏大肌肉群身体活动，久坐屏幕前不利于健康，与突破身体限制的传统运动会精神相悖。此外，电竞需要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从青少年中选拔培养人才，但家长对电子游戏的成瘾、“氪金”、危害视力、影响学习等问题普遍戒备，对电竞接受度不高；政策层面

出于未成年人保护等角度，在强化电子游戏监管的同时，也将电竞参赛者限定在成年人范畴。

9月6日，国际奥委会增设了由传统体育经理人领导的电子竞技委员会（Esports Commission），但真正的电竞“入奥”为时尚早。由于坚持拒绝存在血腥暴力内容的游戏，国际奥委会对电竞的接纳度停留在“虚拟和模拟体育”（virtual and simulated sports）上，在整体改革方案中严格区分游戏的形式。在6月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子竞技周上，肢体深度参与的射击、跆拳道和舞蹈游戏等虚拟体育项目占据主流。但本次参与亚运会的七个项目，只有体育模拟类游戏（SPG）足球在线4接近此标准。

从商业角度，电竞选用的游戏大多为游戏开发商运营的商业游戏，需根据市场反馈更新版本调整玩法，且生命周期有限，从《星际争霸》到《王者荣耀》，中国主流电竞游戏20年里更换数代。商业游戏不可避免会出现版权、代理等诸多利益纷争。2023年，本作为亚运项目之一的《炉石传说》在国内停运，正是由于游戏开发公司暴雪与其中国代理发行商网易出现续约争议，最终从亚运项目中剔除。

“亚运会给了电竞像传统大球项目一样深入日常生活的机会。”腾讯游戏副总裁、电竞总经理侯淼告诉财新，电竞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意义还在于为行业提效。“就像手机有各种型号的充电线，电竞选手、办赛以及系统工具的标准不同，就会出现‘重复造轮子’的情况。”

业界对本次电竞进入亚运会抱有诸多期冀：借“入亚”进一步为电竞正名；监管系统化规管项目，并给予更多资源；俱乐部青少年训练（下称“青训”）因青少年保护问题被迫停止后，还需探索新的选才方式。而电竞国家队此次表现，或将攸关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未来。

财新数据专题《晋身亚运正式项目 游戏电竞的前景与争议》，结合本篇深度报道和游戏行业的全面数据与资讯，数据通Pro会员专享。

什么游戏能入亚运？

2021年9月，亚奥理事会正式确定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在雅加达亚运会表演赛上已经亮相的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和炉石传说再度入围，新入围的和平精英将与王者荣耀一起以改编后的亚运版亮相，此外还有刀塔、梦三国2、足球在线、街霸5。作为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比赛的技术代表，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席霍启刚要求项目选择需照顾不同成员单位的群众基础，覆盖多种类型并兼顾个人电脑（PC）、手机端等。

英雄联盟和刀塔是MOBA（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电竞的两大“顶流”赛事，也是PC端电竞的代表游戏；王者荣耀则是国产移动电竞代表项目，国内受众根基稳固；炉石传说是卡牌类电竞；足球在线则是与传统项目同源的体育电竞；作为射击类游戏的和平精英，在版本改编上借用了“铁人三项赛”的思路；而街霸和梦三国在亚洲电竞赛事中影响力不及其他项目，特点是IP历史长。

电竞数据平台Esports Charts按历史最高同时观赛人数统计，全球最火的十大电竞赛事几乎全是MOBA和射击类游戏，英雄联盟和绝地求生分别排在第二、第四位，刀塔2则排在第六，王者荣耀国际版排第九。

侯淼告诉财新，除了上述参考指标，一种运动能否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还要体现时代特点、传递积极能量，以及能否在未来社会中发挥价值。“我们配合亚运会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在让更多观众看得懂的同时体现安全性、人文性和科技性，以及推出了亚运元素的亚运版本。”

和平精英、王者荣耀都开发了针对亚运会的特殊版本：前者取消对射、大逃荒等有暴力元素的玩法；后者则为公平起见，统一角色技能机制；足球在线采用的则是6月最新版本，选手对新版本的适应性和掌控力被纳入考核范围。

《炉石传说》由美国暴雪娱乐公司制作、中国境内由网易代理运营，但因双方未就商务合作续约事项达成一致，连同《炉石传说》在内的七款暴雪游戏自2023年1月24日起全部在中国停服，失去了列入亚运会电竞项目的前置条件，亚奥理事会在3月取消《炉石传说》项目。

电竞与普通体育赛事最大的不同在于，体育赛事基本规则长期不变，而电竞依托游戏，游戏影响力和受众基础差别大，且所有游戏都存在生命周期问题。

不同类型游戏电竞化后的表现悬殊，射击类电竞赛事在亚洲的热度一直不及欧美。本次入选亚运会的《和平精英》正是这类被称为“吃鸡”游戏的生存竞技射击游戏。“‘吃鸡’做电竞，观战视角有时不够聚焦，对比传统 MOBA或者FPS（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来说会对新观众不友好。”电竞投资人赵大伟告诉财新。

中国电竞擅长MOBA，射击类游戏则一直是欧美玩家的强项，国内战绩一般，加之游戏因审查问题做了大幅度改编，都限制了这类项目在国内的受众基础。一名北京的电竞赛事执行人士认为，“‘吃鸡’赛事不火的原因还在于官方缺乏规划，而像刀塔这类全球赛事每年都打大师赛，就会有积分制帮助选手进入更高层级的比赛。‘现在电竞一门心思往体育上靠拢，以射杀为核心玩法的项目很难成为主流。”

成体系的职业联赛更具备天然观赏性和号召力，类似LPL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可以从赛区打到世界赛，2021年《英雄联盟手游》（LOL-M）版号过审后，曾掀起国内俱乐部为LOL-M赛事筹备战队的热潮。

然而即便是《英雄联盟》，也面临游戏和赛事老化的问题。举办逾十年后，《英雄联盟》北美赛区LCS收视率逐年下滑。为减轻运营负担，开发商美国拳头公司决定解除LCS战队参加次级联赛的义务，各战队为节省开支选择裁掉“二队”，造成选手和教练失业。5月底，代表北美职业选手利益的协会LCSPA决定罢工，拳头公司不仅没有被震慑，反而要求协会在两周内复工并威胁取消夏季赛，最终双方和解。“传统体育行业的国际篮联、国际奥委会，谁敢（像拳头公司）这样硬气？所以赛事存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戏公司。”上述电竞赛事执行人士感慨。

拳头公司目前的主攻项目是2020年6月开启公测的《无畏契约》，意欲笼络未来五到十年的FPS用户群体，8月底宣布把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VCT）第四个官方联赛赋予中国赛区。

职业化、体系化的赛事，是电竞可持续的基础。“国内大球的职业联赛影响力是往下走的，反而是‘村BA’（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超’（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这样的民间赛事参与者越来越多；电竞恰恰反过来，官方赛事很成熟，像过往百城赛、城市网吧赛这类大众草根赛事反而很少了。”SPORTFIVE电竞业务负责人Ricky Wang解释称，这是因为大赛事给俱乐部的固定席位日益稳固，草根俱乐部和选手的上升通道遇阻，下级赛事又没有专门协会和游戏厂商运营，自上而下的驱动力不足。

腾讯、网易等游戏厂商开始开放赛事授权，鼓励第三方办赛。侯淼介绍，腾讯电竞的办赛体系分为专业版和大众版两个方向，大众版的目标是降低人力与软硬件方面的成本和门槛。“我们的赛事授权系统每年会收到成百上千的需求，其实大多数办赛方还不具备完整的办赛能力，如果我们把系统做得更智能、简便，降低办赛门槛，也会推进电竞的大众化。”

如何进入国家队？

4月底到6月初，六个亚运电竞项目的代理游戏公司在基于国际大赛、联赛成绩基础上拟定遴选范围，分别组织集训，时间最长的英雄联盟选拔过程持续一个半月，最短的刀塔2三天内从14名选手中挑出了6个人。集训期间的安排比俱乐部更紧迫，在每天超过八个小时的训练、对战中，选手们不仅要积累考核数据，还要参加体能训练、心理辅导，辅助教练员综合评估心理素质、协作性等指标。电竞在亚运会被首次纳入反兴奋剂管理，大部分教练和运动员都要从头学习，并规范饮食作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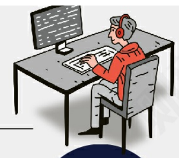
“从选拔国家队的角度来看，会更看重选手的团队适配度，挑选打法风格更适合整个队伍体系的选手。”AG电子竞技俱乐部有三名选手和一名教练入选国家队，创始人及CEO姜亚斐告诉财新，如何权衡选手个人和团队搭配、找到最优解，在选拔中颇具挑战。“选手要兼具个人能力和团队兼容度，能适应不同体系，也能积极配合和磨合。”

与其他所有赛事不同，电竞作为体育赛事明确是成年人运动。早在2006年，《全国电子竞技竞赛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才可注册电竞运动员并参赛，由此为中国职业电竞选手设下准入门槛。这样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未成年人参与训练，青训选手往往在14—15岁就进入俱乐部参与训练。

但到2021年，青训选手的训练时长不再能够得到保证。2021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下称“14号文”），将青少年接触游戏的时间限制在每周三个小时。政策出台的主要依据是：“一些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甚至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使许多家长苦不堪言，成了民心之痛。”

“14号文”一出，电竞行业剧震，部分俱乐部只得砍去了以未成年人为主的青训梯队。新规影响下，选材条件提高。“挑苗子的门槛抬高到17岁，但海外的天才少年是14—15岁就出道。”一名熟悉电竞俱乐部运营的人士告诉财新。

选拔、训练标准各异 电竞国家队如何诞生？



	英雄联盟	和平精英亚运版	王者荣耀亚运版	足球在线4	梦三国2	刀塔2
集训时间	4月下旬—6月初	5月—6月	5月16日—5月31日	5月28日—6月9日	5月23日—6月5日	6月6日—6月8日
竞争程度	25进6	16进5	22进6	15进2	20进6	27进6
集训安排	两个阶段，10小时/天	四个阶段，超8小时/天	三个阶段，10小时左右/天	三个阶段，超8小时/天	两个阶段，超10小时/天	三个阶段，12小时/天
	训练赛+自由练习	参考传统体育和版本特点训练	500余场小局对抗	双败赛制+小组淘汰赛	多场景训练+复盘	分组对抗
平均年龄	22岁	21岁	22岁	29岁	25岁	27岁
选拔指标	个人实力+团队合作+版本适应+健康状况+专业素养	集训考核成绩（70%）+综合能力评价（30%）	客观成绩数据（80%）+教练评价（20%）	客观成绩数据（50%）+教练评价（50%）	客观成绩数据（60%）+教练评价（40%）	技战术（40%）+抗压性（30%）+纪律性（30%）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集训队官方公众号，杭州亚运会官网

多国扶持游戏、电竞 主流体坛逐步接纳新兴项目

地区/组织	时间	表态与政策
越南	2022年	电竞被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列为第52项体育项目
法国	2022年	2024年奥运会期间将一系列电竞赛事引入巴黎
沙特	2022年9月	沙特王储发起国家电子竞技游戏战略，通过举办电竞活动等实施
欧洲	2022年11月	欧洲议会通过首项游戏决议，探讨电竞研究、IP保护和比赛公平性
德国	2022年11月	联邦议会批准将对游戏行业的国家预算增至7000万欧元
巴西	2022年11月	通过新法案设立电子游戏法律框架，刺激游戏行业发展
俄罗斯	2022年12月	将于2024年举办“未来运动会”，项目融合传统体育和电竞
印度	2022年12月	印度政府正式承认电竞为“综合体育赛事”的一部分
韩国	2023年2月	提出“K内容”出口战略，扶持游戏产业
瑞典	2023年5月	瑞典电竞协会成为瑞典国家体育协会成员，电竞成为正式体育项目
亚洲电竞联合会	2023年7月	发起亚洲首个电子体育官方赛事“亚运征途”，将建立亚洲电竞标准
国际奥委会	2023年9月	成立新的电子竞技委员会

资料来源：《2023全球电竞运动行业发展报告》，腾讯电竞

俱乐部的应对方案是开启多渠道选材并搭建更具针对性的青训体系，包括公开青训招募、官方训练营等。游戏内的“天梯”榜单中潜伏着靠天赋打出水平的“天才少年”，俱乐部往往会顺着榜单前排挨个询问意向，而从官方赛事或俱乐部办的青训营选出来的选手和“天梯”仍有差距。为保证未成年人的训练时长，电竞行业正在寻求豁免。

2022年8月，行业拟定的《电子竞技赛事通用授权指引》规定，未成年人参赛可预先报电竞赛事组织方批准，向电竞项目产品提供方申请免除游戏时间限制。一名从事游戏行业合规的法务人士向财新解释称，由于目前所有游戏都接入防沉迷平台，这部分游戏用户的时间和数据也都可查可管。“如果未满18岁的队员最终离开梯队，会被白名单剔除，回归防沉迷的常态化监管。”

上述电竞从业者认为，向游戏厂商申请“白名单”的思路其实并不合理，应由主管部门设立专门认证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运动员开放训练时间。近年国内立法、监管多层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虽然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体育信息中心负责电竞项目组织和参赛工作，但上游游戏公司要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请版号并严格接受防沉迷监管。低龄选手在手眼脑协调、快速反应方面有优势，而20岁左右一般是电竞选手考虑退役的时间。虽然“14号文”发布仅两年，对电竞成绩影响尚不明显，但行业需要做好赛训起始年龄推迟后合规经营、维持实力等各方面准备。

此次参与亚运会的电竞运动员全部都已成年。据亚运会官网，国家队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有公开资料可查的12位选手在16岁—18岁之间开启职业运动生涯，腾讯四个项目选手人均从业四年。刀塔项目还出现退役选手“重出

山”的情景，年龄超过25岁的王淳煜和赵子星都已近一年没有参与职业赛事，但因集训选拔时的竞技水平优于现役选手而晋级。而本次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5岁，年龄最小的滑板运动员崔宸曦只有13岁，跳水名将全红婵16岁，她在东京奥运会上夺金时不过14岁。

对比亚运会另一项“坐着”的竞技项目——围棋，从棋童、冲段少年到职业棋手的路径都不存在年龄限制。全国围棋定段赛设有青少年组，国家少年围棋队选拔赛少年组更是要求在16岁以下且有职业段位。曾与人工智能AlphaGo对弈的柯洁也参加本届亚运会，他六岁开始学习围棋，九岁就入段成为职业棋手。国内甚至有“读训结合”的公办围棋学校，儿童可以半天学棋、半天上文化课。

电竞国家队中不乏名将。英雄联盟项目选手全都是现役LPL主力选手，五人获得过全球大赛冠军，其中田野参加过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表演赛并获得金牌，这是他第二次登上亚运赛场；21岁的朱伯丞是和平精英职业联赛首位淘汰数破千的选手，也是拿下联赛周冠军到全球总决赛冠军全部冠军殊荣的大满贯得主。

也有人因伤病最终无缘国家队。6月25日，参加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的31名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队，但仅一周后，英雄联盟项目两名运动员宣布退赛：白家浩由于长期高强度赛训导致手腕关节不适，喻文波则有长期咳嗽和严重失眠问题。

对手在哪？

据9月22日杭州亚运会官网更新的参赛队伍信息，和平精英项目参赛队伍最多，共有21支代表队；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刀塔2则都云集了15支左右代表队。

韩国是亚洲最早盛行电子竞技的国家，是中国队最大劲敌。由于长期鼓励动漫游戏产业，韩国的电竞行业成熟度很高。韩国代表队参加本届亚运会和平精英亚运版本、足球在线、街霸5和英雄联盟四个项目，在极有可能与中国狭路相逢的英雄联盟，韩国队派出了在JDG英特尔电子竞技俱乐部效力的外援徐进赫（Kanavi）、朴载赫（Ruler），他们刚拿到2023年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MSI）的冠军。

各国电竞行业的发展直接与游戏公司“出海”战略相关。过去三年，受疫情影响，中国游戏公司在存量市场中厮杀，电竞赛事难以落地线下，促使它们“走出去”寻求更具性价比的市场。字节跳动旗下沐瞳的《Mobile Legends: Bang Bang》是东南亚收视最高的电竞赛事，正向中东、北非辐射；网易发力《荒野行动》和《第五人格》赛事，主阵地在日韩和中国港澳台；腾讯则在东南亚继续发力《PUBG Mobile》职业联赛；米哈游甚至把《原神》赛事带进英国高校。2022年中至今，上述游戏厂商在海外推进了近30项电竞赛事。

在亚洲地区，东南亚人口众多、结构年轻，电竞发展迅速。DO VIET HUNG告诉财新，越南有超过4000万游戏玩家和超过2000万赛事观众，至少有12个流行电竞项目，该国国家队部分项目选手直接来自锦标赛夺冠队伍。他认为，在一些项目上，越南队和中国队一样有冲金机会。

“手游电竞项目要比越南其他电竞项目成长得更快，这是越南市场给行业参与者的新机会，但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手游项目是更适合本土的。”DO VIET HUNG告诉财新，目前越南有四五个流行的电竞项目出自中国游戏开发商，无论对全国性行业协会还是专业运动员来说，都起到了支持作用。

另一个看重电竞的地区是财力雄厚的中东地区。沙特有近2350万年轻的游戏、电竞玩家，占国家总人口比例高达近70%。2022年2月，沙特宣布将向高新技术投资超过64亿美元，其中包括元宇宙等。沙特国家首相、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发布战略，在2030年使沙特成为全球游戏和电竞行业中心。萨勒曼同时也是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IF旗下Savvy游戏集团（SGG）的董事会主席，Savvy是其游戏中心战略的重要工具，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投资聚集相应的资源。



2018年8月26日，印尼雅加达亚运会王者荣耀国际版表演赛。

2月16日，与腾讯深度绑定的电竞赛事服务公司英雄体育VSPO获得SGG 2.65亿美元（约18亿元人民币）现金投资，这一数额在电竞行业罕见，接近中国电竞行业在2021年的整体融资规模。而英雄体育之前，SGG耗资15亿美元收购德国的ESL Gaming以及英国电竞平台Faceit，为截至目前电竞史上最大收购案。

但这次，中东国家在亚运项目上参与度有限。沙特21人的电竞队伍目前仅确认参与刀塔2、和平精英亚运版、英雄联盟三个项目，阿联酋仅派出10名电竞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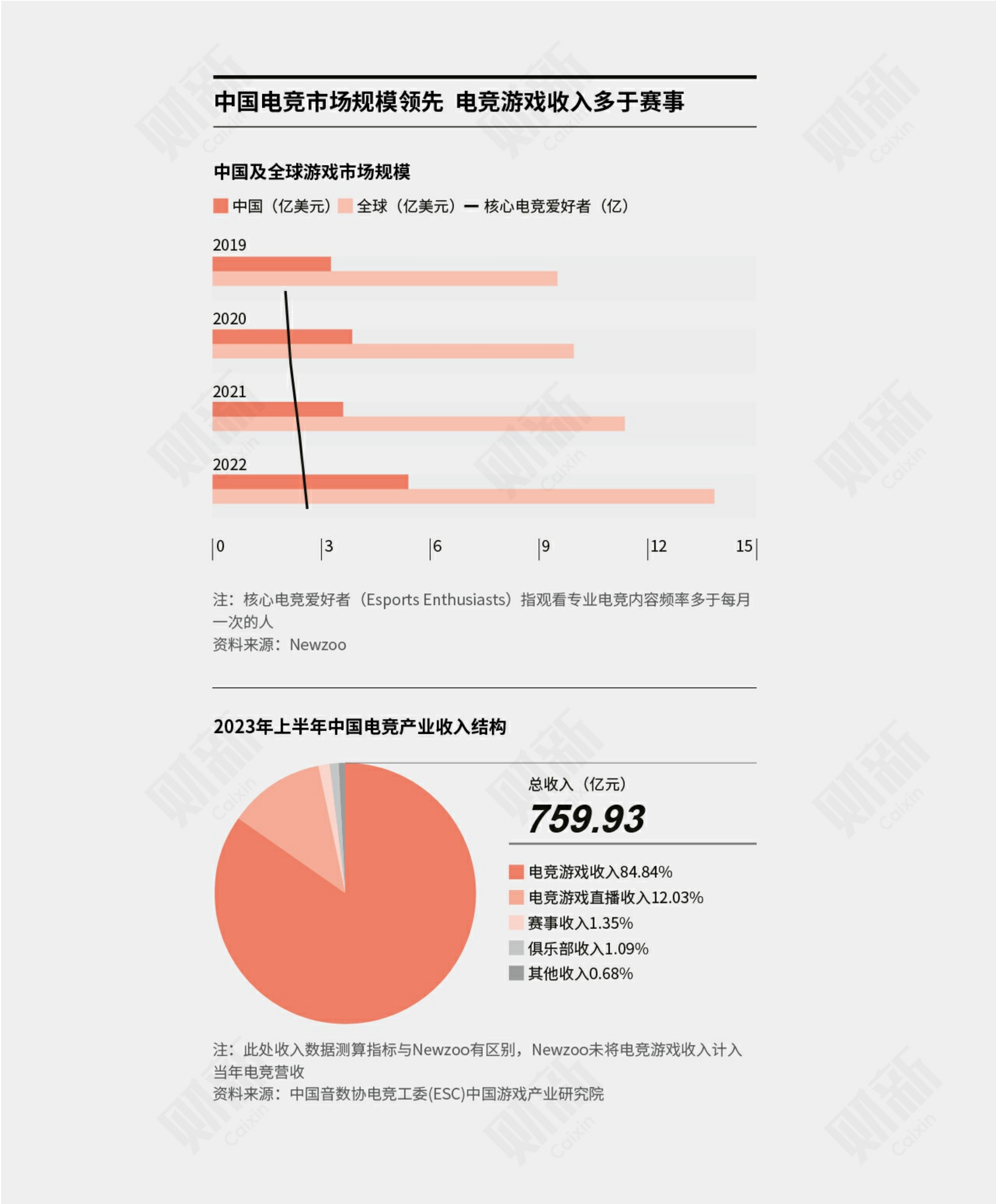
据Newzoo测算，东南亚、中南亚及拉美是电竞增速最快的地区，2020年—202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7.6%、23.4%和19%。这些地区的多个国家在近两年内开始将电竞认证为体育运动或释出指导性政策。越南提出电竞“2024年达到亚洲前五到十名水平”的目标，印度在2022年底承认电竞为“综合体育赛事”的一部分，巴西则通过了鼓励游戏产业发展的新法案。

姜亚斐告诉财新，韩国和欧洲的赛事体系搭建、俱乐部商务和赛训模式都更为完善；而海外更关注的是中国青训体系和内容运营的经验，“有赖于人口基数，青训的来源渠道更多，筛选和培养是我们花精力比较多的部分。内容精细化运营也是依托于自媒体平台的发展，由中国先开始尝试的。”Ricky Wang观察，海外已经有很多传统体育行业的人才进军电竞，“依靠体育行业成熟、成体系的商业化和管理方法做电竞，而这与国内完全不同，我们能从中借鉴的是——无论我们在做什么，要适合自身的清晰认知和发展路线规划。”

能火起来吗？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家队此次亚运表现或成绩，对电竞行业后续发展至关重要。

2018年后，受游戏行业版号停发等政策影响，电竞热度回落。据伽马数据统计，2022年中国电竞产业除游戏收入外的直播、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共计267.01亿元，同比下降4.17%，这一增速自2018年就在逐年放缓，2023年上半年的收入同比下降9.92%。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不再看好电竞产业。据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电竞投资24.4亿元，远不及2018年的71亿元规模。2022年，电竞行业在艰难的宏观环境中只出现三起投融资交易，总金额仅有1.7亿元。

“在7月腾讯电竞年度发布大会现场，有一些俱乐部来问我有没有兴趣投资。”赵大伟告诉财新。多数俱乐部很难盈利，截至2023年6月，中国可查询的电子竞技俱乐部共有191家。大多数电竞俱乐部的收益依赖赞助和比赛奖金，全球首个成功上市的电竞战队丹麦Astralis，公司上市三年后才盈利，由于股价下跌，已在8月开启退市流程。

与所有体育赛事一样，顶级选手和教练是出好成绩的关键，然而即便有明星选手，俱乐部也不一定获益。“一些平台和选手的直播合约不一定绑定俱乐部。”上述赛事执行人士说。

Ricky Wang告诉财新，“应努力将电竞的真实价值向传统体育对齐，目前横向对比体育的商业价值，电竞实在太低。在俱乐部增收方面，主场是一个很可行的路径，像传统体育球队主场收入、卖门票收入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是电竞欠缺的。”此外，电竞缺乏像足球那样的全球“破圈”能力，观众的兴趣往往集中在本土战队，比如英雄联盟中国赛区在欧美和韩国都有转播，但王者荣耀中国赛事很难在海外有观众，赛事权益卖不出去。

赵大伟认为，把俱乐部经营好，需要具备经营模式和品牌声誉两个要素，比如WE在陕西有自己的主场，俱乐部运营方向强调“正能量”。“但电竞的商业化希望做包括赛馆、直播基地、电竞文旅等在内的综合产业，比如腾讯这两年很关注电竞文旅，《王者荣耀》基于丝绸之路数字文旅的电竞友谊赛，能带动很多省市。”

电竞还希望向传统消费场景延伸。8月，AG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成都开了一家主题烧烤店。姜亚斐告诉财新，如今线下观赛氛围更浓厚，首先可以用AG的影响力带动餐饮，比如观众和朋友在AG主场看完比赛去烧烤店吃饭；其次希望能加深AG和成都的连接，“在没有比赛的日子，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场景满足粉丝聚集、观光打卡、休闲开黑、讨论赛事等诉求”。

不过，并非所有业态都能打电竞牌。疫情三年最火爆的电竞酒店场景监管趋严，8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发文要求坚决管住电竞酒店违规接待未成年人问题。

另一边，地方政府在“亚运年”抓紧出台扶持政策。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杭州、南京、烟台、深圳以及电竞俱乐部最多的上海，都明确鼓励发展电竞，措施包括支持企业和机构在当地承办电竞赛事，对办赛、建馆发放补贴等，深圳则力争三年内建成“国际电竞之都”。

“电竞是线上下密不可分的行业，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消费复苏对整个行业带来的影响，不论主场氛围还是票房收益，确实提升很大。”姜亚斐说，2023年2月，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春季赛除了上海，还有成都和南京两个战队主场；到6月夏季赛，就变成了五个城市战队主场同开，售票情况令人振奋。

版面编辑：肖子何

随笔｜一个记者和一个医生的死与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普朗说："屠杀，哪怕只有一次，也是太多。如果能避免未来的屠杀，我在天之灵，也会很高兴的"吴汉润说："我是好莱坞明星了，那有什么用呢？柬埔寨人还是没有吃的，没有家，什么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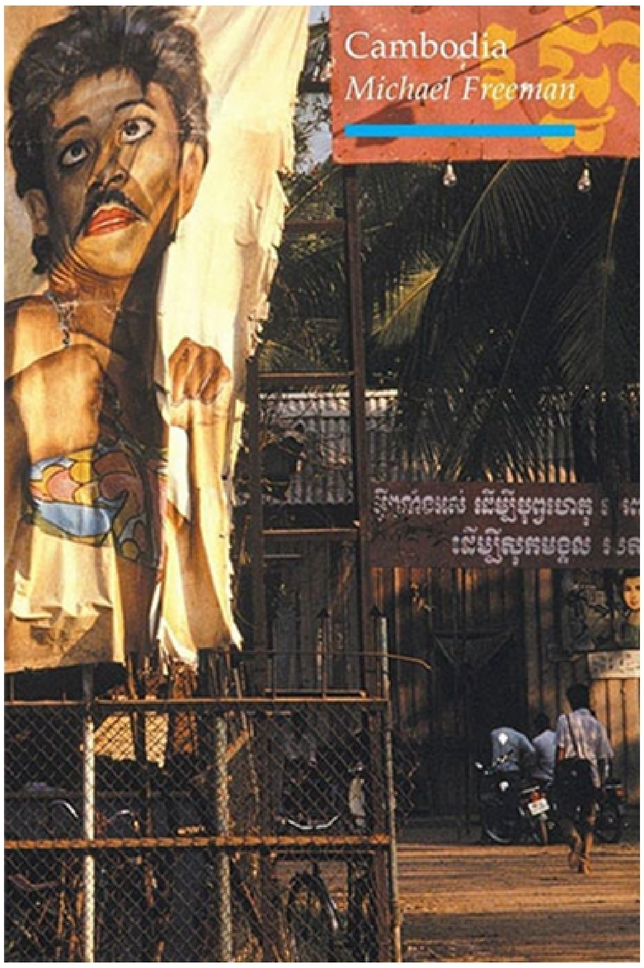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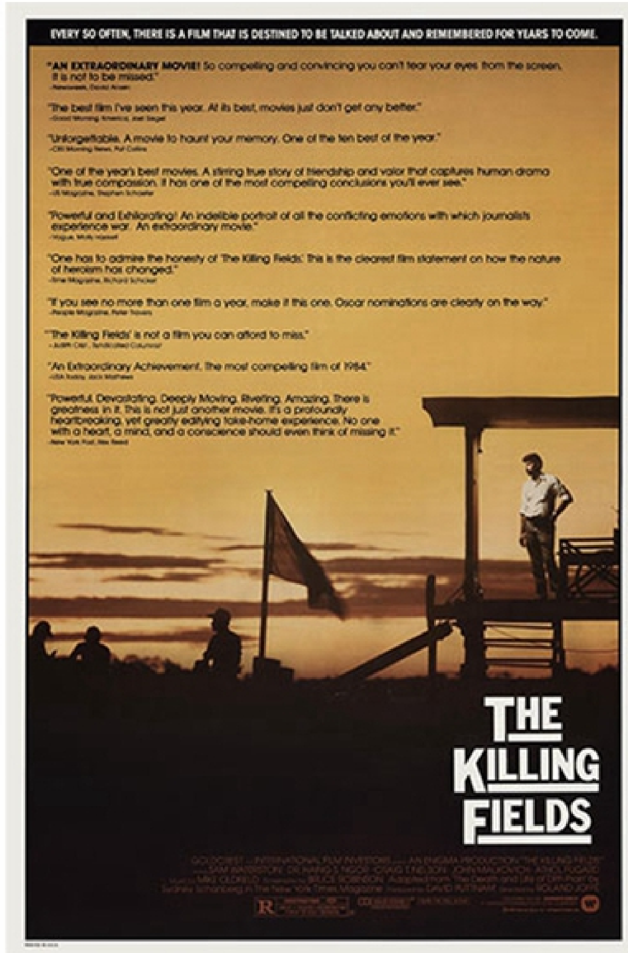
1985年3月5日，伦敦，《杀戮之地》主演吴汉润医生(左)与其饰演的柬埔寨记者普朗（右）在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颁奖礼上合影。

文丨财新周刊 李昕

住在新加坡，不时会遇到柬埔寨人。我常侧面打听一下他们的年龄。

1975年到1979年，波尔布特体制对柬埔寨全境四年的控制和屠杀，每一个柬埔寨人都有一段切身回忆。所以，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和之前的柬埔寨人，肯定都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有人讲述在波尔布特带领的红色高棉势力占领首都金边前，父母如何不惜代价把自己送到海外；有人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从泰国过境回柬，一路看到十几岁的孩子兵，背着AK47，胆战心惊??





左图：电影《杀戮之地》（1984）海报。右图：《柬埔寨》（2012），Reaktion Books出版。

然而，我听过的所有故事，都比不过我最近看到的一部老电影《杀戮之地》（the Killing Fields），和一本名为《柬埔寨》（Cambodia）的书。掩卷时，远望夕阳沉下东南亚茂密的丛林，很难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人间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是记者”

今年3月，杨紫琼成为奥斯卡首位华裔影后。有人追溯历史，发现她并非首位获得奥斯卡的华人和亚洲演员；早在1985年，出生于柬埔寨的华人吴汉润（Haing S. Ngor）便因在《杀戮之地》的表演，获得第5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吴汉润所饰角色的原型，是《纽约时报》驻柬埔寨战地记者西德尼?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的助手兼翻译、柬埔寨本地记者普朗（Dith Pran）。该片还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电影剪辑共三项大奖，是历史上拍摄柬埔寨红色高棉最好的影片，没有之一。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入首都金边，“民主柬埔寨”政权正式启幕。尚在金边的美军和外交官紧急撤到邻

近的泰国。在金边陷落前，西德尼为助手普朗及家人争取到随美军撤离的机会。但是，普朗坚持只送走妻子和几个孩子。他反复思量，跟西德尼说，自己也是一名记者，应该留下。

随后，红色高棉开始实施骇人的数百万人大迁徙，把金边当地人统统赶到农村，开启一个长达四年、以极端管束为特征、以全国上百万人（近四分之一总人口，也包括几十万越南裔和华裔）死亡为代价的社会实验。此时，包括西德尼在内的外国记者都藏身法国大使馆，等待撤离；普朗因是本地人，最终被迫离开使馆，和其他柬埔寨人一起进入当局的管控之下。

西德尼回到纽约，关于柬埔寨的报道获得了1976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但普朗生死未卜，西德尼陷入没有把他带出来的痛苦，只能四处打探他的消息。

在柬埔寨的劳改营中，普朗和几百万人一样当苦力，挨饿，随时处在死亡威胁下。《杀戮之地》最为震撼人心的镜头是，普朗逃跑的路上，在泥潭里踩空摔倒，爬起来一抬头，眼前是累累白骨，延绵不绝。这个画面，终于在屠杀发生九年之后，把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制造的惨剧带到世界眼前，让所有人直视。

为了活命，普朗假装成一个没文化的出租车司机，掩饰自己会英文和法文，靠机智、忍耐和运气，最终奇迹般逃出来。在泰国红十字营地，从美国赶来的西德尼，和劫后余生的普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980年，普朗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并成为《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同很多美国电影一样，英雄有一个完美的结尾——字幕滚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普朗来到美国的一年前，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将波尔布特政权驱赶到泰国边境的丛林里，终结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越南和苏联的支持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在金边成立。但是，红色高棉军队仍然存在，战火继续，而外界对屠杀惨剧知之甚少。甚至，就在普朗当记者的纽约，红色高棉的“民主柬埔寨”仍然是联合国大会上柬埔寨席位的合法拥有者。

西德尼在《纽约时报》杂志登载《普朗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Dith Pran），后出版成书，受到了具有国际声誉的英国制片人戴维?普特南（David Puttnam）的关注。


'Howdy'
75339









1.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游击队员开美制装甲车进入金边。图：AFP
2.1975年4月17日，金边陷落，游击队员合影。图：Roland Neveu
3.1975年4月16日，人群涌向金边市中心。图：Roland Neveu
4.1989年，越南军队从金边撤出。图：Jacques Langevin
5.1989年11月，金边，越南军队撤军。图：Francoise De Mulder

普特南1941年生于伦数，父亲是著名报界摄影师。普特南最初在广告业崭露头角，后与桑迪?利伯森联手创办了好时光制片公司，开始涉足电影业。他制作的影片获奖无数。1981年，普特南刚刚凭借《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他偶然读到西德尼书写的故事，决意把普朗的经历拍成电影。

《杀戮之地》1984年面世后，引起全球轰动，柬埔寨屠杀终于进入全球视野，也使普朗真正出了名。然而，自由的生活、稳定的职业、美满的家庭，并没使普朗忘记柬埔寨人曾经遭受的苦难。

“我不是医生”

在东南亚驻扎了25年的记者迈克尔?弗里曼（Michael Freeman）撰写了《柬埔寨》一书，内容涵括柬埔寨宗教、民俗、文化、文艺等，从各个侧面找到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切口，折射柬埔寨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杀戮之地》影片公映后，原型普朗与扮演者吴汉润的个人曲折经历，《柬埔寨》里有详细记载。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开进金边。记者普朗和老百姓一样，以为军队带来的是久违的和平，在街上跳跃欢庆。记者西德尼直觉感到有哪里不对，带上普朗，到金边医院去看看。出来时，遇上红色高棉军人的坦克，差点被抓。

在金边陷落的同一天，吴汉润还在金边医院给病人做手术。红色高棉的军人冲进医院，用枪指着吴汉润的头，问他是不是医生，他说出了一句拯救自己命运的话——“我不是，医生刚刚走，你们错过了。”与之后在劳动营假装不懂英语和法语的普朗一样，吴汉润也谎称自己是出租车司机。他们在同一间医院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且几乎用了同样的话术，躲过了知识分子在红色高棉政权下的死劫。

吴汉润在劳动营度过了漫长的四年，挣扎在饥饿和病痛中。食物极度匮乏，剧中的普朗偷喝牛血被抓，现实中的吴汉润则是偷藏在树林里找到竹芋，被殴打和砍去一截小手指。有人认出吴汉润是医生，他差点被打死，也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

最悲惨的是，进入劳动营几个月后，吴汉润的妻子难产。如果有手术器械和药，身为医生的吴汉润能为妻子剖腹产。但是，劳动营里没有任何医疗资源，他更不能说自己是医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腹中孩子死在自己怀里，无计可施。在吴汉润的苦苦哀求下，一个军人偷偷让他撕下了妻子身份证件上的照片，留作纪念。

吴汉润有37位亲人在大屠杀中死亡，而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距离仅2英里的两个劳动营里，普朗和吴汉润分别设法逃出。1979年，普朗在泰国难民营和从纽约前来的西德尼重逢时，吴汉润也在难民营里做医生。他和普朗一样在1980年来到美国，定居加州。

几年之后，《杀戮之地》的选角副导演偶然在洛杉矶一个婚礼上遇到吴汉润。彼时他在唐人街做志愿者，剧组极力邀请他出演电影，导演甚至做出一个明智的安排——选不知名的美国演员扮演西德尼，以免吴汉润演绎的普朗被掩盖了光芒。

饰演普朗的吴汉润并不是职业演员，而是一名妇科医生。没有任何表演经验，却能将这个角色演好，打动了全世界的观众，因为他演的几乎就是自己的故事。他本人经历的惨痛与普朗不相上下，而两个人的命运在战火中亦早有交集。

电影拍摄结束时，吴汉润对《纽约时报》说，“我如果现在死了，都没关系。这个电影会有百年生命。”和普朗一样，他希望用自己的故事为柬埔寨获得更多关注，让屠杀和死亡被更多人知晓。虽然一举获奖，他并没有投身演艺，而是在柬埔寨修建医院，建立基金会，扶助柬埔寨孤儿，自己却再未结婚。

1996年2月25日，55岁的吴汉润在洛杉矶唐人街离家不远的地方，遇到了几个十几岁亚裔青年打劫。他交出自己的劳力士手表，但因为不愿拿出一个金挂坠盒，被抢劫者开枪打死。

几年后，三名“Oriental Lazy Boyz”成员因吴汉润案在洛杉矶被判刑，但不少柬埔寨人相信，这是红色高棉的代表人物波尔布特安排的暗杀。

当普朗听闻吴汉润的死讯时，黯然道：“他就像我的孪生兄弟。我们是两个送信人（co-messenger），现在只有我一个了。”

吴汉润不愿拿出的挂坠盒里，珍藏的是那张20年前从劳动营里偷出的此生惟一妻子的照片。

“哪怕只有一次，也太多”

普朗不只是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记者，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全世界正视柬埔寨大屠杀历史。他出书、演

讲、访谈，以及，还有一种重要的手段——上电视。

1989年，普朗和扮演他的吴汉润一起，在逃生之后第一次回到柬埔寨。

在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这段行程赚足了关注。美国ABC电视台全程跟拍，并资助普朗和吴汉润的行程，为其王牌节目“黄金时间”制作一部一小时的专题片。普朗本身代表《纽约时报》报道，驻东南亚资深记者弗里曼则在吴汉润的安排下，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写篇专稿。

彼时离普朗从屠杀中逃生已过去十年，离电影获奖也有五年，柬埔寨还在撕裂与挣扎中：越南刚刚撤军，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柬埔寨国，洪森掌权。红色高棉在北方继续，波尔布特也还活着，仍然代表联合国所承认的柬埔寨。普朗和吴汉润回到的故土，不光浸润回忆，也充满未知。

美国专题摄制组在柬埔寨遇到一个问题：普朗只想当一个记者，不愿表演，甚至拒绝流露感情。在重逢、发现、探寻等应该情感丰富的场景下，他总是一半防御、一半职业地拿起相机，把自己和周围隔离。

导演苦于得不到自己要的素材。同行的记者弗里曼想出一个办法：去暹粒。暹粒在柬埔寨王朝旧都吴哥，是普朗的家乡，他的父亲和兄弟姊妹也都是在暹粒遇害的。

柬埔寨政府支持电视片的拍摄。因为国际对红色高棉越反感，新政权就越有合法性；而且，越南撤离柬埔寨后，谁都无法预料之后是红色高棉的反扑，还是现有政权的巩固？在诡谲脆弱的国际背景下，洪森需要来自西方世界的认可。他需要美国电视。

但同时，柬埔寨政府不希望国家看起来还像一个没有打扫过的战场，这会引起民众对其执政能力的怀疑。在暹粒，弗里曼带去的地方，政府就并不希望被外界看到，那是十年之后还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现场。一个旧华人医院，屋里屋外赤裸裸堆叠着尸体和白骨，就像十年前一样。

吴汉润一下跌坐在地上。普朗崩溃大哭：这里面很可能就有自己的亲人。他拿起一个个头盖骨，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兄弟姐妹。”

美国导演有了需要的镜头。普朗和吴汉润，柬埔寨记者和医生，把几百万人经历的屠杀和惨痛，再一次真实带到美国和西方观众面前。

ABC的节目如期播出。王牌主持人戴安?索耶（Diane Sawyer）开场用了近5分钟时间，让美国和世界观众认识柬埔寨：“今晚，假如你不是身在美国，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假如你的国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野蛮暴行；假如你有一两百万同胞——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被残杀、饥饿致死；假如，你觉得，那些犯下罪行的杀人凶手即将归来。如果你能想象这种种假设，你就可以理解身为一个柬埔寨人是什么滋味，也就能看懂下面节目里的人物所经受的折磨。”

节目并没有回避美国的责任。主持人介绍说，1969年之前，柬埔寨是一个相当和平的国家，人们生活简单，但吃喝不愁。1969年3月，为了阻止北越军队通过柬埔寨袭击在越南南部的美军，美国开始轰炸柬埔寨。此后这个国家陷入反复动荡中。

那是1989年9月的美国，距离柏林墙倒塌还有两个月。越战的阴影已经过去15年，他们即将赢得“冷战”，一切都是上升的、合理的，美国人自信到可以再次把视线投向留下过耻辱的东南亚。而这时候的柬埔寨，这个已经被战火撕裂了20年的国家，占领者越南刚刚离开金边一周，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担心红色高棉重返。两个逃过屠杀的柬埔寨人，在全世界面前，给自己的国民赢得了一小时的时间。



柬埔寨，小孩坐在一堆头骨旁。

在《纽约时报》网站上，仍可看到一段2008年发布的视频，《最后的话》（last word）。拍摄时，普朗明显是在病床上。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要用最后的力气，再留下一些声音。

“屠杀，哪怕只有一次，也是太多。”普朗说，“如果能避免未来的屠杀，我在天之灵，也会很高兴的。”2008年，记者普朗在纽约过世，终年66岁。

“我是好莱坞明星了，是吧？那有什么用呢？”吴汉润在一个纪录片里说。“柬埔寨人还是没有吃的，没有家，什么都没有。”

“他把那座奥斯卡奖杯变成武器：你要看奖杯，就得先听我说（柬埔寨），”拍摄了吴汉润纪录片的华裔美国导演曾奕田（Arthur Dong）在电视片里说。“他在世界各地演讲，因为再没有别人为此发声。”

1991年，巴黎会议签署协议，授权联合国全面监督柬埔寨停火；次年，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UNTAC）抵达金边，并逐渐发展成一个来自40多个国家、2.2万人的庞大群体。柬埔寨难民终于开始从越南、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甚至法国和美国返乡，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随即举行。

柬埔寨此后的发展难言成功，但终于迎来稳定。几番政治变动后，洪森持续执政直到2023年8月，其子洪马奈成为新的柬埔寨总理。

在国难浩劫中存活、为民众呐喊的柬埔寨医生吴汉润，被几个亚裔青年手中的枪杀死，仿佛冥冥中与几百万同胞宿命同归。当时，千里之外的柬埔寨，波尔布特还继续在泰柬边境山区活动，直到1998年，在红色高棉内部软禁

中突然死亡。

联合国特别法庭对红色高棉的审判要在2018年才迟迟落槌，在世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和乔森潘，因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彼时距离吴汉润过世已22年，距离普朗过世也10年了。

版面编辑：肖子何

专栏｜濮兰德看透“假共和”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胡适及当时的留美学生都是历史中人，未能预见到民国所发生的一切。濮兰德却能冷静地看到革命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站在铁路线旁的革命军。图：视觉中国

文丨王笛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辛亥革命后，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不过，也有人抱持悲观态度，英国人濮兰德（J.O.P. Bland，1863—1945）便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辛亥革命后不久就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假共和”。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对濮兰德的采访，标题就非常直白，称“中国不是真共和，而是新专制”，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综合的报道。

濮兰德曾长期在中国居住，算是一个中国通，记者希望通过他了解“中国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当时濮兰德在《泰晤士报》任职，正应邀在哈佛大学讲授一门关于中国的课程。

1883年，濮兰德首次来到中国，在清政府不同部门供职长达13年。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清廷授予濮兰德四品官衔，并颁“双龙宝星勋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后又供职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这些经历，让他有足够机会了解中国的人和事。他曾代表中英公司与清政府谈判铁路贷款，并在1906年至1909年间，与清政府签订了四份借款合同。濮兰德还出版了好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包括《慈禧治下的中国》《中国近事和政策》《北京宫廷记事和回忆》，以及《李鸿章》等。

濮兰德指出，中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共和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也不相信所谓的“中国觉醒”，或者说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他认为，在中国，有很长历史的专制制度，现在无非换成了共和的名号，而没有发生本质的转折。他还提出：一个新的中国不会通过革命突然出现，还得是逐步演化而来。从结构上看，中国人缺乏“对自由的追求”，中国官员的本性也不会突然焕然一新。像中国这种持续千年的专制制度，试图要在“一两年或者一代人之内消亡，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濮兰德评价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一针见血指出这个政策是“良心与政治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对弱小国家是同情的，有“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出于经济的压力，美国竭力寻找新市场，所以要对中国推动“门户开放”政策。而为实施这个政策，美国政府在处理中国事务时，“一直表现得慷慨和大度”；虽然明智，但也因“金元外交”而颇受诟病，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事务“缺乏经验和能力”。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对日俄在东北修建铁路的中立态度，这是“在关键时刻的严重失误”。由于这个“愚蠢的错误”，导致了日俄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

早在《纽约时报》发表这篇采访前，濮兰德就已经在美国做了一系列巡回演讲。他的观点引起了许多留美爱国学生的反感，对他“诋毁”新生共和国非常愤慨。如胡适，在1912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有J.O.P Bland者来自伦敦，曾在吾国海关执事甚久，今来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读之甚愤。”两天后（即11月21日）的日记中，

胡适又记录了濮兰德当晚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说，题为“The Unrest of China”（中国的动荡）。演讲结束后，胡适站起来，“质问其人何故反对美人之承认吾民国”。濮兰德的回答，胡适也记录了下来，“列强不能承认吾民国，以吾民国未为吾民所承认也。”胡适甚至还记下了濮的英文原话：We cannot recognize a Republic which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concerned。第二天（11月22日），胡适在日记写道：“连日以来Bland在各地演说，吾国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和纽约的留学生均写信来讨论“进行之方，抑制之策”。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召开“特别会议事”，讨论这件事。胡适建议成立一个“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

在当时，濮兰德能够提出这样深刻的评论，真可谓高瞻远瞩。这个观点其实和“五四”时期鲁迅的判断非常接近，小说《阿Q正传》《药》等便是濮兰德这个说法的经典诠释，揭示了共和革命对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许多西方人还在为袁世凯再造共和高唱颂歌的时候，濮兰德就看到了袁不是一个共和制度的信奉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不相信共和政体适合于中国”。

现在看来，胡适以及当时的留美学生都是历史中人，还沉浸在革命成功、民国建立的兴奋之中，当然不可能预见到以后民国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不能苛求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惊叹于濮兰德能够如此冷静地看到革命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无论他发表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如何，后来的历史的确证明了他的论断，可见其眼光的锐利以及透过表面看到问题实质的能力。□

版面编辑：肖子何

专栏丨一种社会脱臼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倘若我们像凝视外婆的睡姿一样，对那些艰难、生动、让人心碎的人的生存姿态同样凝视，或许可以找到诊治社会脱臼的药方



北京，街头拾荒的老人。图：视觉中国

文丨王梆
作家

醒汉街是一条专卖丧葬用品的老街。鲜艳的纸钱和冥衣，被晚风中的秋老虎追逐着，在歪歪斜斜的板楼小巷里飘荡。幼年时，我和表弟表妹常在那里寄住，由亲爱的外婆看管。

我们的身上总是裹着一千层汗，第一层还没有干透，第二层又从毛孔里冒出来。每天晚上为我们铺床时，外婆总是得用冷水浇透堂屋的水泥地板，再迅速铺上草席，然后赶鸭子式地吆喝我们躺下。然而，往往等不及我们的嬉闹声平息，外婆就已经睡着了。她的睡姿很奇怪，像一个执意要躺在棺木里的人，双脚并拢，双肘交叉叠放在胸前，皱皱的手腕底下紧紧压着一把蒲扇，和醒来时那个动辄甩大嗓门的女人判若两人。幼时看不出端倪，成年后才明白，在炎热、暴露、拥挤和逼仄的空间里待久了，人就会像挛缩在玻璃瓶里的气根一样，长出各种奇怪的睡姿。

“姿态”一旦印在记忆里，比身形样貌更持久，因此构成了我观察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角度之一。

今年仲夏回国探亲，受极端气候影响，家乡的夏天更炎热了。普通工人和小贩们，却依然全天候暴露在暑气的蒸笼里，连打盹时也不例外。卖水果的小贩倚靠在滚烫的四轮货车旁，修鞋匠们躬坐在难以容身的小板凳上，改裤脚的裁缝们不敢开大风扇，也用不起空调，一边忙不迭地擦汗，一边机械地踩踏着缝纫机??这些劳作和休息中的姿态，一成不变，像用身体锤炼的铁，熔入街角社会那永恒的、凹凸不平的肌理。

最让我动容的姿态，来自一个身形瘦小的驼背老妇人。她的胸脯几乎与脚面平行，行动却像叼食蚱蜢的鹧鸪般敏捷，只不过她潜入的不是灌木丛，而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只要不下暴雨，她就会不定时出现在各个楼层的垃圾桶旁，残破的草帽耷在拱起的脊背上，踮起的脚跟爆出深厚的裂纹。在刺鼻难耐的垃圾海洋里，她将可回收的纸盒、酸奶瓶、啤酒罐，一件件地挑拣出来。体感近38摄氏度的高温中，没有人和她搭讪，更没有人为她递上矿泉水或冰冻饮料。

她的拾荒基地，是园林名匠们精心设计的绿化带，有美丽的假山池、荷塘、儿童乐园、泳池和凉亭。从早到晚，孩子们的嬉闹声从绿化带蹿上高层住宅的飘窗或阳台，四面环绕、中心镂空的云端建筑，构成完美的扬声器。而她的存在是完全静止的，像一枚失声的琴键。

人们似乎无视她的一举一动，毕竟，她并不属于小区居民。她没有电子出入卡，不得不站在入口处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等人开门。每当此时，她刻意将整张脸隐藏在帽檐底下，让自己看起来更显得谦卑。当她的手拖车满载沉重的纸皮和瓶罐，需要有人帮忙稳住才能挪出铁门的时候，也鲜有居民会搭一把手，为她把门敞开。小区居民之间基于共同利益而心照不宣的礼让、友爱和互助，并没有像阳光或花蜜一样撒落在她身上。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社会脱臼”（Social Dislocation）。她和小区居民虽然共处同一个空间，却始终无法建立起任何内在的社会联结。在许多尚在承建、部分交付的高尚住宅小区，我也看到了同样的脱臼。

建筑工人从不光顾小区的新型超市、购物中心或手工糕点店，因为那里的物价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购买能力，他们只会在路边摊档添置日常用品，解决一日三餐。与光鲜的玻璃幕墙和绿化带相比，那些由电动四轮车支起的杂货摊、早点铺或宵夜点，看起来十分违和，而且普遍没有自来水源。不锈钢汤碗，套个塑料袋，煮好的粉面倒进去，吃完，塑料袋扎个口，连同残羹余渍，便在次日清晨随着垃圾车一起销声匿迹。这些捧着汤碗和塑料袋大口嗦吸、大汗淋漓的建筑工人也一样，当高尚住宅小区被浇上最后一层混凝土，他们也就消失了。

是什么制造着社区空间里这些病理性的脱臼呢？

回到英国后，我依然无法停止思考这个问题。英国的社区有针对贫困家庭的食物银行，有针对拾荒、露宿者的救助中心；建筑工人们当然拥有自己独特的消费文化，但他们不会被迫蹲在一个没有自来水源的环境里用餐。而我们的社区建构，似乎更多停留在兴趣爱好的层面，当人们谈论起社区生活，谈论更多的是少儿钢琴班、成人瑜伽班、观影或网球小组——或许，我只能将此归咎为视角的偏差。或许，并非只是缺乏对一些问题的应对方式，而根本就是无视。

倘若我们像凝视亲爱的外婆的睡姿一样，对那些艰难、生动、让人心碎的人的生存姿态给予同样的凝视，或许我们就可以找到诊治社会脱臼的药方。

版面编辑：肖子何

月谈鲁迅丨大炮与大众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我们看到的，是挣扎的鲁迅，挣扎于个人与群体之间，挣扎于观察与理念之间，挣扎于绍兴的当铺和上海的租界之间



1927年，鲁迅在上海的寓所中。图：视觉中国

文丨刀尔登
诗人

孔子传世的话中，我不喜欢的一句，是危险的“片言折狱”。孔子谨慎，只说子路有这样的本领，然而，一人能够与无人能够，是天壤之别。俗云“断章取义”，说的是将本文从语境中剔出，任意锻炼，为害人的利器，但便是保留了完整文本，人的一时一地之言，岂足以拿来知人论世？孔子声称“吾欲无言”而做不到，“食不语，寝不言”也多半做不到，他足足说了一辈子的话，然后叹气道，“莫我知也夫”。看来他也知表达的有限，那么“片言折狱”的地位也不过是一时高兴，我们不必就此以为孔子认真想过此话里的关节，在发表一种原理。

同样，鲁迅的每句话也都是一时一地之言，在对他所有现存的表达验证之前，都是不可以拿来折狱的片言。如他年轻时写过：“盖知革命将兴，不期而感，犹野禽之识地震也。”这是顺手拉来的比方，除非鲁迅后来另发表过相类的主张，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鲁迅真的相信鸟类能够预报地震。另一例是鲁迅的名言，“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所出自的讲演全文俱在，然而我们竟也不便认为鲁迅说此话时严守着思想的逻辑，有清清楚楚的源流本末；就此例而言，我说不准鲁迅是处于某种思想的局部的发展途中，还是不曾有机会仔细整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态度，反正我相信，鲁迅是不可能不明白这样一种道理的：大炮固然能够赶走孙传芳，但若只有大炮，迎来的只能是另一个孙传芳。

那么，他为什么那样说呢？演讲题目为《革命时代的文学》，既是“革命时代”，与大炮相比，诗歌等确似是不急之务；演讲发生在军校，面对听众，总得找些双方欢喜的话，便是直如鲁迅，也不会说你们不过是为王前驱耳。除此之外，1927年的鲁迅，思想正处于嬗变中，他后来解释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新兴”何义，是颇难解释的，黄埔的未来官兵，与古旧的兵士有何不同，或便有，那不同是因“革命”而天然的，还是尚待考验的，所考验的标准，或这句话中所说的“未来”，究竟建立在何等观念之上，更是颇难分析。这忽而“新兴”的阶级，那时又称劳工，又称“下等人”，又称“大众”，除了对之始终拥有的同情心，鲁迅又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除了破坏力之外，这希望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同早年的思想相比，鲁迅的这一改变有点儿大。鲁迅在次年说，“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鲁迅对“上等人”，确实“总”是厌恶的，但对“下等人”，零星的、因人而异的赞赏时或有之，整体上以为胜出一筹，至少不能说是“总”，或一直有这样的观点。他早年可是主张“任个人以排众数”的，固然写过，“尼佉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又写过，“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更写过，“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到。”是什么使鲁迅以新眼光来看他“总以为”“是羊，也是凶兽”的底层人民呢？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描述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难道是因阶层而异的吗？他在《十四年的“读经”》中讽刺的，读一点古书就能学会的“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难道只能在书本中学会的吗？他在《忽然想到》中恨恨言道，“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话中的“永远”“永久”难道忽然不适用于某一时间的某一阶层了吗？他在《补天》中所轻蔑的“白着眼睛呆看伊”的“东西”，因其可悯而高贵了吗？他在《沙》中指斥的“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因其无助而变质了吗？他在《偶成》中归纳的“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如若失效，是因为昔日的奴隶果真成主人翁了吗？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观察到，“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因“对旧时代的破坏”的重要而变得无关紧要了吗？他在《聪明人与傻子与奴才》中写道，“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那种脸色会因被鲁迅等人寄予推翻旧制希望而改变吗？他对城里的“下等人”每以市侩视之，如在另一篇《通讯》中写道，“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这一次序的颠倒，是出自希望还是绝望？他一直鄙视“专向孩子瞪眼”的英雄，如《杂忆》中的激愤之言：“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然而又从什么时候起，鲁迅有信心将那愤火引导至另一方向呢？

有智者说，抱怨大众，如同抱怨天气。这话听起来挺豁达，其实是将“大众”视为一种背景，无从下手的（如前引鲁迅说的“没奈何”）存在，这是傲慢的，或所谓精英主义。而如鲁迅，或鲁迅常常显露出的一面，对“国民性”的呶呶不休而又热烈、恳切的批判，无论是否属于另一种精英主义，为什么用力甚侈，收效甚微？所谓“国民性”是果真存在的东西吗？如果它是一种基于对个体的观察而得出的统计意义上的印象，我们如何将它与更普遍的人类行为特征区分开来？没有完整的比较，我们如何确实它是一种有特定的制度意义的东西呢？如果它是附属于特定风俗及其他制度的，我们又如何将它附丽于个人身上，在塑造和被塑造之间，如何确定个人的责任呢？进步人士有一种倾向：除了将“社会”视为自己身在其中的河流之外，更将其视为某种河流之上的船只，而自己是乘客（如果不是舵手的话）；如果这船漏水，或方向有误，自要动手修整（如果不是凿沉另造的话）。这一特殊地位，来自历史与哲学，来自对方向的理解和信心，同时，也难免来自个人的现实愿望。这一切都是正当的，然而在正当的思想进程中，拥挤在不见天日的下层船舱里的桨手，处于一种什么地位呢？

我们不妨看看鲁迅对“大众”的赞誉。他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民魂是什么呢？我只能暗中希望鲁迅是明白的。他说：“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中国的旧经典确实无效，但目不识丁的劳工的“劳绩”，果真是鲁迅心目中的功绩吗，或者说，果真是这一阶层所能建造的最大功绩吗？曾将底层视为“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的鲁迅后来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是希望他们停留在“不读书”的状态吗？抑或是当有全新的教材后再读书呢？接触过现代科学的鲁迅，真的认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吗？还是说着惠而不费的安慰话？他说：“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读者大众”似乎比不读书的“愚人”大众高一级，但果真当得起鲁迅的这番夸奖吗？

我们不妨大胆地概括，所有来自其他阶层的对底层、“下等人”“劳工大众”的赞颂，只要这赞颂是对整体而非个人的，不是目睹了某个体身上的美好品质，而是想象着一种集体的共性，无论用心多么良善，都是居心不良的——这里的居心不良并不是说论者果真不怀好意，而是无意识中，将改变其地位或状态，与利用其地位或状态，混合起来。鲁迅的同情心是真诚的，我们看他曾经说过，“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且又说过，“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便知他真心要使下层得以——首先是——知识上的解放。他绝不想让大众停留在“质朴”的状态中，而想让他们接受教育，使自己存在于更广大的世界，有意识地加入更深远的进程，而只是因为汉字的难学，甚而视为障碍，要激烈地一并反对了。在这一点上，鲁迅避免了许多人的“错误”（这是个轻描淡写的词）——许多人会不假思索或自以为不假思索地赞美辛苦人的“质朴”，仿佛不幸的地位会带来美德，而且其不幸会因此变成幸运，使其不得已的服务也从此令人心安了。更不用提另一种赞颂，直接就要将大众视于原来的位置，至少要保持这一阶层的庞大，以供驱使。

社会的运行，对我来说是费解的，多说或少说，都逃不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费解的一处，可从鲁迅的作品中找一例来说明。在《喝茶》中，鲁迅写道：“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读到这里，我便踌躇：难道鲁迅觉得工人只配喝热水吗？然而，鲁迅接下来又写道：“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那么何以有前面的话呢？他又写道：“（进步）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这就是弥缝的话了，所建立的准则，不唯不可行，也经不住思维的考察，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挣扎的鲁迅，挣扎于个人与群体之间，挣扎于观察与理念之间，挣扎于绍兴的当铺和上海的租界之间。

版面编辑：肖子何

逝者｜斐里德？穆拉德：为一氧化氮正名终获诺奖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第38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9月25日

斐里德?穆拉德（1936—2023）生物医学家、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斐里德?穆拉德（1936—2023）生物医学家、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文丨财新周刊 王克柔

2023年9月4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斐里德?穆拉德（Ferid Murad）去世，享年86岁。

穆拉德1936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父亲本是阿尔巴尼亚人，十几岁就离家自谋生路，后移民美国。父母共同经营的家庭餐馆是少年穆拉德的主要成长环境。他们还将家中空房出租，许多房客是老人或退休人员，而母亲总是对这些人很照顾，这也让穆拉德耳濡目染，富有同情心且慷慨。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宗教信仰，父母都给予了穆拉德足够多的空间。

早在读中学时，穆拉德就确定了自己的三个职业目标：医生、教师和药剂师；多年后，他也同时拥有了这三重身份。由于父母无力支付高昂的大学学费，穆拉德选择了能提供最丰厚奖学金的学校——位于印第安纳州格林卡斯尔的德堡大学，成为一名医学预科生。学习之余，穆拉德做着多份兼职，既当服务员，又在实验室教解剖学和胚胎学。

大学毕业后，穆拉德进入凯斯西储大学，参加联合学位培养课程。在那里，他一边在药理学系学习前沿知识，一边在临床医学领域深造，去各个科室轮转，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确定自己对医学及相关研究的热爱。为了贴补家用，他在当地一家诊所兼职，每周值一到两个夜班，从晚上7点工作到次日早上7点，有时还要赶去上一整天的课。

辗转多所大学工作后，穆拉德于1970年加入弗吉尼亚大学，开始独立研究生涯。1981年，他进入斯坦福大学，担任斯坦福大学附属医院帕洛阿尔托退伍军人医院的医学主任，并在那里组建了一个高效的实验室。

于学界耕耘多年后，穆拉德将目光转向业界。离开斯坦福后，他去了雅培公司，担任药物研发副总裁。在指导药物发现和开发项目的四年中，穆拉德与同事们共同发现了许多新的药物靶点，并合成了约24种新化合物用于各种疾病的临床试验。他意识到，当一个人在寻找重大疾病的新疗法时，资源永远是不够用的。1993年，因雅培高管层重组，穆拉德觉得自己处境艰难，决意离开。后来，他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新生物技术公司Molecular Geriatrics，但随之而来的融资问题，使他的创业之路并不顺利。

1997年，穆拉德决定重回学界。在考虑了一些院长、主席职位后，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完全脱离实验室和学生。当年4月，穆拉德成为得克萨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新合并的基础科学系——综合生物学、药理学和生理学系的首任系主任。

尽管多年来不断更换工作环境，穆拉德对于细胞信号的研究从未中断。他的研究专注于硝酸甘油（NTG）如何激活形成环磷酸鸟苷（cGMP）的酶，从而导致血管扩张。很长时间以来，医生们使用硝酸甘油作为血管扩张剂以

治疗急性心绞痛，但一直未能弄明白其作用机理。穆拉德的研究证明，硝酸甘油及相关药物通过向体内释放一氧化氮（NO），从而提高细胞内环磷酸鸟苷（cGMP）的量来放松平滑肌，使得血管舒张，血压降低。由于以前从未观察到气体作为信号传递分子的现象，所以穆拉德这一发现代表了细胞间信号传输的新原理。信号传导过程中缺失的步骤，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福奇戈特（Robert F.Furchgott）、路易斯?伊格纳罗（Louis J.Ignarro）以实验补足。他们三人因此共享了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穆拉德和福奇戈特还共同获得1996年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事实上，在穆拉德等学者发现NO是人体内信号传递分子前，NO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多被认为是破坏大气层并制造酸雨的污染物。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研究表明，NO在治疗心血管疾病和许多其他重大慢性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穆拉德的研究还意外导致一种在商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药物——西地那非（Sildenafil）的问世。由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研发的西地那非，以商业用名万艾可（Viagra）广为人知，在中国俗称“伟哥”。它其实是辉瑞公司在研发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时，意外发现能够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使得辉瑞公司声名大噪。

穆拉德在自传中回忆，媒体经常想谈论伟哥，而他则试图引导记者进入更具医学意义的领域，例如早产儿的肺动脉高压、伤口愈合、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内皮功能障碍、高血压或糖尿病等，NO可在其中发挥更多作用，在医学上很重要。

穆拉德与中国渊源颇深，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以来，他访问中国30余次，在帮助与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加强与中国科学界的合作方面，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努力。

版面编辑：肖子何